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为毛泽东辩护



序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逝世 20 周年。

本书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20 周年而出版的。

本书收录了本人近 20 年来学习、研究毛泽东的 34 篇文章，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 (一) 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功绩及其成功之道的论析；
- (二) 对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哲学思想）的阐述；
- (三) 对国内外贬损毛泽东言论的辨证；
- (四) 对学术界同人在评价毛泽东上的不同见解的争鸣；
- (五) 对毛泽东与李达、鲁迅等人关系作体会式的阐释；
- (六) 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反思；
- (七) 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述评。

本书虽然对毛泽东有所批评，但总的倾向却是肯定与褒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针对过分否定毛泽东的倾向而发的，故本书取名为《为毛泽东辩护》。

本书的个别文章在发表时因各种原因删节较多，现恢复原稿，这种情况已在文中作了说明。其余文章，除个别文字校正外，未作修改，一律按发表时的稿子发排，以保持原貌。

20 年来，本人教学、科研的内容虽不断拓展，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领域，但中心始终是毛泽东研究。本人在研究毛泽东时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 (一)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如邓小平所说，“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通过诋毁无产阶级的领袖来搞垮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错误地对待自己的领袖斯大林的教训极其深刻，十分沉痛，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国内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难计其数。因为研究者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毛泽东的态度和评价也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毛泽东逝世时，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战。这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在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包括极少数飘落到海外靠洋大人施舍过活的叭儿们）继续把毛泽东当做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诽谤。他们这样做，目的很明确，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最终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海外某些以当代新儒家自居的人，鼓吹要带着“同情与敬意”去研究、体认中国传统思想。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说到共产党，一说到毛泽东，就耿耿于怀，诬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中断、毁灭中国传统文化

的罪人，他们的立场、感情异常鲜明。我们研究毛泽东，同样也要有鲜明的立场、感情。我们只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带着崇敬的心情去研究毛泽东，否则就会黑白不辨，是非不分，与敌人划不清界限。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决不是说可以搞“为尊者讳”，决不是说只讲毛泽东的功，不讲他的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有大功，也有大过。但总其一生是功远远大于过。他的失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我们感到痛心、遗憾。毛泽东的失误与他的成功一样，带有民族的、时代的特征，不能过多苛求于个人。为了变错误为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我们应认真地、严肃地、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揭露和分析。这也是党性所要求的，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若对毛泽东全盘肯定，不触及错误，一是于实际不符，违背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二是于党和人民不利。因为倘若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继续遭受严重挫折，并最终导致失败。当然，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是善意的，同志式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责任，而在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搞得更好。本书力图这样做。做得如何，请读者评判。

（二）从历史高度权衡毛泽东

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对历史人物应从历史的高度去审视、权衡。只有这样才不致力一些细微末节的琐事而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毛泽东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巨人中的巨人”。因此，我们应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高度去衡量毛泽东，评品他的功过得失。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之后，中国逐渐落伍了。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起，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了西方列强争夺的一块肥肉，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毛泽东之前，都没有成功。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历史，也结束了四百多年来停滞不前、日益衰颓的趋势，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生气勃勃、向前奋进的新纪元。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

之后，中国人民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社会主义大国。这同样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和我们党有严重的过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从人类历史长河看，迄今为止，任何历史进步都是以巨大的代价为条件的，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资产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从历史权衡毛泽东，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他所做的第一件事，而且要足够地估价他所做的第二件事的历史意义。在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初，我们较多地讲毛泽东晚年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失误，这是心要的，无可非议的。否则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新时期，也没有今天令人振奋的形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赖以进行的基础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奠定的，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毛泽东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广泛的崇敬和爱戴。本书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已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个人、政党、阶级都无法改变的。近几年来，海外反动势力企图乞求于一二本“谤书”来低毁历史巨人毛泽东的形象是徒劳的。最近，一位从海外探亲归来的友人告诉我：一些正直的外国人对海外某些人庸俗、下流的做法非常反感。在西方，“非毛”也许能得到少数人一时的“喝彩”，但从长远来看，“非毛”不得人心。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本人是一介书生，195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4年毕业留系任教，直到1992年2月才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工作。本人对毛泽东的研究主要是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学论道，以求真唯是；立身行事，以人民为本，不趋时，不媚俗，也不顾忌他人对本人如何评论，这是数十年来本人做人治学的原则。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要下功夫，用气力。这里不妨谈一点我对《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与苏联及中国30年代哲学的关系研究过程。“两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因此，国内外的学者都十分注重对“两论”的研究。国外有人企图通过贬损“两论”来贬损毛泽东思想。六七十年代，中苏论战。苏联人写了许多批“毛主义”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开始注意苏联人写的东西，翻译了数十万字资料，其中一部内部油印交流，供研究用。我发现苏联人有一种说法：“两论”是抄他们（苏联）30年代的著作写成的，而且抄歪了，苏联人没有提供证据，没有说抄他们的哪些著作，此种抄袭说，国内也颇流行。有的人提出，“两论”是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抄袭说”对不对？“两论”与苏联及中国30年代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了求得真解，我几乎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关马列哲学著作都翻阅了一遍。还到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图书馆寻找毛泽东在抗大讲课时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等文献。前后近花了一年时间，这次调查、比较、考证，收获颇大。我发现，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前除了认真研读已找到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认真钻研过苏联的三本书：一本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本是米定（即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里易译的《新哲学大纲》；一本是米汀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除“两论”外，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主要内容取之于上述三本书，“两论”也充分吸取与利用了上述三本书的成果。我们以往没有注意这一点，导致对“两论”评价过高，但“两论”无论从体系到内容，都高出于苏联著作，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有创造性，决不是从苏联或中国的书中可抄得的。1980年春夏，我写成《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客观地分析了“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在纠正以往过高评价的倾向的同时，重点驳斥了“抄袭说”。

文章出来后，得到同事们的肯定，同意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后被告之，出版社对此文提出异议，只能作罢。我又将此稿托本系同事请他转给中央某研究室同志提意见，答复也是否定的。但我自信，文章是以事实为根据，分析也是恰当的。1981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印发，并作了发言，引起反响。不久，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办的《理论探讨》上发表，本人在北京、张家口、西安、济南等他讲学时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是好的。可以说，在国内学术界，本人对“两论”与苏联及中国30年代哲学关系之研究是最早的。1988年，《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出版，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见解不谬。《批注集》出来后，不少同人写了文章、著作，而我却一篇也没有写，有人间过我，你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为什么不写。我说，我要说的话早已说过了，没有新的看法，就不浪费时间和纸张，遗憾的是有的同志在讲“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关系时不注出处地搬雨了本人研究成果。

讲以上一段研究过程，无非是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毛泽东，仅有一个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下笨功夫，拓宽视野，发掘资料，深入研究毛泽东与马、恩、列、斯的关系，与同时期苏联和中国哲学的关系，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关系，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关系，与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关系，必须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动态。只有广泛阅读，用心搜集资料，进行多方的考察、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一个中肯的论析。本人虽然能力有限，但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本人的论文、著作，力求史料翔实，言之有物。

（四）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力求创新

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死人是为了活人。任何对历史、对古人的研究都受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所制约。研究毛泽东直接目的之一是要给他以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这不是主要的。我们研究毛泽东主要是为了从他那里汲取智慧、信念和力量，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他开创而未竟的事业，是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不停留在现成书本的注解上。毛泽东一生厌恶教条，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对他的研究应力戒注经解经的做法，努力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

文章有感而发。这种感不外两大类：一类是有感于学术界的理论问题，一类是有感于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部分文章表达了本人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见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经验教训问题，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问题，等等。至于本人见解是否正确、合理，有请读者明鉴和日后历史的检验。俗话说：“盖棺定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在活着时很难定论，因为人会变，功过是非也难定。所谓“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只有到生命终了，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是非功过在客观上已不会再变，历史地确定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盖棺定论”。但超出了这个意义，就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很难有最后定论。孔夫子已去世二千五百多年，但对他的评论依然见智见仁，争论不休。我想，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一样。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而且将作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为后来者研究不止。我愿和学界

同人，继续为毛泽东研究作出努力。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
致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6年1月31日

为毛泽东辩护

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是一位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毛泽东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历史巨人，其成功的秘密何在？笔者虽对此颇感兴趣，但无专门研究。不过，笔者早就发现，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曾有明确的回答。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潘迪说：“能够同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会见，我们教育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感到非常高兴和十分幸福。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快乐，”毛泽东说：“谢谢。我没有什么伟大，跟你们差不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们差一些。”在会见过程中，团员马拉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么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以便让我们多少学得一点。”毛泽东坦率地回答道：“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

约一年之后，毛泽东则主动地向人谈论起他的成功之道。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接见时，李的秘书程思远先生作陪。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主动向程先生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一时茫然，不知所对，说，“不知道。”毛缓缓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明确地道出了他一生成功之道：靠总结经验吃饭。

伟人并不神秘，真理并不玄奥。纵观毛泽东一生的理论与实践，大至诸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创造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小至诸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条例和按人口而不是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无一不是对自己的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历来把自己的思想看成是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又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成功之道的理论说明。

“总结经验”这话人人会说，但要真正做到善于总结经验，“靠总结经验吃饭”，那就不容易了。如何总结经验，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七点：

第一，要及时与不断，每做完一件事，或做事中遇到问题，都必须及时加以总结，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再战。切忌不要只实践，不总结，或到了问题成堆了才来总结，算总帐，那样损失太大。总结经验不仅要及时，而且要不断。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

断发展的。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二，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发扬民主。总结经验，不仅要总结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要虚心向他人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集中群众的意见与创造时，要充分发扬民主，注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依靠集体的智慧。这里重要的是发扬民主，因为若没有民主空气，搞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那就没有群众路线可言，没有集体领导可言，也就不可能真正总结经验，势必陷入主观性。片面性。

第三，要多思。群众的意见是分散的、无系统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矛盾的。对于群众的意见，来自下面的经验，必须经过大脑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防止将局部的、片面的、表面的、甚至是虚假的经验，误认为正确的、普遍适用的真理。多想出智慧，凡事要三思而行。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容易犯经验主义，仍然做不成事业。

第四，要注意吸取间接的、历史的经验。总结经验，主要是总结直接的，现实的经验，但同时也要注意借鉴他人的、间接的、历史的经验，以免重犯前人的错误，少走弯路。照搬他人的经验与拒绝他人的经验，都是错误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研究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

第五，要正确对待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作为宝贵的财富，要很好加以总结，使之推广。但也应注意到，任何经验，都有它的具体性、历史胜，切不可把它当作教条，到处加以套用。经验的推广要由点到面，逐步进行。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失败的教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要善于从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第六，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绝不允许少数人关在房子里炮制假经验。总结出的经验，正确与否，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

第七、要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总结经验。经验有不同的层次。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善于总结所负责的具体工作经验，而且要不断地总结自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方面的经验，从而不断提高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领导艺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一点哲学，具有哲学思维的能力，缺乏哲学修养的领导者是很难总结好经验的，当然也就很难做好领导工作。

毛泽东总结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具有普遍意义。要成功，要前进，就得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要成为指导群众前进的好的领导者，就要善于总结群众的智慧与创造。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的成功也是得益于总结经验。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新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笔者以为，这不仅是领袖人物的成功之道，也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成功之道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它的答案决非是单一的，值得我们多方面加以研究。就他自己认为的“总结经验”这一条而言，也大有文章可做。本文仅是作为引玉之砖，提出问题，以期引起领导者们和研究者

们的注意。

原载《新东方》
1993年第5期

注释

程思远：《难忘的一天》，转引自《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225页。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2页。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1页。

邓小平：《对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报告的意见》，转引自《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载《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4日。

毛泽东——伟大的探索者

人类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断的创造。大凡人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无不具有无畏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创新精神。这种无畏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创新精神在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断的革命与创新，不断的挑战与应战，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这成了毛泽东重要的性格特征。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既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沙皇俄国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的大舞台造就了毛泽东伟大的创新精神，而毛泽东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又推动着中国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

一、“性不好束缚”，“好独立蹊径”

毛泽东多次讲过，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产阶级的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是后来才读的，是社会推动他转入革命。我们是唯心论的天才论的反对者，但我们也应承认，毛泽东确实有一般寻常人不可比及的智慧、才能、意志和气质。他的与众不同的非凡才华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来了。

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个人的思想来之于社会，来之于时代。青年毛泽东和同时代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怀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决心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己任。为了寻找救国之道，他勤奋学习，上下求索。辛亥革命后，他当过半年多新兵。他自称秉性“好独立溪径”，确实，青年毛泽东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1912 年春，他在退出新军后一连报考了实业、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但都不随心，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写于 1912 年上半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毛泽东文稿）令老师赞叹不已。毛泽东从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老师阅后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文末的总评语为：“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一位老师对一个人学才数月的中学生所作的不足六百字的作文写下如此的评语，恐怕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虽然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但到了这年秋天，他还是退了学。原因是，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不如自学更好。于是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他所喜欢读的书。第二年春，他考入公费的师范学校学习。他对学校仍然不满，感到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大低，涛侣太恶”。他在学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不完全受学校课程的限制与束缚。

毛泽东出众的才华得到师范学校老师的肯定，杨昌济在 1915 年 4 月 5 日的日记中记有他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杨称毛泽东“资质俊秀”、“殊为难得”，是农家出的“异材”。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黎锦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泽东的出众才华也得到同学的公认。1917 年 6 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开展德智体优秀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不仅在“敦品”、“自治”、“文学”、

“言语”、“才具”、“胆识”六项中得的总票最多，而且“胆识”（“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之类”）一项，唯他独有。

以上所引的材料并非是后人因毛泽东成了领袖之后所加的溢美之词，而是当时人的一种评价。它真实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超群的才华。

一个人的思想主要地是由时代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决定的，不承认这一点，就背离了历史唯物论。此外，一个人的思想也与他的气质、性格有一定的关系。若否认这一点就会把历史唯物论简单化，就会千人一面，显不出每个人的个性特色。“胜不好束缚”、“好独立溪径”的性格，贯彻于毛泽东的一生，渗透在他的思想、行动的各个方面。与他朝夕相处的卫士、保健医生直观地感觉到：“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正如他的书法一样，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他盼望挑战，他的一生不曾停止挑战应战。这是他性格的基础和核心。”“性不好束缚”、“好独立溪径”的性格是毛泽东成为富于创造精神的伟大领袖的一个内在因素。

二、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将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东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是现时代最科学、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理论。马克思主义书中很少讲到中国，更没有指导中国革命的现成方案。中国革命如何搞，要靠中国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集中在城市。不必待言，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只能在城市。法国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俄国 1917 年的十月革命，都发生在城市。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在城市搞武装起义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

斯大林曾正确地指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和特点之一。在如何进行武装斗争上，他主张城市中心论，不赞成先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同样主张城市中心论。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主张城市中心论。

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独辟蹊径，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1927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上山”的主张。同年 9 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最初，他也曾计划攻取湖南省城长沙。在受挫后，他改变主张，果断带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进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地方武装割据。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不断地总结经验，在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套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打破了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框框。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囿于传统的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旁门左道。1927 年 9 月，由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毛泽东上井冈山是“临阵脱逃”，主张进攻城市，反对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议，取消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在反“围剿”中不断取得胜利。即使如此，“左”倾教条主义者仍诬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极端错误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农民意识”、“右倾保守主义”。他们命令幼小的

红军攻打大中城市，企图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谁胜谁”的决战。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迷信外国经验的王明依然想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轻视在广大农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批评王明的错误，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说明中国革命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道路的不同。可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对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表示怀疑。在抗日战争初期，斯大林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寄托于国民党政府。他认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有资格领导抗战。斯大林不仅在抗战初期有这种思想，而且到了1940年，他依然如故。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分一点给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过高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不准中国革命”。

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总之，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并作出了决策，抵制了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所以邓小平说：“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三、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旧中国经济落后，现代性的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否搞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已不成问题。列宁有过明确的论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有苏联的经验作借鉴，但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结合中国的特点，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与苏联相比，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斯大林是先搞工业化，再搞农业集体化。我国则不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开始，两者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密不可分。

第二、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马克思曾提出，假如无产阶级能够用赎买的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国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大工业、银行、铁路等大资本实行剥夺，收归国有。同时，列宁也提出对“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由于种种原因，和平赎买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然而要剥夺一切中小资本是不可能的。到1925年，苏联私人经济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十九，在商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斯大林对这些私人经济采取“排挤”的政策。中国则不同，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

改造的方针，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统购包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和平赎买。国家在对资本主义企业改造的同时，还对资本家进行改造，使他们从剥削者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成功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中国的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在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打破了没有机械化不能搞合作化的迷信。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与苏联不同。苏联在集体化时对富农采取没收土地、财产并将其从住地赶走以至逮捕、流放的方针。这样大大增加了富农的反抗，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我国则采取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在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将富农分子和地主分子吸收入社，在劳动中改造他们。由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步骤的正确，在整个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是增长的，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大幅度的减产。毛泽东对此引以自豪，认为这是一个创造。

毋庸讳言，自 1955 年夏毛泽东错误地反右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处理和使用也不尽恰当。但总的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不容否定。在一个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用很短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绩，一个创造。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不断革命是他的基本信条之一。1956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毛泽东开始了新的、更为艰难的探索。他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比苏联搞得好些、快些，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他决心打破苏联的框框，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 年和 1957 年，他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和政策。这主要有：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试图冲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的权力，做到既统一，又独立，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关系，给企业以相对独立性，做到三者兼顾；容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一定发展，“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扩大民主，吸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试图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改由任期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向科学进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向外国学习，等等。这些思想、政策，有的实行了，有的则没有；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是转瞬即逝的天才闪光。在 1956 年和 1957 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时间里，毛泽东思想活跃，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所进行的新的探索与试验，追本穷源可上溯到此。

1957 年以后，毛泽东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探索，先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期望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是搞“文化大革命”，进行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演习”。这

两次探索离开了原来的正确方向，是错误的，带来了不幸和灾难，留下了使人永志不忘的惨痛教训。

四、几点有益的启示

第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在今天，改造社会的探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离开了它，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招致失败。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没有提供改造社会的现成方案。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学习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照搬现成的结论、原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一点，只知照搬书本，盲目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衰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既要防止修正主义，更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我国，教条主义是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却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深究。

第二，改造社会的探索不能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只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探索、创新，必然要冲破过时的观念和僵死的教条。冲破过时观念和僵死教条的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天才个人，不是思想大批判，而是事实，是实践，是群众。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是逼出来的，是逼上井冈山。因为不上山，只有失败一条路。他抵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上的错误，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逼出来的。因为照斯大林的一套去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没有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也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希望，只能死路一条。要冲破过时观念和僵死教条，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为准绳。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胡思乱想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幻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违背了实事求是，谁也不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探索的成功，靠的是实事求是。他晚年探索的失败，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陷入了严重的主观主义。

第三，改造社会的探索是一个过程，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失败、挫折在所难免。对探索过程中的失败、挫折要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在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曲折，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毛泽东失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探索在后，在今后，即使是一万年后，失误、挫折仍然会有。希望探索过程一帆风顺，不发生曲折，不付出代价，那是幻想。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从错误中学习，力争避免犯不必要的大错误，花小的代价取得更多的经验。

第四，谦虚谨慎是探索成功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一些同志，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形势稍一好转，就头脑发胀，犯急性病，一次又一次吃亏。毛泽东则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生怕出岔子，广泛纳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果取得了成功。1957年以后，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他骄傲了，不谨慎了，过于自信，欣赏个人崇拜。他本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但晚年，他将自己的言论、经验教条化，把与自己相左的言论视为

修正主义，脱离了集体领导，脱离了群众。这是他晚年探索失败的重要思想原因，探索要大胆，不大胆不能创新。探索又要谨慎，只大胆不谨慎就会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盲目蛮干，走向反面。

人类社会发展永无止境，改造社会的探索、创新永无止境。在改革、创新的年代，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无畏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创新精神，沿着邓小平所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3年第2期注释

毛泽东：《致湘生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同上书，第1页。

转引自《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注释，同上书，第2页。毛泽东：《致黎锦熙信》，同上书，第30页。

《杨昌济记毛泽东的谈话》，同上书，第636页。

黎锦熙日记，同上书，第708页。

引自《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同上书，第708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79页。

毛泽东——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追求，又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无数的先进分子，仁人志士，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莫不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昌盛的现代化中国而奋斗、流血、牺牲。

毛泽东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奋斗不已。在他领导下，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不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现代化是随着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出现而产生的一个世界性概念。虽说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界定，但最本质的是指经济上落后于现时代的国家，要赶上和超过当时先进发达的国家。

中国是古代文明世界里最早发达的国家之一，只是到了近代才落伍了。19世纪，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陆续进入现代工业国的时候，中国却依旧停留在封建的农业国地位。落后就要挨打。从1840年鸦片战争时起，中国便不断地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乃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了抵御列强，维护国家的独立，中国的先进分子曾提出向西方学习。先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工业技术，搞洋务运动，失败了；继之又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戊戌变法，失败了；接着搞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但共和国有名无实，又失败了；再接着搞思想文化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仍寄希望于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可是，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给中国人民当头一棒，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破灭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都惨遭失败，理想总不能实现，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互相勾结，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先进的人们并不明此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陆续传入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两大障碍。为振兴实业，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陈独秀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说：“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之中国，生产力实无有发展。”因此，“欲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路。”不过，革命究竟如何搞？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时还难以弄得清楚，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革命者不灰心，不气馁，百折不挠，从革命实践中学习，从切身错误中学习，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通过建立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在这条正确路

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先是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毛泽东虽然致力于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但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则从未忘怀。他在1944年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使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宣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使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建国方针，也针对一些人存有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工业化的幻想，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民主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他指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又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因此，“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用革命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

总之，历史的结论是：在一个分裂的、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扫清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创造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前提。1982年美国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那时的政策是针对短期目标的，而且往往被证明是无法实施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书还说：“1949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一体化的成就，其基本原因，就是建立了单一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资产阶级学者自然不会赞成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但他们承认：强大的、集中的、统一的、有权威性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它可以为经济高速增长而调动各种技能和资源。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

二、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自中国的门户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破以后，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三种取向：一是在保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基础的前提下搞现代化，这是当权的统治阶级所主张的，从清末的洋务派官僚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政府都是如此。一是向西方学习，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所追求的。一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主张的，中国近百年历史证明：前两种路走不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可以救中国，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表明，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别的什么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要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的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什么时候开始全面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则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建国后应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等现代化的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全面搞社会主义；在农村，不赞成在土改后就趁热打铁搞合作化，而主张先搞农业机械化，再搞合作化。毛泽东则不同意这种主张。他提出：应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把技术方面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和社会制度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结合起来；在农村，不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而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依据这种认识，1952年，毛泽东酝酿和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造性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而不像苏联那样先搞工业化，过若干年后再搞农业集体化。

第二，创造了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平稳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做到充分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创造了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实现了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大幅度减产，而是增产。

毛泽东原先打算用10年或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总路线所规定的“一化三改”的任务，实践的结果，只用了3年多一点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到1956年，我国便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改造虽然在1955年夏季以后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不足，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剥削制度，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人们记得，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创举。

三、初步设计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同时期的“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是说，“现代化”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动态性的概

念。现代化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标准。

最初，人们普遍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或主要是工业化，把现代化的过程理解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在本世纪 30 年代，我国学术界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时，相当多的人认为，现代化即工业化。这种理解虽不全面，却抓住了最主要之点，因为在那时，工业化确实是现代化的基础。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本人也主要是从工业化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含义。他在《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所强调的也是工业化，即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工业化视为主体也反映了这一点。

如果仔细地探究，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是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复杂的有机的综合体。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其他部门孤立地发展，毛泽东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有一个历史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讲到工业化时就讲到“农业的社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中和党的文件里，已以不同的言语、方式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以后，中共的文件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都采用“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提法。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 3 版）在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人民的任务时也采用了上述的说法。1959 年底、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除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就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在此以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相对稳定下来了，并把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的奋斗目标。

什么才算实现了现代化？若按照上面说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或主要是工业化的理解，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就算实现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苏联的标准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 70%。这个标准显然有不够科学的一面，因为每一国家在每一时期确定工农业产值之间的正常比例，必须考虑到人口、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及同期工业化国家的发达程度等，决不是只表现为一个简单的比例数字，况且，数字也可以变化。不过，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也沿用这个标准。1953 年 6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国家工业化，就是说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相比是七与三之比。到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的看法有了变化。他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即使这样，我们还不可以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 5 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家。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工业化的标准有了新的思考。

从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个以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

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引起了工业、农业的革命。因此，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也还很难算是达到了现代化。如果追溯历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毛泽东心目中的现代化已不完全是工业化了，而是要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赶上以至超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他设想：基本实现工业化，只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打下一个基础，时间大概是 3 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用 50—75 年的时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经过大跃进的教训，到 1962 年，又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 100 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以上讲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四个现代化”，实质上都是指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固然，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但它并不能囊括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相应的思想道德建设。毛泽东在设计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的同时，还同时勾画了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的蓝图。

经济的现代化以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和保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毛泽东在建国前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对我国现代化的意义。1954 年，他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我们的宪法基本原则有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结合中国的特点，又说：“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的核心和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业的权利。毛泽东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据此，他十分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

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基础服务的，是一种手段。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又是现代人们所向往的、追求的理想，因此，它也是目的。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中的人民民主政治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1）。这种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有利于调动和组织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建设。毛泽东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里，就集中阐述过文化建设的内容。后来，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2）在此以后，他始终把建设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1954 年 9 月 15 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

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3)

毛泽东所说的“现代科学文化”，内容广泛，但大致是两个方面的，一是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是指文明的高尚的思想和道德。他十分关注全民族的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注意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文化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事业相适应。在这一问题上，他尤其注重科学文化事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注意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为其服务。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并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向人民群众不断灌输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批评自私自利的思想。至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他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标准，要他们努力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他担心将来物质生活富裕了，而思想觉悟反而不如以前。所以，他提倡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反对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只为个人不管国家的道路上去。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还是比较粗线条的，有的内容也不完全切合实际。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设计的蓝图作了修正、补充，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在经济建设上，他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用10年时间，即到1990年，实现国民经济总产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即到下个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还提出：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入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明确地将自己在现阶段的总任务简洁地概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究竟怎么搞，中国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体上是搬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足之处是缺乏创造性。毛泽东历来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不满足于照抄照搬。1956年，他在把自己工作的重心移到领导经济建设上后，决心打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希望比苏联搞得快些、好些。

1956—1957年，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有益探索，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在理论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58—1960年，他进行了更大的试验，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犯了急性病，碰了钉子。1966—1976年，他进行第三次探索，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陷入了悲剧。他的后两次试验，偏离了第一探索的正确方向，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但在总体上作出否定结论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其中仍然有一些极

为重要的思想和设想，值得我们重视和吸取。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方面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可以扼要地表述如下：

第一，关于工作重心的转移。在他看来，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由革命转向建设，搞技术革命，大力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以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强国，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基本矛盾。必须按照具体情况，正确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第三，关于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他主张，应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第四、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他屡次提出应改变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兼顾三者的利益。要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注意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生产力的布局上，要注意发挥原有的沿海工业的作用，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第五，关于工农业同时并举。他提出将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在农村大力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转化成为工人。

第六，应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注意扩大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参与管理国家、企业等方面的积极性。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既不赞成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也不赞成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与和合作。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制的设想，试图打破终身制。

第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在科学文化领域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八，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和平演变，为此必须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细致的社会主义教育。

第九，关于国防现代化。他提出，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必须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一支包括由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组成的现代化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在内的现代化国防技术；必须使军事理论现代化，以适应于现代化战争。

第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国原则，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注意向外国学习，对外开放，想方设法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孤立、

封锁政策，尽可能争取国际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第十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国家变不变颜色，关键在于共产党自身。因此，必须加强党自身的理论、思想、组织和作风的建设。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全面评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尚有待于今后的实践作进一步的验证。但从已有的正反面经验看，至少上面所说的几条是正确的，或大体上是正确的。当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些比较一贯，有的则不够一贯；有的执行得比较好，有的则执行得不够好，甚至发生严重的背离；有的比较全面、完整，有的则不够全面，甚至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但是，正像在科学研究中，如有的科学家所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毛泽东虽然未能最终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历史功绩将越加显示出来。

既然是探索，那就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走一段曲折的路。毋庸讳言，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也掺杂着个别脱离实际的、平均主义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还占据了很突出的位置。但倘若据此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错误的。至于把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说成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则更加错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正确指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这些失误与他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中所做的贡献相比，毕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况且，他的失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前进中的失误。这些失误只能使我们进一步前进提供经验和教训。应当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都值得我们及后人去认真的研究与总结。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果断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恢复并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在试验中。在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曾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近几年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然而，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后，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依然沿着自己所选定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之所以处险不变，岿然不动，原因虽说很多，最根本的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正确，除此之外，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毛泽东奠基的。

原载《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注释

陈独秀：《避开革命的新方法》，《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6页。

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 237 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80—1081 页。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75 页。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9、608 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1 页。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9 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66 页。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127 页。

(1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同上书，第 456—457 页。

(12)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同上书，第 6 页。

(13)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上书，第 133 页。

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自马克思恩格斯由空想变为科学以来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然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世界上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算起，至今还只有75年的历史，在中国则更短，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算起，至今只有36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还不成熟，正在实践中、探索中，并无固定的模式。毛泽东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因为是探索，是试验，错误与挫折在所难免。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真理与谬误并存，天才的闪光与浪漫的空想交错，敏锐的洞察力与主观的臆断相间。因此，对它作简单的肯定与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而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毛泽东已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在经历了1989年我国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之后，我们站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审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评判其成败与得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十分复杂，本文仅择其几个要点略加论析。

一、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在评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首先应注意的是他关于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它的第一步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须经过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一种是一部分同志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企图将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放到民主革命中来完成，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反复说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提出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党内的认识是一致的。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全面搞社会主义和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防止的主要是“左”的急性病，毛泽东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但他在当时没有明言这一点。他反而讲，要经过10年或15年的时间再全面搞社会主义。他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不能四面出击；一是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直到1952年，他才提出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创造了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平稳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第二，创造了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过渡形式，实现了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苏联不同，我国的合作化没有减产，而是增产。

第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与苏联先搞工业化，再搞农业集体化不同。

实践的结果，不是 15 年，而是只用了 3 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有急躁的缺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促进了我国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经济落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无论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可历史的发展又偏偏不是这样，首先在俄国，然后又在中国这样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如何看待、解释这一历史事实？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考茨基、苏汉诺夫之流借口俄国生产力不发达，还没有达到搞社会主义的水平，攻击列宁，反对十月革命。对此，列宁驳斥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时更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上来说明发展生产力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他指出：“从世界历史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他又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的这一解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根本上回答了像俄国、中国这样一些经济上不够发达（当然要有现代的、一定的现代大工业，有一定数量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国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到了 80 年代，有一些人借口中国生产力不发达，攻击社会主义搞早了，主张应退到资本主义去。然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在 1957 年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其后，我国的

社会主义事业虽然出现过很大的波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如此，与旧中国相比，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相比，40多年的历史依然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发展中国。不管社会主义的敌人如何反对，只要共产党自身不犯根本性的大错误，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能得到巩固与发展。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方面坚定地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可以搞社会主义，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国家愈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愈困难。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他当然更懂得现代化的大工业和农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一连串的胜利，也由于为1958年大跃进的假象所迷惑，他对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性的估计十分不足，得出了与列宁相反的结论。他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因为人越穷，越要革命。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只有三代，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十多年至三百多年。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影响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容易。在东方，像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他们快。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虽然有不少合理之处，但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这样的国家固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深，但封建主义的遗毒、中世纪的旧传统却比西方国家要大得多。正因为对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他便在1958年轻率地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后，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劝大家“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缺点。

二、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中国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足的是缺少创造性。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不满足于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由此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希望比苏联搞得快些，搞得好些。

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戒鉴，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从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抽出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大关系，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毛泽东的论述也是原则性的，但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看，这十大关系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正确处理了这些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就能不断前进，处理不当，或忽视了其中的一些关系，社会主

义事业就会受阻，甚至闹出大乱子。

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不发生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大的调整都是由于这三者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所导致的。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偏重于重工业，偏重于国防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忽视民用工业，结果市场货物不丰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的商品得不到满足，直接影响到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直至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又如，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应该给工厂以一定的相对的独立性，不能什么都统得很死，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要研究。对工人，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工资要适当的提高。对农民，国家必须注意照顾其利益，不能把农民挖得太苦，竭泽而渔。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关系时，必须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大的独立性，做到既统一，又独立，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一种冲击。时至今日，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重要内容。有的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结果国家陷入严重的分裂、动荡之中。

至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论十大关系》虽然具有中国的特点，是对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冲击，但还未能从根本上加以冲破（毛泽东自己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原则和苏联相同”）。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还是初步的、原则性的，有的也没有能实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低估它的理论价值。德国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在科学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另一位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也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因为，提出问题需要创造性思维。《论十大关系》不仅正确提出了问题，而且科学地论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的探索，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论十大关系》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这主要有：注意扩大民主，认为可以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主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任期制，试图打破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允许地下工厂变为地上工厂，允许开私营工厂，吸收华侨投资，开投资公司；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这些思想，有的实行了，有的则没有；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是转瞬即逝的天才闪光。

总起来看，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许多思想至今仍有其价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追本穷源，可上溯到此。

1957年以后，毛泽东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探索，先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他称之为“大试验”；后是搞“文化革命”，他称之为“演习”。

这两次探索离开了原来的正确方向，是不成功的。这两次探索受挫的根本原因是：一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严重脱离了实际，陷入了主观的幻想；二是过分夸大了中国的特点，忽视了普遍真理，忽视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这两次探索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新问题。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消灭了，政治上道义上的团结一致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在斯大林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理论盛行于一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不承认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果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项制度凝固化，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失去了活力。斯大林在逝世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矛盾，但他还是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 1956 年和 1957 年用很大的气力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是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基础；一是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这是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主体。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的方针作了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旧社会所不同的，它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得到解决；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明了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方向，为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当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还不完善，在后来的运用中发生了严重的偏颇。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生产工具的作用。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批评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我认为，毛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识到，在以手工工具为主的条件下，合作社的规模不宜过大。他喜欢办大社，认为“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沿着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有所不同。刘在 1957 年多次指出，在现在以手工生产为主的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单位、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生产关系则超过了生产力。因此，他不主张普遍地办大社。

第二，过分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主观地判定生产关系落后

生产力，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企图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过分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过分夸大了精神力量的反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忽视了物质利益，企图用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是导致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理论根源。

1958年，毛泽东想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把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付之实践，尽快缩小以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但他一度陷入双重空想：一是以为搞大跃进，工农业生产可成倍的增长，社会产品很快就会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一是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可以实现了。于是他提出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空想性质是明显的，它并不是人民群众的创造，而是农民小生产者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

毛泽东虽然一度陷入严重的空想，但他毕竟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很快发现“共产风”的危害及问题的严重性，力排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浪潮，大力纠正“共产风”。他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贯彻按劳分配。毋庸置疑，即使在1961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依然存有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成份，但若由此就笼统地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则是错误的，把我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称为农业社会主义，则更是荒谬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是失败的，尽管毛泽东在世时一直不承认，但历史已作了结论，我们无须为之辩护。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中是否有合理之处呢？我认为这是可以讨论的。1972年，毛泽东在一个有关人民公社社办企业的材料上批示：“光明灿烂希望之所在。”毛泽东的这一预言正在实现。今天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已成了我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追溯历史，今日的乡镇企业不正是源于昔日人民公社的社办、队办企业吗？毛泽东提出的一些设想，在当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但是在未来社会中是否有可能成为现实呢？对此，我们不宜过早地下结论。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是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主体。关于这一理论的一般内容及其意义，许多文件、文章和著作都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想谈一谈毛泽东有关领导与群众矛盾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除了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帝国主义插手外，从共产党自身来讲，主要是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化方针的错误。因此，在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注意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

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明显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突出出来了。

刘少奇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谈了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的问题。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啰）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1957年，刘少奇多次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则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承认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在1958年，毛泽东多次指出，苏联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阶层”，会形成“高薪阶层”。

为了解决领导与干部的矛盾，克服官僚主义，防止出贵族阶层，毛泽东提倡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中央和省市的领导，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下去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士兵。他坚决反对特权，反对以权谋私，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支持群众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深刻的。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政治运动，虽然它们的情况、原因、性质和结果极不相同，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其表现形式均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矛盾的某种程度的激化、对抗和冲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竭力利用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制造动乱，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以便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妄想。因此，敢于正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善于正确处理这一矛盾，从整个社会来讲，就能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能得到较好的发挥，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生气勃勃地前进；从一个单位的生产工作来讲也是如此。反之，若不敢正视这一矛盾，不注意及时妥善地处理好这一矛盾，那最终势必酿成更大的矛盾，以至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抗，这种教训，国际国内都有。

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正确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毛泽东晚年经常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但由于他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估计，过分夸大了党内的阴暗面，把一些正确的理论、政策误认为是修正主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1964年12月，他认为，在党内已形成了一个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而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这样，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因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变成为谬误。

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仍是我们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课题，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思想、意见，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吸取，而对其错误则应剔除，引以为戒，以免重犯。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如何进行正确的

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晚年以其主要精力探究这一问题，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1956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千百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话时说，在斯大林时候，阶级斗争没有了，社会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旧社会时，我认为这样才能解释他的错误。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头脑中一度松弛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起来，但直到1957年3—4月，他还是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了，“八大”作了结论：现在正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界的斗争，由革命转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时，他也不止一次地指出，阶级斗争只是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还没有全部结束，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毛泽东的这些认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开始陷入迷误、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以为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贡献。但历史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错误的，应予以坚决的否定。我们不能因为近几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变而又重新肯定它。

不过，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毛泽东的以下思想无疑具有真理性：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而且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新的资本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能丧失警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第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警惕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同时，还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第五，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要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

第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我认为，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中至少以上几条是能成立的。当前，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些科学真理呢？我认为，不是。例如，我们虽然也在进行反对党内腐败的斗争，但往往是就事论事，没有认识到，以权谋私、官倒、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腐蚀进攻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足以使共产党失掉人心的最危险的敌人。没有这种认识，打击自然就不力，党风也难以根本好转。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毛泽东晚年竭

尽全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也是当前以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重大问题。根据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搞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他讲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五、社会主义社会成展规律的认识问题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暴露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没有异议的。但实际上，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艰难性、复杂性往往估计不足。

在1957年，毛泽东提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那么高”，在时间上“要缩短些”。

在1958年，他一度头脑发热，自以为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碰了钉子。1959年2月，他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还不成熟。

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1959年12月—1960年2月），他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不成熟，在现在要写出一本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的历史至今还不过40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中肯的，深刻的。

1961年1月，他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民主革命花了28年才成功，希望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像搞民主革命那样长的时间，是不是20年就取得经验，比民主革命少8年，过去想缩得很多，看来不行。这一番话可以说是对1957年话的一种修正。但看来，他依然过于乐观。

1962年1月，毛泽东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没有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坦诚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又指出：在对建设规律的认识上，“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这是经过认真思索和总结后得出的正确认识。在此以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毛泽东虽然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知识不足，有很大的盲目性，但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则是掌握了规律，搞起来得心应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件、报刊一再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解决

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里程碑。这种估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许多人熟悉的，无须在此多述。

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比毛泽东在世时大大前进了。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对现有的认识也不可估计过高，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依然还不成熟，还有很多必然王国未被认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过高估计现有的认识，过分宣传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把一些正在试行中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政策加以肯定，视为“新发展”、“新贡献”，在实践上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使是比较正确的理论，若过分加以赞誉，也容易产生骄傲自满，封住了继续前进的道路。我国和苏联的历史表明，往往在讲“大发展”、“新贡献”时，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因此，在对待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与其看得容易些，不如设想得困难些，这样做较为有益，可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兢兢业业，不致取得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重犯因胜利而骄傲受挫的错误。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了严重的挫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管世界上发生多么大的狂风巨浪，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一定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天津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出版

注释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7 页。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
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9 页。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8、829 页。 《科学家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1 页。

毛泽东：《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57 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同上书，第 325—326、 326 页。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两则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多层次的、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如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需要认真研究。自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来，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进一步发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第二，端正领导的思想、作风，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这两条似乎是常识，然而在研究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却往往被忘记或忽视，故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好社会基本矛盾，这是缓解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

毛泽东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时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再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因此，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处理不好，作为其表现形态的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就会尖锐化，更谈不到处理好。

要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生产；一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两者都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

众所周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是经济关系。若生产力不发展，那就会导致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为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就会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从人类历史上看，当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经济相对繁荣时，社会矛盾就相对缓和，出现所谓“太平盛世”，而当生产力停滞不前或遭严重破坏时，社会矛盾就会激化以至发生社会革命。从当前世界看，情况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存在着阶级对抗，但在经济相对繁荣时期，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就相对缓和，而当经济陷入危机时期，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化。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若生产力发展缓慢，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矛盾同样也会尖锐化，也会发生请愿，游行、罢工、罢课，以至推翻现政府等事件。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没有搞好。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许多社会矛盾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和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是由于“穷”产生的。如，农民负担过重及由此而引起党和政府同农民关系紧张的问题，多半发生在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无需直接从农民那里收取各种费用，相反可以从乡镇企业、集体经济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援农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搞农业现代化，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和各种公益事业。又如，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矛盾，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引起的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之间的矛盾，都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至于因分配、住房、福利等引起的人民

内部矛盾，更是由于经济水平较低所致。因此，缓解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这里有一个发展生产力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要尽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必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要从根本上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两方面中，人们往往注意前一方面，忽视后一方面。而后一方面更为根本。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应始终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注意力引导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方向上去，切不可局限于就人民内部矛盾论人民内部矛盾。

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处理好社会矛盾，必须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不改革，生产力无由发展。不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解决了平均主义、高度集权、统得过死等弊端，使社会主义重新出现了生机和活力。改革也使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化，使某些被掩盖着的矛盾显露出来、尖锐化起来。改革所引起的矛盾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为了使竞争在公平的有规则的条件下进行，就需要有一系列的经济法规。在竞争中，必然还有一些企业被淘汰，会有一部分劳动者暂时失业。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保持社会的稳定，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如，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工农关系、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就必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对农业的投入，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支持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尽快使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富裕起来。

总之，生产力是根本，经济是基础。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

二、端正领导的思想、作风，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组成的复杂体系。在众多的矛盾中必然有一个起着领导的、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毫无异议的。

那么，什么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呢？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在1956—1957年间曾发表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论述。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57年春，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中明确说到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2月24日，他在同石家庄市、地委干部谈话时说：各方面提了很多意见，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这次提的意见来看，对付敌人的意见不提了，而提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批评领导，对

领导提意见。一切问题集中到领导。由此可见，国家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到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了。这是新情况，这是好事。因为敌人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3月4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党员干部会上讲：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表现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矛盾，更确切他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一时解决了的，以后会长期有的。3月24日，他在湖南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机关的矛盾，更确切他讲就是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分配不公也好，学生不能升学也好，什么事情搞得不好，都怪你领导得不好。4月27日，他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又讲了类似的话。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人民群众与领导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1957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社论着重谈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社论说：“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领导者到人民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需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集中的表现出来。”社论的意思很清楚，但没有使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的提法。

令人遗憾的是，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反复，重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当然也就不会再去研究“什么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样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虽然否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点，但很少有人提出“什么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为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全力捉住主要矛盾。我赞成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其理由可以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分析。

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平时不易显现，而在社会矛盾尖锐化时则表现得十分清楚。我国的整风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80年代波兰的工人运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虽然情况极不相同，事件的原因、性质各异，但似乎有一点是共同的：均表现为领导同群众的矛盾与冲突。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主要的就是利用领导与群众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从全国来讲，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执政党的存亡的大问题；从局部来讲，也是决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工作好坏的大问题。因此，从实践看：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它规定和影响整个社会矛盾的发展和解决。

从理论上说，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关系上的集中表现，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了一切人。领导者是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者，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承担者，是整个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和管理者。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通过领导者的领导才能得到满足和实现。因此，当人民群众的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势必与领导发生矛盾，严重的发展为对抗与冲突。领导者处于领导地位，整个社会矛盾能否正确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正确与否。“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其实，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讲，任何社会都有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所不同的是，在阶级社会，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虽然社会的现实生活一再表明，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但承认这一点是要有一定勇气的。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苏联虽然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但不敢承认领导与群众有矛盾。

有人担心，把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会不会导致把矛头对准领导。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这一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那就能更重视这一矛盾，自觉处理好这一矛盾，使领导者处于主动的地位。其次，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领导正确，工作做得好，领导者就能得到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信任、尊重与爱戴。人民群众决不会无缘无故把矛头指向领导。相反，不承认这一矛盾，不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就会陷入盲目性。结果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化，发生请愿、游行、罢工、罢课，以至酿成动乱。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丢失政权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不承认这一矛盾，潜伏着引发更严重更尖锐的矛盾。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何处理好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领导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正确，使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地得到满足。这是最重要的。第二，领导的作风要好，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有正确的路线，把经济搞上去还不行，还要有好的作风。领导作风不好，领导者自身会蜕化变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就会紧张。群众的不满、怨愤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出来，酿成重大的事件。有的外国人也看出：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社会也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了保证今后经济继续发展，通过政治改革等消除腐败是不可缺少的。即便市场经济进展顺利，如果腐败蔓延下去，也势必会丧失民心。”第三，领导要做好对群众的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正确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者的领导权，领导者的威信，是不可能由法律和行政命令来保障和维护的，而是要靠自己领导的正确来取信于民。

总之，在千头万绪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应牢牢捉住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处理好了，其他矛盾也就容易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就能得到较好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能生气勃勃地前进。

原载《理论学习与探索》
1993年第5期

注释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326页。

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邓小平以后”的重要课题》，〔日本〕《朝日新闻》1993年3月30日社论。

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之思考

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是整个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现实最为切近，最有意义，近几年来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更显得研究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性、紧迫性。

一、毛泽东晚期理论与实践阶段的划分

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晚期从何开始？

有人主张，毛泽东晚期从 1956 年开始，以《论十大关系》问世为标志。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毛泽东晚期思想之所以构成他一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是他同晚年失误越来越严重这一点相关联的。说到毛泽东晚期思想，一定会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失误。对《论十大关系》的评价学术界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篇著作基本上是好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我认为把它归到晚期欠妥。

我认为，毛泽东的晚期始于 1957 年反右运动，这是他从高峰转向走下坡路的开始。但研究毛泽东的晚期理论与实践，又不能从反右运动开始，而必须从 1956 年初开始（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从 1955 年底开始）。理由是，毛泽东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主要错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等）与 1956 年有联系，不从 1955 年底和 1956 年初说起，以后的事不易说清楚。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从 1956 年写起是有道理的。

笔者认为，从 1956 年开始到 1976 年毛泽东逝世的 20 多年，大致可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6—1957 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由高峰走向低谷的转折年底。毛泽东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结合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十分可贵的思想，将自己建国以后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但受到国际事件的影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立即由高峰往下滑，而未能继续上升。

第二阶段， 1958—1960 年。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大试验”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他的急于求成思想、平均主义、空想思想急剧膨胀并付之于实践，致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严重“左”倾错误是他搞起来的，起来后，又是他首先觉察的。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左”。但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等认真起来纠正“左”的错误时，却遭到他的严厉批判，高指标、共产风再起，直至 1960 年，大跃进的试验不得不中止，进入调整时期。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能自己纠正，在纠“左”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

第三阶段， 1961—1965 年，是调整阶段。经过三年挫折，毛泽东头脑变得冷静起来，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由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严重困难的局势比较快地得到扭转。另一方面，在 1962 年中共八届中全会上，他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的政治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他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到“反修防修”上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日趋严重。这一时期，毛泽东注意从哲学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和对现行哲学体系的改造。

第四阶段， 1966—1976 年，即十年“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一阶段毛

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把自己领导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打碎、重建。他虽然领导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一定的揭露和批评，虽然也纠正过一些极左的错误，但他始终维护“文化大革命”。他已不可能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无力结束“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悲剧。

我认为，这样四个阶段，比较符合 1956 年以后毛泽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过程：也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呈现的阶段大体相一致。

二、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若干问题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工作。唯有新的探索才有兴味。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做得很好，而下篇文章没有做好呢？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在晚年错误愈来愈严重，陷入了悲剧呢？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成绩，是成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认为基本上是抄苏联的，缺乏创造性。他要探索自己的道路，搞得更好些。这完全正确。可是，就是在此之后却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严重错误，反而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搞得那么好，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

1957 年，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可在实践上，反而不如以前，以前虽然也有扩大化的错误，但远没有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严重，把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文件上也写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事实上依然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至敌我颠倒，这又是为什么？

1958 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中发表不少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群众的言论，有些思想发前人之未发，可在实践上却陷入了主观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如何解释这矛盾？他自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从群众中来的，集中了群众的经验，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可实际上却脱离了群众，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矛盾又如何解释？

人民公社化运动明显地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承认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前进得远了一点。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却不怕反对者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法宝来打他。他为什么不怕？他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原理的？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错误地指责彭德怀等人犯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对不对？究竟谁犯了经验主义？

1963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左”的文件，可毛泽东为这一文件写的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正确的，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在这前后，毛泽东提出要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的指示，同时，全党从中央到地方，有几百万干部到农村、工厂搞“四清”，与工人农民“三同”，搞调查研究，照理讲对形势的认识应当比较符合实际，可事实上，却越来越脱离实际，最后竟得出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结论，

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头脑中“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概念是怎样形成的？是哪些国际国内、主观客观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吗？是偶然的吗？除了领导上的主观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外，有没有社会原因？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马列（而且也确实组织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严重背离了马列？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哲学，批唯心论，批形而上学，而另一面在事实上又唯心论泛滥，形而上学盛行？这中间有什么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弄清以上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一件艰难而有兴味的事。

三、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复杂性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正确与错误的交错并存

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中间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和试验中，从中国来看，历史更短，经验更少，毛泽东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谬误。1956—1957年，毛泽东批判斯大林的无矛盾论，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矛盾，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导致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左”的错误。1958年，毛泽东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带有空想的性质，应予否定。但其中包含的在农村发展工业、将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今我国农村乡镇工业即滥筋于此。毛泽东在1956年告诫全党要警惕形成“贵族阶层”，是非常深刻的。在这以后，他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这也是很好的。但他没有注意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而且过分夸大了党内的阴暗面。到了1964年底，他认为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工人农民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一个本来很珍贵的思想逐渐走向了反面，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不符合那时的实际的，但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的论点并没错。他对“修正主义”的概念有严重误解，但他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战略思想，不失为一种天才思想。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对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不要简单化，既不要作简单的肯定，也不要作简单的否定，而应作具体的分析。即使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否定，再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开始错误思想就占主导地位。

（二）理论与实践的多种复杂关系

一种是理论正确，实践也正确。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

晚年不多，但从局部来看，还是有的。如，1958年在纠正共产风时，毛泽东提出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搞一平二调等。又如，1961年初，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另一种是理论上基本正确，实践上没有能贯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如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关于“双百”方针。还有一种情况是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错误。不过，在毛泽东本人看来，这并不错误，而是正确的，结果是形成了错误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阶级斗争的实践。这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可简单化，需要具体分析。既不能因为理论上、文件上，有某些正确的话，就肯定其实践也真的正确；也不能因为实践上犯错误，反过来就简单否定其理论，认为其基本理论也错误。

（三）个人与集体的复杂性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不论正确与否，都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党与集体，不能认为正确的是属于集体领导的，错误的是他个人的。不能认为，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其他领导人则是正确的。事实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毛泽东虽负主要责任，其他的领导人也有责任，有的甚至比毛泽东还“左”。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早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认定中央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在晚年个人专断日趋严重，许多重大决策未经充分讨论就由个人作出，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错误确实是属于他个人的，或主要是他个人的。不过这种个人因素和集体因素的关系仍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最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一文件表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主要责任在毛，但这一文件形式上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得到中央的赞同，中央也要负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中共中央未作讨论。从在京中央领导人对聂元梓等人的1966年5月25日大字报态度看，他们是不赞成“四大”方式的。6月1日，毛在杭州个人决定广播聂等人的大字报，用“四大”搞“文化大革命”，这责任属于毛个人。可后来，这种方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得到了确认。总之，在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他个人的因素与集体的因素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既不能因毛是第一把手，又有个人专断的缺点，就把所有责任都归于他；又不能因许多理论、决策在形式上是集体作出的，或集体确认的而为毛泽东开脱主要责任。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涉及毛泽东的缺点时，有时必然会涉及到其他同志。我认为要改变一种不好的风气，似乎毛泽东是可以批评，而其他领导人倒不允许批评。对毛泽东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对其他人不能批评呢？不能认为批评某人的错误，就是反某人。

（四）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关系

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是国内因素与国际条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国内因素是主要的，这是不需待言的。但也不能忽略国际因素。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品的产量赶上英国的设想，

明显受到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在十五年内主要产品产量上赶上美国目标的影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更明显地与国际形势变动有关。

（五）现实因素与历史因素的复杂关系

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人民公社既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产物，又受到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激烈地批孔，批传统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深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渊博知识和精湛造诣曾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的話，那么到了晚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在晚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成了他身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总之，毛泽东晚期理论与实践是一组极为复杂的矛盾体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切忌简单化，片面性，必须注意具体、历史的分析。四、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应取的态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就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又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的情形同毛泽东在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但他上述话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时同样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做到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难在何处？难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要批评、揭露自己崇拜过的领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这在感情上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政治上也要冒一点风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严肃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又不能像剥削阶级的史学家那样搞“尊者讳”、“扬善隐恶”，不承认毛泽东的失误。现在出版的一些论著，对1956年以后毛泽东的理论，大多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面，而很少讲（有的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他的失误的一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读了这样的著作使人感到，你讲的毛泽东的正确理论确实没有错，但与历史实际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你讲了毛泽东理论上有多正确、发展、贡献，可在实践上却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这种回避的做法，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此相反的另一倾向是，有极少数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善意的态度揭露、批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是站在敌视毛泽东的立场上，以讥讽、嘲笑、漫骂、侮辱的态度批评毛泽东，而且往往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方法。他们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并不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取悦于人民的敌人。这种态度当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对毛泽东的错误，我们是要批评的，但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前进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因此我们只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上去批评。其次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是对成绩，还是对错误，要一是一，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再次，不仅要指出错误之所在，而且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最后，由于毛泽东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因此对他的论析要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要恰如其分，切忌轻率、主观、武断。

如前所说，毛泽东的晚期思想是同他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但决不是说，研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只是研究毛泽东的晚期错误。对于毛泽东的晚期思想中的正确的、合理的成分（那怕是一瞬间的天才闪光）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与发掘，否则会犯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被倒掉的错误。十年改革中所犯的某些错误，有的是属于没有经验，有的是没有记取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教训，有的则是在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时抛弃了其中合理的因素而走向另一极端所致。

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唯心论。但也应看到，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会对他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有重大影响。否认这一点，就会把历史唯物论的运用简单化，就不能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个人特色。毛泽东在 1915 年 11 月 9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性不好束

缚”。 “性不好束缚” 确是毛泽东一大个性特点。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在 1923 年 3 月致湛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 “天性富于调和性” 确是周恩来的一大个性特点。毛、周两人在青年时代的这种个性的不同，对他们两人后来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影响。在研究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时需要作一点个性性格与气质的分析。在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中除了“性不好束缚” 及由此引申的“奋斗”、“挑战”、“自信” 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性格是，厌恶特权，向往平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辗转在农村，进城后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厌恶等级、特权，希望尽快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毛在这方面的性格与第一个一样，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有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在研究时应加以注意的。

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1 年第 1 期

注释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6—663 页。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 页。

周恩来：《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湛小岑、李毅韬》，《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第 41 页。

“大跃进”的哲学思考

1958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大试验”。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它为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教训。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哲学问题的讲话、谈话，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从哲学上思考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件颇为有益的事。

一、由批评“反冒进”到“大跃进”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如何迅速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在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毛泽东已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两篇序之间的时间间隔虽短，但却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第一篇序言的中心是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反冒进”。他在第二篇序言中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速度也已解决，因此，原来“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写第二篇序言之前一个月，即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规定1967年粮食产量达一万亿斤。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为党中央所赞同。第二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一设想。在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讲两种领导方法，是讲慢一些、差一点的领导方法，还是快一些、好一些的领导方法。他讲话的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保守。但同时也指出：计划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不敢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难听。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较早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危险，接连提出要防止冒进。他在1956年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6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保守，也反对冒进。”在6月12日的会议上，针对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又一次作了说明，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月20日，《人民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

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不满。社论送给他看，他批了“不看”二字，事实上他并不同意社论的观点。经过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努力，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曾一度转到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反右斗争高潮过后，他虽然错误地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的注意力仍转回到经济建设上。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思想也受到赫鲁晓夫的启发。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1961年）苏联要在牛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受赫鲁晓夫的影响，毛泽东找英国加以比赛。他在11月18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讲，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公开宣布了这一设想。

毛泽东从1956年的反冒进中感到他的大跃进、高速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赞成。为了排除阻力，毛泽东反复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他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讲：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是偶像崇拜也好，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严厉地指责，反冒进的同志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他承认党内反冒进的人，心是好的，要搞社会主义，忧国忧民。但他又把反冒进的思想方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批评反冒进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空气紧张。

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

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他继续批评右倾保守。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整风反右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抽象地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不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总路线基本点所包含的一系列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总路线忽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八大二次会议后，急于求成的冒险主义急剧发展。6月份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1100万吨。在农业生产方面，出现了

明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6月初召开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华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年1000到1500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高指标是同浮夸风、说假话相联系的。

1958年的夏天，报刊上不断刊登“高产卫星”的消息。《人民日报》于1958年8月1日报导湖北省长风社早稻亩产15000斤；8月9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4200多斤；8月10日报导安徽省高丰社早稻亩产16000多斤；8月12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8275斤；8月13日，以通栏套红大字报导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同时又报导福建花生亩产10500斤。“卫星”比着放，谎话比着说，反正我要比你高。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在党报上大量报导这些假的“卫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在于许多领导人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纪录。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写道：“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多，89增长，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1070万吨，号召全民炼钢铁；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后，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冒险的试验在全国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反冒进，使得中央领导核心中没有人能像在1956年那样起来抑制他的非常明显的冒进。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过：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脚，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也会站住脚的。恰巧是那次批恩来他们那一部分的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在1955年以前，毛泽东提出过“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的主观主义”。他甚至还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但1955年以后，一个劲地批评反冒进，一个劲地反右倾保守，再也不提反对冒进的主观主义，再也不提防“左”，结果出现了大跃进、大冒进。在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头脑发热，陷入浪漫的幻想。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设想1959年的钢产量要比计划中的1958年的1070万吨翻一番还多，达3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8000亿斤至10000亿斤。1960年的钢产量为5000万吨，粮食为13000亿斤。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要达8000万吨至1亿吨，粮食达15000亿斤。工业生产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9—57%，农业生产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30.7%（见《关于1958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天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这里有一个问题，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战略目标和许多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还是

光凭主观的经验、直觉、意志、愿望提出的？看来是后者。这里不妨以钢产量的指标变动为例加以说明。1957年我国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的成都会议通过的1958年的计划指标是第一本帐（即公布就必须完成的）为625万吨，第二本帐（即不公布的争取完成的）为700万吨。这已是够大跃了。毛泽东对此还不满足。6月的一天，当时的冶金部长向他汇报工作，说今年钢产量可达九百万吨。毛泽东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于是8月的北戴河会正式作出翻一番的决定。不过，他当时心中也无把握，不踏实。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1958年的时间已过了大半，截止到八月底，只生产450万吨钢。他感到翻一番的目标很可能完不成。这次会议决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吨，争取达3000万吨。到了同年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1959年钢的指标太高了，改第一本帐为1800万吨，第二本帐为2200万吨。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感到指标过高，降为1650万吨。会后，又委托陈云就落实钢铁指标进行研究。到8月的庐山会议最后定为1200万吨。钢的指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现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是凭主观的感觉，感觉到指标太高，无法完成，只好一降再降。应当承认，1958年冬至1959年夏，工业上过高的指标有一定的压缩，但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结果“左”的思想又再度滋长，1960年的指标仍订得很高。1960年工业生产比1959年增长29%，钢产量为1800万吨。直到1960年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无法搞大跃进。大跃进的冒险试验不得不被迫中止，转入调整时期。

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除去浮夸部分，工业（主要是地方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钢铁、机械、交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的来看，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出大幅度的调整。粮食产量1957年为3900亿斤，1958年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降至2800亿斤，直到1964年才达到3880亿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钢产量1958年为1070万吨（合格的好钢为800万吨），1959年为1387万吨，1962年降至667万吨。社会总产值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平均每年增长11.3%；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则为—0.4%。年人均粮食1957年为406斤，1962年为329斤，1965年为365斤，还没有达到1952年的395斤的水平。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据《全国统计年鉴》资料，1959年全国人口为六亿七千二百零七万人，1960年不仅没有增加，相反减至六亿六千二百零七万人，净减一千万。1961年又减至六亿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净减三百四十八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1957年为23.22%，1958年为17.24%，1959年为10.19%，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1962年经济状况好转，上升为26.99‰。这一人口的波动并非计划生育的结果，纯粹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

面对严重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为了渡过难关，他在1960年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据他身边的卫士们回忆，有时他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他两腿浮肿，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周恩来劝他为了党的利益吃一口肉，他回答：“你不是也不吃肉吗？大家都不吃。”党中央领

导同志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看来近似乎荒唐可笑的大跃进呢？这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

二、大跃进与群众路线

从认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大讲哲学，大讲群众路线，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有些讲法颇为深刻，发前人之未发。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明显的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值得深究。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老年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我们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现在的多快好省概念是积累许多经验才形成的。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的经验，还有根据地的经验。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造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确实像“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首先是由河南省提出的，指的是农村。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赞赏这一口号，得到推广，但仍然是指改变农村面貌，后来又推而广之，指改变全国面貌。这种形式上的群众路线，使得毛泽东搞的大试验显得是有根据的，是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的。

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人脑是个加工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之于群众，要完整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这也是正确的。毛泽东注重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原料，但他忽视了“加工制作”这一点，同样的原料，由于“加工制作”的不同，可以制成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产品”。群众的意见是形形色色的，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有错误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但又不能仅仅依据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群众也会犯错误。因此党必须对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作出严格的、冷静的、科学的分析，否则就要犯尾巴主义、经验主义的错

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中一时的过急的情绪，或者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所起伟大历史作用所作的经典式的概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与民主革命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需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无疑的。毛泽东提出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问题出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搞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特点。他凭过去的经验，企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实现大跃进。他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他一再批评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开展一个全民炼钢铁运动，九千万人上阵，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砌起了土高炉，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望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的奇迹，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有些工程建设可以采用类似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但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

毛泽东十分爱惜群众的积极性。他批评反冒进、不允许反冒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反冒进是向群众泼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題往往采取原谅、迁就的态度。他在1959年说：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庐山会议上听到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坐不住了，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般不宜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不贯彻群众路线，可以不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建设积极性，并以适当的形式去组织和实现这种积极性，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三、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

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公开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如前面提到的，他在理论上是主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正确认识这一矛盾对把握毛泽东晚年的认识论思想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里毛泽东把右倾保守当作主要倾向加以批判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

了他的急躁情绪。但从纯粹的哲学理论上讲，毛泽东讲的是很全面的，既反对脱离客观条件、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心论，又反对忽视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

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阐述唯物论的言论。他在 3 月 25 日的讲话中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又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在成都会议上他一方面鼓动大跃进，但同时也感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因此，他也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既然已有虚报、浮夸的台风，为什么又不去挡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1958 年 4 月，他在汉口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这反映毛泽东虽然头脑已经发热，但还是有冷的一面。

在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要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抽象他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忽视了科学态度，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时忽视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破除了科学，破除了起码的常识，陷于浪漫的幻想和盲目的蛮干。

毛泽东在 1956 年就提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他在 1958 年进一步解释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穷二白，这是很对的。但他在克服一种片面性（把穷白单纯看成是坏事）的同时，却走向另一种片面性，片面强调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面，忽视了“穷”与“白”带来的困难，忽视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大跃进冒险错误的重要哲学根源之一是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认为，经过反右整风，经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

会主义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由此必然出现大跃进。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在1958年6月21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中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非常伟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

在大跃进中，有的农民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一口号具有明显的唯心论性质。当时《人民日报》不仅不加以纠正，反而一再加以宣传提倡。8月3日的社论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在《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中说，早稻亩产36900斤和花生亩产10500斤的“卫星”，“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8月27日，该报又以“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为标题，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报导。

在民主革命时期，弱小的红军为了战胜强大的白军，弱小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他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惠能和尚发表了一通评论。他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力流行。从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中多少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

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在关于人的主观能动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一次，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会面，谈话中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如：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毛泽东则以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说，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他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这是错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李达认为：“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大小，而是胆子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

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则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从纯粹的理论讲，毛泽东不会反对“人的主观能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李达也不会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就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一口号是肯定，还是否定来说，真理在李达一边，而不在毛泽东一边。从争论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

党的报刊上登的许多高产卫星，不少人是相信的，甚至有的科学家也受了骗。在有的报导中，不仅有省、地、县的干部参加“验收”，而且还有农业科学家参加“验收”。有一位不是搞农业的科学家受了高产卫星的迷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短文论证高产的可能性。这位科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二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倍。这位科学家的这种理论推算虽然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在未来，也许可以成为现实。但在1958年，在今天，以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种科学幻想。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引起领导者们的注意。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展览会时见到了这位科学家，并谈起短文。这位科学家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在1959年上海会议开始时，有同志问：“主席，您怎么也会相信亩产万斤呢？”毛泽东回答：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增产。当然，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决不是仅仅受了一位科学家文章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1958年大跃进的出现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归之于毛泽东个人。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起来后，浮夸风、高指标愈演愈烈。对虚报、浮夸，毛泽东持什么态度？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时，县社干部的说假话已十分严重，如有的社长说，每亩麦棉保证一千斤，争取二千斤，有的讲试验田的玉米计划争取亩产二万五千斤，水稻争取亩产四万斤，而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从报导中看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感到粮食吃不了。那么毛泽东真的相信粮食亩产几万斤？那又不是。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汇报说，亩产十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十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又说，这是省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革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11)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万斤菜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 1958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在同年 12 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 1958 年粮食产量是有九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七千四百亿斤，把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他提出，在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作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感到许多干部头脑太热，订的指标太高，为此，在武昌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在 11 月 23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他还指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他在 12 月 1 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1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但是，从总的看，毛泽东本人是爱热不爱冷，而且对冷热标准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武昌会议虽然降低了北戴河会议定的 1959 年的指标，但会议并没有提出反对冒进，而是继续搞大跃进，1959 年钢产量为 1,800 万吨，粮食产量为 10,500 亿斤，棉花为 1 亿担。正因为这样，武昌会议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

1959 年 2 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是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的继续，带有纠“左”的性质，在会上，毛泽东讲：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自以为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作为旁观者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可作为当局者，他实际上并没有改正斯大林“讲得很多，但不照着去做”的毛病。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是针

对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主义而发的。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命令风，毛泽东于4月29日向全国的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发了封信，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农业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13)

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的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一千三百万吨。

以上事实表明：从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泽东发热了的头脑稍为冷静了一些。与党内的多数人相比，他唱的是低调，是总的高调中的低调。他头脑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打架。他在纠“左”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思想。

四、大跃进与好大喜功

“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14)。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虽然能认识到成绩具有两重性，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成绩的消极作用。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是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原因。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一直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进入北京时，他又提醒自己和全党，防止胜利冲昏头脑，“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的经济经验，他比较谨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毛泽东不满足，决心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希望比苏联搞得更好一些，快一些。

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在胜利面前，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未能吸取这一教训。他过于自信了，总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他本人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党内外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已在1956—1957年时就有所觉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之时召开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为毛泽东代拟的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满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5)在“八大”的讲坛上发出的这一番话应当说是很及时的，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

鼓掌。但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恰恰是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骄傲了，思想上违背了这个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真理。

1957年整风时，党外人士曾尖锐批评党在这个时期有骄傲自满情绪。张奚若指出：这种骄傲情绪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批评说：“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对这些逆耳之言，毛泽东不仅没有认为是“忠言”、“良药”，以此引起自己的警惕、自戒，反而视为右派言论，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多次批驳，在1958年1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好大喜功”，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些话，抽象他讲，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好大喜功脱离了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

在成都会议上，他广征博引，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也说到，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有势如破竹的风格。在“八大”二次大会上，他又说：马克思写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道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毛泽东是站在发展论的立场上讲上述话的，学生超先生，后来者居上，这是人类认识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看，自信、大胆有余，谦虚、谨慎不足。他为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假象所迷惑。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此时的毛泽东有点飘飘然，他想创造奇迹，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的雄心可谓大矣，但脱离了实际，终成为泡影，跌了大跤。

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吃过急性病的亏。希望中国革命早一点胜利，快一点胜利，这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种主观愿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同这种“左”的急性病进行了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性病又一再发作。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渡过难关的本领。长征、三年困难时期、1976年的严重局面，都过来了，但在胜利面前，则容易犯错误。形势稍一好转，就犯急性病，日子稍一好过，就忘乎所以。毛泽东在临终前似乎悟出了这一道理，中国的事，急不了，急不得，“慢慢来，不要着急！”但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冒进。十年改革开放，成绩巨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但党内有的人过分夸大了成绩，急于迈大步，结果不得不得来一个调整。经过这一波折，终于认识到：无论在经济建设上、社会制度的改革上、对外开放上和治理整顿上，都不能操之过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的教训。”我们必须记取这一教训，“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

五、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性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人们对规律的认识需要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历史还很短，许多事情还在试验中。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毛泽东和我们党对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艰难性的认识同样也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要取得经验，“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在时间上“要缩短些”（16）。在 1958 年，他头脑发热，大大低估了认识经济建设规律的艰难性，碰了钉子后，他头脑变得稍为冷静一些。1959 年 2 月，他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成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

毛泽东在 1960 年 6 月写的《十年总结》中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1 年 1 月 18 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民主革命花了二十八年才成功，希望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象搞民主革命那样长的时间，是不是二十年就取得经验，比民主革命少八年，过去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对上面所引的 1957 年说的一种修正，对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艰巨性有了新的认识。但看来，还是很不够。

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承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没有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坦诚他说：到现在为止，“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17）在 1958 年时，他以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碰了钉子，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在对建设规律的认识上，他提出：“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短了反而有害。”（18）他承认最近几年我们“干过许多蠢事”。他的这一认识是经过曲折后取得的。他深切地感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他认识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的这种认识有助于

克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有助于防止骄傲自满。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评论说：苏联教科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又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说得极为中肯。社会主义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很远，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今天，离毛泽东的谈话又过了三十年。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成熟了吗？看来没有，远没有。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不同时代，现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东欧国家发生了剧变。这些都可以说是未能料到的，都说明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我国也几经曲折，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开放。从国内外的曲折中可以看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经过去年一年的大变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已取得了伟大成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我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值得庆贺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犯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要牢牢记取那惨痛的教训，以免再次重犯类似的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原载《胜利的旗帜光辉的历程》，《北京大学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七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

注释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21、223、224 页。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 年 8 月 29 日）。

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94 页。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同上书，第 205 页。

转引自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载《七一》杂志 1958 年第 5 期。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0—61 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1 页。

(11) 转引自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238—240 页。

(12)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08—809 页。

(13) 毛泽东：《党内通信》，同上书，第 812、813 页。

(1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

(1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毛泽东一般不请别人代为自己写讲稿，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劳动。在致完开幕词后，在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见逢先知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1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

(17)(18)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之我见

黄瑶的《对〈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管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黄文）独辟蹊径，对毛泽东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作了不同一般人的解释，读后获益匪浅。但黄文将“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长征的艰难困苦还不算难堪，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本色才是大问题”，是在“阐发七届二中全会的思想”。这就难以苟同了。以下谈一点我对这首诗的理解。

毛泽东说过，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见《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由于诗的这种特点，因此人们在读解一首诗时对诗中的事与物往往有不同的理解。黄文将“战锦”解为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之战，这完全正确。黄文又进一步引申为概括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亦即夺取全国胜利，孤立起来看，这似乎未尝不可。但照此理解，“战锦方为大问题”应解释为“夺取全国胜利才是大问题”，而不应该是黄文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后保持革命本色才是大问题”。此其

其二，这是更重要的，照黄文的解释，诗中无一处与罗荣桓有直接关联，无一处赞颂罗的功绩，那样的话，把这首诗看作悼念故去的任何一位参加过长征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都可以，而显不出是诗人专门吊罗荣桓之作。因此，黄文的解释很难说是与诗人原意相符的。

毛泽东在悼念罗荣桓的诗中吟出“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的诗句决不是偶然的。因为罗荣桓在辽沈战役的第一仗，也是关键的一仗——锦州之战中起了特殊的作用。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提出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说明了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并比较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但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林彪对此不很理解，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犹豫不决。10月2日，林彪因敌人兵力作了小的调动建议放弃已部署好的攻打锦州计划，主张回去夺取长春。毛泽东收到前线来电后于3日17时、19时连发两封长电，严厉批评自4个月来林彪在攻打长春问题上的错误，再次详细说明首取锦州和绝不能去打长春的理由。从两封电报中可看出，毛泽东对林彪的错误意见深为不满和焦急。当时罗荣桓是东北野战军的政委，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的，对林彪进行了说服工作。经过罗的工作，林彪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3日晨致电中央军委仍攻打锦州。罗荣桓一生功勋卓著，在锦州之战中说服林彪执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无疑是最突出的功绩之一。毛泽东在悼念他的诗作中讲到这一点是十分自然的。

黄文根据当时的电报认为，毛泽东在那时并不知道罗说服林这一情节。这一点笔者完全同意。但黄文认为在1963年12月以前毛泽东仍未知这一情节，这就有可疑之处。作为统帅毛泽东在战争胜利后同自己前线将领会面时，可以当着林、罗及其他人的

115

面问，也可以单独向林、向罗或向刘亚楼问，在党内生活正常情况下，这没有什么。何况整个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何况毛泽东一直重用着林彪。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在写诗之前早已知道罗说服林的这一情节。

(二)将“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赞颂罗荣桓的功绩，这可能较为符合诗人的原意。这句诗含有批评林彪之意也是明显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不用正面的肯定的方式而用批评林彪的方式来赞颂罗呢？我认为要解此疑须从最后两句诗入手。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罗荣桓的钦佩和对罗逝世的无限哀思、痛惜。这里的问题是：“国有疑难”的“疑难”是指什么？为什么诗人认为这“疑难”除了问罗君之外竟无他人可问呢？这是个谜。诗人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谜底。这谜有待注释家们去猜、去解。我认为，要解此谜须从那时毛泽东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去寻找。

人毛泽东那时的兴奋中心是在反修防修这一点上看，很可能是他自己的接班人的问题。从1945年中共“七大”起，刘少奇一直是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1959年，毛泽东提议让刘少奇接任他辞去的国家主席职务。1961年，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公开向外界承认：刘少奇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但是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对刘少奇逐渐有了看法，认为刘右倾。在考虑反修防修这一总的大问题时，他自然会想到自己的接班人怎样，想到能不能有更合适的人去代替刘少奇。正处于重用之中的林彪自然是他考虑的一个人选。

林彪有令毛泽东喜爱的一面，但也有令毛泽东不安的一面。林彪历史上的错误，毛泽东很清楚，举其大者有：井冈山时期，提出“红旗能打多久”；长征途中，在1935年5月会理会议前写信，不同意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要求改变中央军委领导；解放战争时期则有前面已提到的辽沈战役中的错误，等等。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8年提议让林彪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又让他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但并没有让他插手地方工作。林彪能否进一步重用，做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没有把握。林彪为人如何？靠得住吗？这些只有同林彪长期共事的人才能知道。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与林彪共事最久的要数罗荣桓。在毛泽东看来，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忠心耿耿，坚持原则，是可信赖的。因此，要了解林彪，只有询问罗荣桓。现在没有等询问，罗已离去。毛泽东哀思良久，难以直抒胸臆，只能发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叹惜。

(三)如果以上解释言之成理，那么“长征不是难堪日”一句，就不是泛指长征中所遇到的困难了，而是指林彪写信一事。林彪写信，毛一直误认为是彭德怀鼓动的结果（当时林、彭分别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军团长，林在信中提出，要彭出来指挥红军），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起此事，把帐错记到彭德怀身上，据《彭德怀自述》讲，当时林彪“庄严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可毛泽东以后仍多次提到此事。这说明林彪写信一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记。林彪的要求被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拒绝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困难。所以，毛泽东才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在罗荣桓逝世后的几天中心情十分悲痛，很少讲话，若有所思。经过数天的酝酿。运思，最后用了一个通宵，写成了此诗。看来，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思绪万千，想得很多。既回忆起与罗荣桓一起造反闹革命相见又相别的情谊，想起罗一生的为人、功业，想起罗在锦州之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又想到眼前的反修防修，想到自己身后之事，想到与罗一起共事多年的林彪，想到自己曾打算征询对林彪的

意见，以便决定能否让林做自己的接班人。最后，毛泽东将这千思万绪，凝成《吊罗荣桓同志》一诗。

原载《党的文献》
1990年第5期

毛泽东为接班人林彪写的“备忘录”

——《毛泽东致江青信》之我解

“文化大革命”伊始，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在武汉致信正在上海的江青，信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分析，又有对党和国家未来前途的预测；既有对“右派”的抨击，又有对“朋友”林彪的婉转的批评；既有对自己的自我解剖，又有对江青的劝诫：既讲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既有政治，又有哲学。信的文辞精美，成语典故迭出，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这封信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

由于这封信有上面所说的特点，所以从它公开之时起，人们便对它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近日读了金春明教授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党校论坛》1989年第5期，以下简称金文）和胡为雄讲师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党校论坛》1989年第8期，以下简称胡文）颇受启发，但又感到他们对信主题的解释似有可商榷之处。借此机会，谈一点我对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粗浅看法。我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选林彪为自己接班人时写的一个“备忘录”。

一

金文认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金文对江青一伙所散布的毛泽东的信是为揭露林彪反动本质而写的说法进行了驳斥，是有说服力的。但金文认为，毛泽东的信虽“有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但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对自己的解剖”。这一点是我难于苟同的。

胡文不同意金文的见解，认为毛泽东的信的侧重点不在于对自己的解剖，而在于“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这更是笔者所不能赞成的。

我虽反对毛泽东写这封信是专为揭露林彪反动本质的说法，但我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中心议题确实是林彪，而不是别的什么。

首先，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林彪催着中央发他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而毛泽东对此讲话则有一定的保留。整个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

其次，毛泽东的信是写给自己夫人的，而且不准备在他身前公开。但在写信后的第三天（即7月11日），毛泽东主动要因外事活动来武汉的周恩来留一天，第二天毛泽东让周恩来看了信的抄件。（据1972年江青的一次讲话，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见过信）周恩来看过信后向毛泽东提出，他去向正在大连的林彪做工作，劝告林彪改正，不要再讲那些提法。毛泽东同意了。倘若信的重点是自我解剖，那么毛泽东似可不必急于给周恩来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又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提法。

第三，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将信公诸于党，并把它作为批判林彪的思想武器。倘若信的重点是自我解剖，那如何解释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呢？倘若这封信正如胡文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的政治哲学，遥控江青如何下一步动作的话，那这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既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更不能公诸于世。

凡此种种，我认为，从毛泽东写信的直接动因及此信所起的社会效应来看，信的中心点是林彪。

二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封信中着重议论林彪呢？是像江青在 1972 年所说的那样，那时毛泽东已看出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马列主义者吗？显然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简单说来，此时毛泽东正下最后的决心让林彪来代替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但又感到对林彪没有十分把握，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为了说明这一看法，需要对毛泽东更换接班人的过程作一分析。

从 1945 年中共“七大”起至 1966 年 8 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止，刘少奇是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个人物，1959 年，毛泽东让刘少奇接任他辞去的国家主席职务。1961 年，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向外界公开承认，刘少奇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但是事隔不久，从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对刘少奇逐渐有看法，认为他右倾。在 1965 年初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公开冲突，认为刘少奇搞修正主义。1966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暗指刘少奇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定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决策。当他下令 6 月 1 日全文播发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时，他已选定用“大民主”的方法来揭露党内的“黑暗面”，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各地的“代理人”。所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构想”在 5 月底 6 月初已大体确定了。

刘少奇不行，谁来做接班人？这更是令毛泽东费神的大问题。在五六月间，毛泽东初步选择了林彪做接班人，但又没有十分把握，所以还未下定最后的决心。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放心，恐怕不仅仅是对林彪的一些提法不妥，而是有更深的渊源。林彪有令毛泽东欣赏的一面：能打仗，有思想，敢于发表意见，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林彪提倡“活学活用”、“四个第一”更合毛泽东的心意，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又最年轻（1966 年时 59 岁）。但林彪也有令毛泽东不安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历史上的错误是清楚的：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红旗能打多久”；在长征路上，在 1935 年 5 月会理会议以前写信反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要求改变中央军委领导；在辽沈战役中，一再固执己见，坚持先打长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发十几封电报后，经罗荣桓做工作，林彪才服从命令，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撤离长春，南下北宁线，首取锦州的作战方针等等。从笔者现在所能见的材料看，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放心与疑问在《吊罗荣桓同志》的诗作中已有表露。

1963 年 12 月 16 日，与林彪共事最久的罗荣桓元帅逝世，毛泽东深为悲痛，评价罗荣桓是很有原则性的人，他对敌狠，不背后议论人，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很不容易啊！毛泽东亲自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据在毛

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在这以后的几天中，毛泽东很少讲话，若有所思。经过反复酝酿、构思，写出了《吊罗荣桓同志》七律一首。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我认为，对诗中的“斥鷃”、“昆鸡”、“大鸟”，“老鹰”等比喻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但诗中“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两句的含义是比较确定的，即是对前面提到的林彪在长征中和辽沈战役中所犯错误的批评。1963年时，毛泽东正重用林彪，可为什么又要在悼念他人的诗中揭林彪之短呢？我以为要解此疑问，不仅要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联系起来，而且要从诗的最后两句入手去解。“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两句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深深的钦佩和对罗的离去的无限惋惜。这里的问题是：“国有疑难”是指什么？从泛义上讲，当时毛泽东关注的中心问题是 中国如何反修防修，如何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所问的对象是与林彪共事多年的罗荣桓，毛泽东要问的“疑难”又没有这样宽泛，而一定是与罗有关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对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已不很放心，谁来代替呢？这显然是毛泽东思索的一大问题。正在重用之中的林彪自然是他考虑的一个人选。但林彪能否担当此大任，实在没有把握。林彪为人如何？只有与他长期共事的人才知道。党内高级干部中与林彪共事最久的要数罗荣桓，而罗又是可信赖的人。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要进一步了解林彪，只有询问罗荣桓，此外无第二人。罗已离开人世，毛泽东哀思良久，难以直抒胸臆，只能发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叹息。诗中提到林彪的短处，并不是斥责林彪，而是反映了作者要进一步重用林彪之时的一种矛盾心态。如何反修防修是当时毛泽东头脑中的兴奋中心，林彪能否进一步做接班人是毛考虑的问题之一。所以，他在悼念罗荣桓的诗中提到林彪也就不奇怪了。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也许追悔为什么不早一点问疑于罗荣桓呢？经“文革”劫难的中国人自然也会想到，要是罗荣桓健在或晚逝几年，而毛泽东又真能问疑于罗，林彪也许当不成接班人，“文革”虽会发生，但很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

罗荣桓虽然离了人世，离开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头脑中对林彪的问号并没有消失。

鉴于国际共运的教训，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问题越来越重视。在1964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了“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对此讲话，虽然可以从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即普遍地从上到下地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其中无疑也包含着他自己对后事的准备，包含着对自己原有接班人的重新考虑。到了1966年春，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已初步选择了林彪做接班人。在此以前，毛泽东虽然重用林彪（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选力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但不让林彪插手部队以外的工作。到1966年，则通过江青，让林彪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工作。之后，林彪在3月11日给工交战线写了一封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信。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提出自己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即“五七”指示）。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这些都表明，在1966年春，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急剧上升，他的工作已不限于管军队了。

毛泽东选择林彪代替刘少奇一事是肯定了的，但在党的领导层中，了解

毛泽东更换接班人意图的人极少极少。康生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者之一，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大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甚至恶毒攻击和诬蔑朱德总司令，可却说了一些恭维刘少奇的话，后来他承认，当时只想到彭真有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刘少奇）有问题。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像康生这样的人到5月份还不能完全了解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意图，至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不过，此时的林彪是显然地感觉到了毛泽东的意图了。林彪催着中央发“五一八”的讲话，目的是要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自己当接班人作舆论准备。毛泽东也猜想到这是林彪催他批发“五一八”讲话的目的。但毛泽东对林彪仍有所保留。

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林彪把自己装扮成“紧跟”领袖、“高举”红旗的好学生，毛泽东虽然在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党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上陷入了主观主义，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毕竟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林彪的“天才”、“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是不妥的，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唯物论。为此，他在4月的杭州会议上向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了，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值得反复玩味。这几句话流露了毛泽东充当钟馗的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语，“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

三

毛泽东在信中确实用较多的文字反复自我解剖。这种解剖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要多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这是表层的意思。从深一层看，这种解剖是为了全面坦露自己的气质与个性：自信而又不很自信，以自信为主，有虎气，有猴气，以虎气为主。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写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警言。他在信中又说：在少年时代写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这都是显示他自信的一面、虎气的一面。在以后的整个生涯中，毛泽东给世人的印象是：叱咤风云，气吞六合，不怕鬼，不信邪，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为敌人所吓倒，无论是在同国内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同党内错误倾向斗争中，还是在同自然界的困难作斗争中，他总是胜利者。因此，世人只看到他自信的一面，虎气的一面，而对他个性中的不自信的一面，猴气的一面，往往看不见，或“往往不信”。毛泽东的自我解剖就是为了向大家但露他的另一面。

我认为，毛泽东在信中讲自信又不很自信，有虎气又有猴气，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他对搞“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基本上打倒“右派”是有信心的，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又不很自信，认为有可能发生右派的反共政变。他同意将林彪的讲话发下去，

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但对这种决策又不很自信，对林彪仍有疑虑，以至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粹。他认为，当时首要的任务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至于谁代替刘少奇的问题，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前，只能是林彪。

对林彪的这种复杂的矛盾的看法，毛泽东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决定1972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但江青既没有接受劝告，又没有理解毛泽东给他写信的真正意图。相反，她头脑膨胀，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猖狂反党反人民，堕落成人民的罪人。

总之，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决不是为了揭露林彪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是为林彪做接班人之前所写的“备忘录”。事实上，这信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在做了这种准备后，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同刘少奇摊牌；一方面正式选定林彪为自己接班人。由于他人不知毛泽东在做出这一战略决策的矛盾心态，所以照例欢呼这一决策的英明、伟大。

毛泽东选定林彪为接班人，可他头脑中对林彪的问号并没有消失。正因为他对林彪有一定的保留，所以他不顾高龄，始终亲自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而不退居二线放手让林彪去干，同时又让周恩来总理辅助他工作。而林彪呢？他当了接班人，但仍感到老人家对他有戒心，感到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并不稳固，于是在1971年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演出了抢班夺权的丑剧。同样，正因为毛泽东心存戒心，所以当丑剧一开场，就被粉碎了。

在毛泽东的最后十年里，接班人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他脱离了集体领导，因而一错再错，这个教训非常惨痛，值得永远记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毛泽东个人选林彪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①。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涵丰富，正确而全面地理解这封信，对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思想和行动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的浅见很可能带有主观随意性，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0年第3期

注释

①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主义与民众

——由李大钊到毛泽东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有五千多万党员、领导着一个十一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由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七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的社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制度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认为主要靠两条：一条靠马克思主义真理，一条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正是靠这两条起的家，靠这两条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阶级敌人，战胜了一切社会的和自然的困难。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力倡这两条的是李大钊，最好地坚持与发展这两条的是毛泽东。饮水思源，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李大钊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不由得深深感到，今日我们仍需要靠这两条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一、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最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并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指导的是李大钊。1918年12月，当举世若狂地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一部分人呼喊美国威尔逊总统万岁时，李大钊却旗帜鲜明地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全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这件事与其说是威尔逊的功业，毋宁说是马克思的功业，列宁的功业；布尔什维克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将来的世界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企图阻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社会革命。李大钊则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胡适将主义与问题对立起来和反对社会革命的谬论。他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多数人的共同运动离不开主义作指导；一个主义在实际政治的运用上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所不同，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合实际的可能性；我们一方面认定我们的主义，宣传我们的主义，一方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再次告白社会：“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主义既定，李大钊便用心搜集材料，认真比较研究。他利用报刊、杂志、大学讲坛、各种研究会等，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与指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正风靡世界，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又说：对一个团体来讲，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全体之心志，对外犹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他号召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马克思的学说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

李大钊凭着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指出：“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有普遍意义，但“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

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意应用。他说：在纪念马克思诞生的日子时，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这样，“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身体力行，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指导学术研究和对反动思潮的批判。

李大钊是位革命家，又是位名重当世的教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比当时的其他人深刻些。他影响和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广泛阅读中外著作。他喜爱哲学，长于理论思维。在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毛泽东受李大钊的影响，亦重视对主义的研究。1920年3月14日，他在致友人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同年11月25日，他在致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更明确他说：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同李大钊一样，毛泽东在注意研究主义的同时，也很注意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调查及研究，注意将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有很强的革命性，但理论修养不高。在党的成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强调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很对的，可他没有认识到加强理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性。在土地革命时期，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承认党的理论修养不足。恰巧是被教条主义者诬蔑为“狭隘经验论”的毛泽东，深切地感到党的理论水平低下。1929年11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内教育、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等均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他本人想方设法搜集理论著作，研读马列。他认为：要是在大革命时期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党就不会犯错误。因为列宁在该书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保持领导权的重要性。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钻研理论，尤其是哲学，并将生动的、丰富的、用鲜血换来的革命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亲自组织党内高级干部读书，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延安整风，毛泽东并没有因反教条主义而轻视理论学习。在整风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提倡看书学习。1941年，他任中央研究组组长，拟定研究方针，读书目录。194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说：“理论教育的成败是革命成败的第一关键。”1942年11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提高了全党的

理论修养，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准备。

二、“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巨大的作用，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了这种实践的需要，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的同时，尤需要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离开了广大群众，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依靠群众这一优良传统又是肇始于李大钊，成就于毛泽东。

李大钊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批判了英雄史观，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指出：迷信英雄，必然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政治上导致专制主义。他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国民应自觉自己的权威。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前期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重视人民群众的启蒙思想家。在对群众的看法上，他与陈独秀适成鲜明的对照。

李大钊注重众庶这一优点是他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因素。他在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之前还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主义与民众是同样重视的。他指出：20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军阀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阻碍这新运动的进程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精辟阐述和对英雄史观的深刻批判构成了他理论的一大特色。他指出：历史的纯正主位是群众，而决不是几个伟人，一切历史的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的；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我们头上的铁锁解开；唯心史观把历史归之于少数天生的圣人、王者，而把广大群众的个性消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旧的史书成了当权者愚弄人民的器具；唯物史观则要求人们认识历史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应该自觉自己的势力，联合起来去创造一种新的历史。

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李大钊注重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五四时期，他号召进步青年学生到工农中去，用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启发、教育工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大革命时期，他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革命性、正义性和伟大作用。

同时，他十分中肯地指出农民运动的弱点，要求党派人到农村中去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他指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

毛泽东受李大钊的影响，也从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歌颂世界革命大潮，歌颂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联合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指出：改造社会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很重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将它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

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通篇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本思想。在以后长期的、艰苦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紧紧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由此逐渐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能战胜，任何“法宝”也能攻破。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那将一事无成。

三、坚持主义，依靠群众，夺取新的胜利

真理是平凡的，也许正因为平凡，真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遗忘，只是经历了现实的教育后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一靠马克思主义，一靠人民群众，这是最普通最平凡、然而对共产党来讲却是最根本的两条真理。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重提这两条真理尤为重要。

先说坚持主义。

从国际范围来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较快，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在 60 年代以来，出现了停滞与挫折。1989 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社会内部则发生严重的动荡与危机。国际资产阶级正处于攻势，猖狂得很。在西方舆论界，“社会主义大失败”的论调甚嚣尘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挑战。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曾出现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但那次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远没有这次厉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原因很复杂，从共产党自身来讲，既有教条主义的远因，又有修正主义的近因。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由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受国内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在批评教条主义和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导致了党的性质的蜕变和无产阶级政权的丢失。东欧国家的剧变是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惩罚。在当前的形势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攸关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从反面说明：共产党一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无产阶级政权丢掉了，而且共产党自身也无法生存。

从国内情况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拨乱反正，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党的理论水于有了很大的提高，以新的实践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低估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绩，否认它在理论上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贡献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成熟，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的理论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这是大家深切地感受到的。这几年新提拔上来的一批新干部，他们虽然有比较好的专业知识，但他们普遍缺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训练。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陈云一再讲，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尤其是

要学好哲学。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郑重提出：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但邓小平和陈云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意见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有些是难以避免的，有的则是由于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发生摇摆所致。在拨乱反正时，否定了一些不应当否定的东西，忘记了一些不应忘记的党的基本经验，在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时候忽视了理论，忽视了政治，1989年的政治风波深深教育了全党。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1)以后，江泽民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视察各地的谈话中，多次谈到理论学习问题。

应当承认，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气氛比以往高了，有的部门和地区切实地在抓理论学习。但能否说，现在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已形成了学习理论的浓厚空气了呢？恐怕很难说。不用说别的，就从形式上看，我们今天的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宣传中，很少有关于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报导。至于各级领导是否从思想上真正重视理论学习，是否以身作则带头进行学习，则更是问题，有些领导干部虽然也讲学习的重要，但他们只是“领导”别人学，自己却不学。个别人为了“完成”写读书笔记的任务，竟请人捉刀代笔。有的领导干部到党校学习，把学校布置写的论文交由所在机关的“秀才”们去完成。党内学习理论空气并不浓厚，这是令人担忧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读书，带头研究问题，如毛泽东所做的那样。如果主要领导干部只是号召别人学、领导别人学，而自己则不学，那怎么能带动和指导同级及下级干部的学习呢？领导者若自己不读书，不研究问题，那他就毫无主见，只能人云亦云，弄得不好，就有可能被有的“秀才”牵着鼻子走，跟着犯错误。

再谈依靠群众。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一如继往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但他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为了大跃进，他强调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大搞群众运动，结果事与愿违，并没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他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继续沿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揭发党和国家机关内的黑暗面，结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这方面的失误。但在纠正毛泽东失误的时候，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怎么讲了。在一部分干部中群众观点淡薄了，群众路线遗忘了，党群关系不怎么和谐了。极少数人则脑中根本没有群众，

有的只是自己及周围的少数人。这种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不满。有一部分企业在承包后，承包人与工人的关系则成了雇佣关系。据有的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工人感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在下降。在农村，有的地方干群关系也比较紧张，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严重妨碍了广大人民群众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针对党群关系中出现的什么情况、新问题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3月12日）。决定提出要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这一决定十分及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切实贯彻执行，而不是停留在纸上。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各项事业中，如何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需要积累经验，进行新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走过七十年了，这是胜利的七十年，也是多灾多

难的七十年。七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度过难关的本领。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任何困难都能被克服，任何敌人都能被战胜。这是我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年时得出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1991年第3期

注释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李大钊：《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李大钊文集》（续），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76页。

李大钊：《这一周》，同上书，第711—712页。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毛泽东：《致罗漱阶信》，同上书，第554页。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69页。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同上书，第603页。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文集》下卷，第874页。

(11)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毛泽东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和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敬仰鲁迅，称颂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喜欢读鲁迅的书。1949 年 12 月，他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期间，他利用零星的时间读鲁迅的书。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1966 年 7 月 8 日，他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一再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精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建议同志们“读点鲁迅”的书。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比鲁迅小 12 岁。鲁迅卒于 1936 年，比毛泽东先逝 40 年。他们两人从未会过面。除鲁迅给毛泽东发的庆贺长征胜利电外，迄今未发现这两位伟人之间有任何的文字往来。那怎么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两人的心相通在哪些方面？笔者不揣冒昧将自己在读毛泽东和鲁迅著作时的一些感想写出，供读者参考。一、两心相通之一：两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毛泽东与鲁迅，虽然他们的出身、经历、职业、以至性格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思想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特点，但他们两人有着更为根本的共有的世界观和人格。这是两心相通的基础。

毛泽东与鲁迅的相通，首先在于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化了的。

鲁迅早年相信进化论。1918 年后，开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1927 年，他目睹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在血的教训面前，由进化论前进到阶级论，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注重其应用，把它作为武器，解剖社会，解剖敌人，也解剖自己。他把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阅历、人生体验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在他那里已不是词句，更不是招牌，而是他活的生命体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使鲁迅获得更强大的创造力和更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和广大工农大众的心相通，和中国共产党的心相通。鲁迅晚年钦佩毛泽东，钦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联合茅盾致电毛泽东、朱德，庆贺长征胜利。贺电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驳斥中国托派对中国共产党所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攻击，为毛泽东先生辩护，并声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的心，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的心，千万红军将士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在当时上海，有一些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却不承认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或明或暗地对鲁迅进行批评攻击。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这些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共产党员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衡量鲁迅，结果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说成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则不同。众所周知，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他的思想和行

动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正因他本人有此优点，因此，他能识得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他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他说：“他（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之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毛泽东与鲁迅都有对中国社会深切的认识，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是他们两人最大的共同优点。1977年4月，周扬对采访者说：我和毛主席接触的时间很多，“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主席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主席、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主席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大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因此，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人生观，共同的语言。他们两人都立足于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爱。鲁迅认为，革命文学根本目的是为工农大众，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这一思想。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引了鲁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鲁迅憎爱分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毛泽东高度赞扬鲁迅的这种人生境界，指出：这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两心相通之二：两人都有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经历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在上海用笔同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作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将，可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因受教条主义影响，患有幼稚病和宗派病，对鲁迅横加攻击。“创造社”的人诬蔑鲁迅是“有闲阶级”，“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蒂”。因此，鲁迅不仅要同敌人战斗，还要回敬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攻击。他深刻地指出革命文学运动中犯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说：“他们（指倡导革命文学运动者——引者注）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为了回答“创造社”们的攻击，鲁迅认真研究了马列著作。他在《三闲集》的序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毛泽东亦有类似的遭遇，因此对鲁迅这种经历印象很深。1957年3月10日，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迫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

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由城市转到农村，用枪进行战斗，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在他领导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军事“围剿”。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可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却被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保守”、“游击主义”等。毛泽东本人受排挤，打击，在党内毫无发言权。1933年12日，在鲁迅身旁战斗的鲁迅的学生、密友冯雪峰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详细地向冯询问鲁迅的情况。可以想象，正处在被排挤中的毛泽东在听了冯雪峰有关鲁迅受攻击的情况后一定感慨万千，对鲁迅充满同情与敬意。

毛泽东为了回答党内教条主义的攻击，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愤读书，钻研哲学。他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名篇，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党内教条主义者“逼”着毛泽东研究马列著作。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上说：“对我最有益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的人是错误的’”。

鲁迅对革命运动内部滋长起来的洋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新八股不仅“鸳鸯蝴蝶派”和低级庸俗的作家有，其余的人也有。“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动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物，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11)鲁迅所批评的新八股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他的这种批评超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党八股深恶痛绝，把它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对象之一。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充分肯定鲁迅对新八股的揭露。为了反对“党八股”，他还专门引了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许多日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12)

中国有句俗话：“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我想，毛泽东有和鲁迅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相似经历这一点，使得他在读鲁迅的著作时一定会感到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三、两心相通之三：两人都严于解剖自己

鲁迅的笔，如毛泽东所说，“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13)，使敌人为之心惊胆寒。鲁迅是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他不仅无情地解剖敌人，而且也不断地解剖自己。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14)。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15)，正因为他不断地解剖自己，所以他能与时俱进，最后彻底背叛了自己原来出身的阶级，成了封建社会的贰臣逆子，向旧社会反戈一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自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声誉日甚一日。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照现了时事，揭露了社会，为敌人所害怕憎恶。时入根据他对中国革命和文学的贡献，称颂他为中国的高尔基。但他十分谦虚，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

己还要作更大的努力。对杂文，他说过：“他的杂文是在围剿中生长起来的。‘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16)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几次曲折，付出了血的代价后，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在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40年代，在延安，50岁祝寿颇为流行。1943年，在毛泽东50岁之际，党内有人提议为他祝寿，并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17)他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规定为全党指导思想。在“七大”的预备会上，他提出：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他承认：自己也犯过错误。他还说：“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18)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建议不再用“毛泽东思想”，“八大”党章不再写“毛泽东思想”。小心谨慎的结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56年以后，尽管毛泽东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他对鲁迅严于解剖自己这一点还是很赞赏的。1958年5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从思想上政治上随时解剖自己，学鲁迅，看鲁迅全集。”在晚年，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大搞造神运动，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林彪的造神运动持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感到有此需要，以便打倒他认为的“右派”；另一方面，他又感到不安，认为林彪说的不符合事实，其用心可疑。1966年7月8日，他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当然此时的毛泽东，由于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估量，头脑发热，无法做到严于解剖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严于解剖自己的重要。不过，从毛泽东的信中可见，毛泽东主观上自认为：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己的心依然是跟鲁迅相通的。

四、两心相通之四：两人的骨头都是最硬的

鲁迅生活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但他决不屈服于黑暗的现实。在青年时代，他立下决心，舍命救国，“我以我血荐轩辕”（1902年自题小像）。在反动的白色恐怖中，他“怒向刀丛觅小诗”。对敌人的暗杀恐吓，他的回答是：“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9)鲁迅的一生是顽强战斗的一生。如毛泽东所说：“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20)鲁迅极端地鄙视奴化了的买办文人，无情地揭露拜倒在洋人面前的西崽仔的奴才相。毛泽东高度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

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21)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总有一些人当惯了奴才，在外国洋人面前摇尾乞怜，唯唯诺诺，直不起腰来。

毛泽东与鲁迅有着相同的崇高的人格。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毛泽东之前很少有人称颂。毛泽东之所以能感知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因为他本人的骨头也是最硬的。他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己任，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一生喜欢挑战，应战，敢于藐视一切敌人。他深信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能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他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他敢于抗击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的进攻，顶住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干扰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干涉，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屹立于世界舞台上。毛泽东称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更有理由称毛泽东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和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正是有了这种无畏无惧、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中国才不为帝国主义所灭亡，才不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才赢得独立自由，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相通之处，自然不止于以上四个方面。两位历史伟人伟大之所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遗产。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3年第3期

注释

(13)(20)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4页。
《红色中华》1936年10月28日。

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页。周扬：《毛泽东的话帮助了我》，转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鲁迅：《三闲集 序》，同上书，第6页。

(11)鲁迅：《透底》，《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页。

(1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

(14)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81 年版，第 284 页。

(15)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57 页。

(16)鲁迅：《准风月谈 后记》，《鲁迅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11 页。

(17)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2 页。

(1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 页。

(19)鲁迅，《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 1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24 页。

王明的谎言与历史的真相

王明这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在 1931 年 1 月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前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60 年代后，在其外国主子的指挥下疯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垂死之年，他还以中国革命“参加者”的身份写文章、出版著作，歪曲历史真相，恶毒攻击和诽谤毛泽东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背叛》的反革命的谤书中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毛泽东思想（他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为了维持个人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而创造出来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读者恐怕很想知道王明是如何编造的，故摘其要点如下：

从 1941 年 9 月开始，毛泽东在同政治局同志的个别谈话中，常常谈到他自己想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愿望。下面就是毛泽东和我进行这种谈话的内容。

——王明同志，我想创造毛泽东主义？你看怎样？

——为什么？

——一个领导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义”，那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能为别人推翻，在他死后，也会受到攻击。要是有了“主义”，那情况就不同了。你看，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但没有一个人敢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及联共（布）也有不少集团和派别，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国民党里也有不同的集团，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主义，即使“七大”选我为中共中央主席，但别人也能推翻我。

毛泽东还谈，要创立毛泽东主义，我仍然保留马克思主义，反对仅仅是列宁主义。

我公开对你讲，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义”，一般说来，那他就没有好的结果。

你的什么著作可以作为建立毛泽东主义的基础呢？——我问。

什么著作？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奠基的理论著作。在 1939 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我注意的正是这一点。但那时没有公开讲，现在可以讲了。

够了，为了不使本文过长，我就不再引了。

王明在临死前的 1974 年煞费苦心写的这段“回忆”，有问有答，活龙活现，听起来像真的一样，颇能迷惑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谎言掩盖不住历史的真相。王明在他的反革命谤书中只能靠“回忆”（实即编造）他和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谈话”来作为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材料。他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材料）列举出有第三者在场的谈话和文献资料。在这里我们倒可以列举大量的史实和文献来戳穿王明所臆造的谎言。

王明在他的谤书中，把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说成是靠阴谋手段取得的和维持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莫大歪曲。毛泽东同志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人为的树立的。“党在

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亦为当时的共产国际所承认。在 193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谈到：“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曼努意斯基在 1939 年 3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支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就是它那样提拔和造就新的干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如果说有准靠阴谋取得领导权的话，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靠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靠耍弄手段，窃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但是这种靠阴谋手段、人为地树立起来的领导是不可能长久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他理所当然地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虽然得到共产国际中某些人的支持，但从未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他充其量不过是中国革命舞台上的一个过客。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在长期的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为中国人民所拥护和爱戴。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关于历史人物唯一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王明的“阴谋论”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

王明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臆造。这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极大歪曲。在中国大地上诞生毛泽东思想绝非是偶然的。十月革命后，中国逐渐地成为世界东方矛盾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说：“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加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中心”。《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 年 8 月 29 日）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今天已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许多起义和革命中暴露无遗”，“其中最大的，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正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臆造，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存在于中国革命中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这是历史的真实本质。王明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臆造，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歪曲。王明的这种说法，不管他能编造出多少“材料”，但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王明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列宁主义的，这完全是在重复其主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谰言，荒唐之至，不值一驳。

王明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持个人地位而提出的。这纯粹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诽谤。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过程中，在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思想业已形成，对中国革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但那时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如同毛泽东

思想形成一样，也有一个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首先见之于公开书刊号召学习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本人。那时的王明，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却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1940年5月3日，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5月7日的《新中华报》和7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卷第9期全文刊登了王明的讲话。王明说：“对于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问题，我只想简单地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接着，他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五个方面：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善于工作的精神”和“善于团结的精神”。关于毛泽东的学习精神，王明说：“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谈到毛泽东的创造精神时，王明说：毛泽东“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并列举了毛泽东“在建设苏维埃的政权问题上”、“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等五个方面的“新创作”、“新发展”和“新贡献”。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南，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最后，他号召全国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笔者较多引王明的话无非是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王明自己的话来戳穿他自己编造的谎言。

在王明讲话之后，党内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等提法，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论著中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作品”，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结晶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的范例”、“典型著作”。有的文章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底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贡献，添加了许多珍贵东西”，它“不仅对于中国革命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现在及将来有莫大的意义”，而且“对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的革命运动，均有莫大的贡献”。有的文章指出，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要尽量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古典名著，以及毛泽东主要杰作”。1941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都作了高度评价。如：陈云同志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同志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同志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按：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未参加这次会议）。在此以后，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发表论述、赞扬毛泽东同志著作、理论、思想的文章逐渐增多。1943年7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

发表了王稼祥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十分严谨审慎的，对是否要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保留态度，而且他认为，他的思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3年，正值毛泽东同志五十岁，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宣部长凯丰同志把这个意见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既不同意做寿，也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关于后一问题，他在4月22日给凯丰同志复信里是这样说的：“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在“七大”确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规定它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时，毛泽东同志表示，一定要用个毛泽东思想，他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代表。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不只显示了他的谦虚，而且表明他完全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革命的理论，看待自己的思想的。

王明在“回忆”中说，毛泽东要创立“毛泽东主义”。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其实，毛泽东同志从来就反对“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提法。1943年，有的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五十寿辰的贺电中提到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11)。1948年8月，吴王章同志想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回电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12)

总之，以上确凿的史实和文献资料有力地戳穿了叛徒王明所编造的谎言。“桀犬吠尧堪笑止。”王明的谎言，除了为中国人民再增添一点反面教材外，只能证明他自己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丝毫不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

1984年3期

注释：

王明：《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背叛》，莫斯科政治著作出版社俄文1979年第之版，第15—16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王震、廖承志、肖劲光、伍修权、傅钟、方强、钟子云：《回忆与继承》，载《工人日报》1981年2月4日。

见：实甫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16日）、张如心的《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和《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30日）、艾思奇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和培元的《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等文章。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四十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红旗》杂志1981年第2期。

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吴正裕：《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载《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0日。

(11)《杨献珍同志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八篇著作》，全国党校第三届哲学年会材料。

(12)毛泽东：《致吴玉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

毛泽东等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经验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即使是在今天，迷信、盲从和注经解经的恶劣作风仍随处可见。正因为如此，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是很有必要的。在我看来，他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经验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握其精髓，坚持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既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凝聚了数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在近现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针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反复教育全党：要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应作启蒙运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学习它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精通它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用“实事求是”来揭破党内的主观主义。1941年，他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实事求是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50年代中期以后，实事求是的传统遭到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严重曲折。邓小平在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冲破新的教条主义的束缚时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郑重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1992年初，他再次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具体原理、结论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过时，一些设想、预见会随着社会实践检验，或证实，或否定，或修正。就连马克思主义最基础的东西——哲学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发展的速度，知识增长的速度，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世界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抵得上去过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呈加速度发展。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之所以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

认识来源于实践，新的理论来源于新的实践。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书本是不能产生新的知识。从书本到书本只能是教条主义。从书本中决不能找到解决革命和建设的现成方案。冲破教条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理论，而是实践。社会实践将冲破一切不适合现实的理论、政策和经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是实践逼出来的。他在抗大讲话中曾多次说过：上井冈山是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遵义会后，毛泽东抵制斯大林的错误干扰（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抗战初期抵制斯大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右倾错误，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次是抗战胜利后抵制了斯大林不准中国革命的错误，坚持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逼出来的。因为照斯大林主张去办，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逼上梁山”，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是逼出来的，是农民为摆脱贫困、求生存的一种创造。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也是逼出来，不解放思想，固守着社会主义的老观念，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强调实践是冲破教条最有力的武器，强调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丝毫也没有忽视理论的意思。光实践，不总结经验，形成理论，是经验主义。不总结经验，就无法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毛泽东有一颗哲学头脑，善于总结经验，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这是他伟大之所在。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伯尔教育代表团时，一位团员问：“你所以这伴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回答，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他又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会教育人民群众。过了一年之后，1965年7月，他主动地对人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道出了他一生成功的秘密：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雄伟事业。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改革开放如何搞？办法从何处来？只有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在于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他一再讲，“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草稿时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伟人，其成功之道，一脉相承。

三、健全民主与法制，保障思想自由，切实贯彻“双百”方针

思想自由，学术争鸣，是反对教条主义、繁荣学术的一个重要前提。五四时期的新人物在反对旧教条时反复宣传这一点。陈独秀讲：“人间万事，

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中国古代，九流并美，百家争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李大剑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时说：“是非以辩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因此，应“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真理要通过反复辩论获得，“最后录定之辞，勿得轻用，终极评判之语，勿得漫加”。胡适也讲：“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周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鉴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他指出：有的人为党为国，忠心耿耿，文章则不堪领教，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是卫不了“道”的。他认为，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打破教条主义的有效办法之一。邓小平也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11)

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宽松的政治环境，离不开健全的民主与法制。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使我国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的破坏，“双百”方针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创造民主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12)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其结果必然导致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学术禁锢，百花凋零，社会停滞。

为了防止思想僵化，作为研究者个人而言，不应将自己的知识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而应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包括研究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个学派，一个学者，若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言，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梁启超在总结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理性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13)贝弗里奇也说：“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钝。因此，阅读不应局限于正在研究的问题，也不应局限于自己的科学领域，实在说甚至不应拘于科学本身。”(14)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但若仅仅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他就是一个得了贫血症的教条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必须不断地吸取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人类文明成果，以丰富和补充自己，发展自己。若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东西采取一概排斥、否定的态度，那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日益贫乏，失去吸引力。

四、提倡独立思考，坚持不懈地反对个人崇拜

李大钊在反对迷信古人、崇拜孔子时说过：迷信古人、崇拜孔子的结果，许多有才华的人，只知有孔子，而不知有自我，“日惟鞠躬尽礼、局促趋承于败宇荒墟、残骸枯骨之前，而黯然无复生气”。除膜拜之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15)对古人的崇拜是如此，对无产阶级领袖的崇拜也是如此，结果，以领袖人物的言论为是非之标准。领袖人物没有讲的，不能讲，不敢讲。理论研究工作完全成了对领袖人物言论的解释与鼓吹，且美其名曰：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性不好束缚”，“好独立蹊径”。他青年时代就“不盲从他人是非”。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尊重马列，但不迷信马列，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延安整风时，针对党内一部分人迷信本本、迷信斯大林个人和共产国际，他提倡多思，反对盲从和奴隶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6)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他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他告诉人们，“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17)

为了防止教条化，反对迷信盲从，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个人崇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谦虚谨慎，比较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对他的歌功颂德。他反对为他铸铜像，提议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他注意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批评教条主义、批评个人崇拜的动向，并将有关材料批给党内高层领导同志阅读。1954年，他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颂扬他的文字，他指出：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18)。不幸的是，毛泽东在晚年接受和欣赏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党中央提出“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鉴于历史教训，邓小平多次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集体领导。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邓小平一再讲这一点，值得全党重视。

五、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时注意防止经验主义、修正主义

对共产党内部的错误可以从不同角度、层次上加以分析。从政治上讲，有“左”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右倾错误。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态度来讲，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从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来看，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政治路线上的“左”右倾错误与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关系是复杂的。修正主义，一般认为是右，其实也有“左”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称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团主义”为“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20）。教条主义，一般认为是“左”，其实也有右的，看教条的是什么。王明教条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表现为“左”，而在抗日战争初期则表现为右。“左”和右，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相互转化。“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21）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对教条主义的一种惩罚。

邓小平在反对思想僵化、纠正“左”倾错误时，注意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注意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他指出：我们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2）他又说：“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23）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与解释，也会有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搞教条主义，也会有人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搞修正主义。如何判别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与历史上的学派、宗教不同，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是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原则，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言论，而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出现分歧时，应通过讨论、辩论来解决，应由社会实践来最终评判。切忌动辄扣帽子，指责对方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似乎唯有自己是“正宗”，别人皆是“异端”。究竟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靠自封，而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有一点倒是需要注意的：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要警惕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反对教条主义时要防止修正主义，在反对修正主义时要防止教条主义，不要走极端。

六、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无私无畏的精神

认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在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24）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情况也是如此。“伟大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上得到迫害作为报酬，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事。”“伟大的发现家之所以遭到迫害，部分是由于这种对新设想的抗拒心理，部分是由于冒犯了权威侵犯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既得利益。”（25）至于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科学方面，这种情形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创造性的探索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为教条主义者所承认，反而被认为是“狭隘经验论”、“右倾保守”、“落后的农民意识”。他本人受排挤和打击。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这二十次处罚、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是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冲破旧的观念、过时的框框条条，要进行改革，也是非常难的，需要付出代价。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说：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都要具有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历史表明：谁要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过

时的原理，纠正领袖人物某些错误的理论和政策，作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造，谁就往往遭非议，甚至被视为离经叛道，视为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遭打击、迫害。反对教条主义，有冒异端之嫌。一个私心很重的人是很难反教条主义的，很难反个人崇拜的。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自然不止以上六条，本文只是一孔之见，仅供研讨参考之用，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 1994 年 3 月印发的
《中共中央党校讲稿》排印

注释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112 页。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 页。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8 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3 页。

陈独秀：《答常乃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77 页。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2 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7 年影印版，第 395 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91 页。

(11)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2 页。

(1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4、145 页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版，第 3 页。

(14)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第 4 页。

(15)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卷，第 161 页。

(16)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7 页。

(17)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0、261 页。

(18)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131 页。

(19)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又参见同书第258、310—311、316—317、325页。

(20)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21)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页。

(22)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8页。

(2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2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389页。

(25)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第118、124页。

《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两颗闪耀着异彩的明珠。这是历史地确定了的。在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时，我们要力求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做到这一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确认识《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一、《实践论》、《矛盾论》对苏联三十年哲学的吸取

有的同志认为，《实践论》中对实践观点的论述、对认识过程本文写于 1980 年 7 月，原题为《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应注意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标题是发表时杂志编辑代拟定的。本文改写后曾发表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6 年第 1 期，后又收入《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第 2 辑（北京大学出版 1988 年出版）。本文获北京大学首届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1986 年）、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87 年）。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论述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有的同志则认为，《矛盾论》中内因与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等等，均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些同志只研究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与马、恩、列、斯的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而没有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时除了利用马列的哲学著作外，还利用了哪些思想资料。

那么，毛泽东同志 1937 年在抗大讲哲学时究竟利用了哪些思想资料呢？在这方面，我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我只能根据毛泽东同志本人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提纲的两节）进行一些考证。

1935 年 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和纠正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为了指导即将来临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奋发读书，钻研哲学。对此，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郭化若的《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等著作和文章均有生动的记叙。从这些记叙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刻苦攻读的情景，而且还可看出他阅读的著作相当广泛，既有马列的原著，又有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名著；既有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又有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和小册子。毛泽东同志大量地、深入地研究哲学著作，无疑为他在抗大讲哲学，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样的哲学杰作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根据公开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时除了利用当时已翻译出版的马列哲学著作外，主要参考了三本苏联哲学教科书：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1932 年 9 月出版）、《新哲学大纲》（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1936 年 6 月出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1936 年 12 月出版）。根据何在？根据是：毛泽东同志的讲授提纲，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外，绝大部分的内容，或者是对上述三本教科书有关原文摘录的编纂，或是对上述三本

教科书有关内容的改写。如，讲授提纲第一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除了未了四行文字之外均摘录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条战线（该书第40—41页）和《新哲学大纲》一书第六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个方向”（该书第181页、187页）。又如，讲授提纲第一章第三节“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和第四节“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主要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唯物论与观念论之本质与根源”改写而成的。再又如，讲授提纲第二章中“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等节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来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第三章第三节“物质和意识，辩证唯物观的反映论”和第四节“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所以，讲授提纲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外，在理论上创新和发挥并不很多。《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吸收了上述三本哲学教科书的许多思想和材料，但毛泽东同志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其实，《实践论》和《矛盾论》已不是讲课提纲了，而是详细的讲稿了。

上述三本教科书，正如译者们在自己的说明中所说的，是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反映了哲学的最新成果。这些教科书都强调了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贡献，强调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现的密切联系，都比较重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等重要思想，教科书依据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较好的说明和论述，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论述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时，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内因与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等新概念、新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在我国，有的同志认为，苏联在反对德波林的斗争中，虽然肯定了列宁在哲学上的贡献，但对列宁的著作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苏联哲学工作者所提出的新思想未能被吸收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而且在斯大林的这一著作问世以后，他们也抛弃了以前的新思想，搞了不少形而上学，这当然也是事实。但决不能由此就否认他们原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贡献。应当指出，上述三本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与列宁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上述三本教科书实现的。因为这两篇著作中引用最多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在当时延安还没有中文译本。《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和《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直到1939年才由艾思奇译出刊载在《解放》杂志第六十、六十一的合刊上。又如，《矛盾论》引用列宁的“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的著名论述，出自《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而列宁的这本评论在当时也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引证列宁的话，许多是从上述三本教科书中转引来的。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这些哲学教科书才了解到列宁在《哲学笔记》等著作中的许多重要思想。

研究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与上述三本哲学教科书的联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脉络。这里不妨举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为例进行说明。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他们在运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矛盾时却体现了主要矛盾的思想。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时，指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说明这一矛盾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如，列宁在分析苏联过渡时期多种复杂的经济成分时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正是依据马、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指出：“辩证唯物论在内部的矛盾之中，发见一切事物（资本主义也包括在内）的发展的根本原因。辩证唯物论在这些内部的矛盾中，只探求根本的主要矛盾，其它一切矛盾都依存于这个主要矛盾。”在另一处又说：“为解答一切事物为甚么发展这个概念，单只确定了过程之若干方面与属性以及这些方面与属性之单纯的结合，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任何现象之中，暴露出规定其发展之进行的根本矛盾。”当然，《教程》的上述思想是分散在不同章节中的，并没有集中加以论证，也没有给主要矛盾下明确的定义。

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经典作家们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但他们在分析具体矛盾时同样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时，认为价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认为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如，列宁在分析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斗争时，指出社会主义因素起主导作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根据经典作家们的上述思想，明确提出了矛盾主要方面的概念，并用一节进行专门论述。《教程》指出，“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割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见这个矛盾之主导方面。”

又说：“暴露矛盾的主导作用的能力，是党的政治及战术的基础。”《教程》还批判了机会主义者既不了解主要矛盾的问题，又不了解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当然，《教程》也没有给矛盾主要方面下定义，更没有提出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教程》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矛盾不平衡性的高度，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情形着重加以详尽地论述，提出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明确定义，论证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非主要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与肯定否定规律的内在的联系，形成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完整理论。

从上面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列宁那里已蕴含着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则明确提出了这两个概念，并作了初步的说明。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其它著作则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了这一理论。所以通过《教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是如何提出的，又如何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的。

总之，我们在讲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时，如果只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怎么讲的，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讲的，而看不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与上述三本哲学教科书的联系，那就很可能闹出大笑话。

二、《实践论》、《矛盾论》的创造性贡献，驳“抄袭说”

今天，也有人根据《实践论》和《矛盾论》利用了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的材料这一点，就认为它们不过是苏联教科书的简单重复、抄袭，而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这当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利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资料，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仅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且还利用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狄慈根等人的思想资料，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毛泽东同志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同样不仅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且还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等现有的思想资料，并且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是毫不足怪的，要是不这样那倒才是怪事。

但是，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决不是它先辈们思想资料的简单重复而是它自己时代的产物一样，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同样也决不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论述，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实践论》和《矛盾论》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国革命的经验。倘若将这两篇哲学专著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其它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更能看出这两篇著作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不是亲自参与并领导中国革命的人，没有直接同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哲学论著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著作和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的有关部分相比较就更为明白。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也充分利用了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特别是他和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节，李达同志论述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源泉、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等重要思想。但是，李达同志并没有吸收《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提出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也没有涉及矛盾特殊性。而毛泽东同志则在《矛盾论》中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对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加以详细的论述和发挥。这种差别的发生，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参与，而是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上述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的说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为解决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虽然李达同志有着很好的哲学修养。但由于他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实践经验，所以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没有能对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问题加以论述。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曾正确地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典范。”

事实上，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只要把《实践论》、《矛盾论》与上

述三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有关部分相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毛泽东同志都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

苏联哲学教科书在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作了初步的说明。但是，没有一本哲学著作像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那样系统地、完整地论述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认识的辩证过程，揭示出认识与实践矛盾运动的规律。苏联哲学教科书比较注意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程的说明，而对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这一更重要的认识过程则未能加以论述。至于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认识的总规律等思想更是没有涉及到。所以《实践论》虽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但又远远高于教科书。

上述三本哲学教科书中对对立统一规律论述最好的要算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该书的“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这一章共十一节，其中前三节讲量变质变规律，最后一节讲否定之否定规律，中间的七节讲对立统一规律。这七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四节“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的统一与斗争”，主要说明列宁的两种发展观，第五节“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这一节似乎讲如何分析矛盾，先讲了主要矛盾，之后讲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第六节“对立的相互渗透”，主要讲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转化，未了还说明了列宁的对抗与矛盾不同的思想。第七节“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第八节“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运动”。第九节“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第十节“均衡论”，这一节主要是批判布哈林否认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说明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如前所说，《教程》在阐发马、列的辩证法思想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论述的一些主要概念和原理，《教程》都涉及到了。但是，它对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内容的安排是零乱的，各节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而《矛盾论》的结构和安排是相当严密的，各节之间有着有机的内在逻辑联系。它把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从内容上讲，苏联哲学教科书虽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但并没有展开论证，或没有详细的说明。前面提到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就是这样。又如，苏联哲学教科书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但对如何分析矛盾特殊性并没有进行论述。毛泽东同志则从五个方面对矛盾特殊性原理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阐明了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又如，苏联哲学教科书普遍地注意到列宁的“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的思想，但没有展开说明。毛泽东同志则对列宁的上述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挥和论证，并指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相互转化。

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纵观前人的和同时代人的哲学著作，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系统地阐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这在哲学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再考虑到苏联哲学界在30年代未抛弃了他们原来的许多宝贵成果，在一段时间里离开了辩证唯物论这一情况，那就更显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说《实践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是中国人的

自吹呢？不是的。这一点，苏联理论界在 50 年代是承认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 1950 年 12 月 18 日发表的题为《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编辑部文章还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关于《矛盾论》，1958 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

所以，我们在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之间的联系时，决不能否认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当然，我们讲《实践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说这两篇著作完满无缺，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已达到顶峰，无需进一步发展。

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还需更深入地研究它与马、恩、列、斯哲学思想的联系，同当时国内外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它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它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影响。

原载《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的
《理论探讨》1981 年第 5 期

注释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曾在《抗战大学》（半月刊，广州统一出版社）第一卷第六期（1938 年 4 月 8 日）及以后的凡期的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发表过，并标明毛泽东主讲。该杂志在编者的活中还特别说明，“本期‘新哲学讲座’所发表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前年毛泽东先生在‘抗日大学’所主讲的讲义。”以后，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社、冀中第四军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中国出版社，大连《大众书店》等又公开出版过此书。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耕堂书店 1932 年版，第 53、280、295 页。

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时参考了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从讲授提纲的文字和内容看，我认为它与《社会学大纲》并无直接的联系。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是 1937 年 5 月出版的。在当时用两个月时间排印一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弄到延安，这也不可能。郭化若同志听毛泽东讲《社会学大纲》读过十遍，是在抗大讲哲学以后的事。所以根据毛泽东同志曾读过《社会学大纲》十遍这一点，来推断他在抗大讲课时参考了《社会学大纲》，似乎不一定可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3—704 页。

苏联《真理报》编辑部，《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载《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30 日。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297页。

《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与修改

毛泽东同志对辩证法最主要最突出的贡献是继列宁之后对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系统地、深刻地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同志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说明和发挥，他的整个辩证法思想又集中体现在《矛盾论》中。《矛盾论》可以说是在此以前的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的总结，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概括，也是尔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导。在这篇著作以后的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它的继续、运用、证明和发展。《矛盾论》是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以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钥匙。所以，《矛盾论》（以及它的姐妹篇《实践论》），不仅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而且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处于中心的地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不仅1982年8月，应解放军西安地区院校教学协作中心哲学专业组和陕西省哲学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之邀请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暑期讲习班”上作《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贡献》的学术报告。本文为报告第一个问题的第一、二两点。如此，而且包括研究整个毛泽东思想），首先要研究《矛盾论》。事实也正是这样。不论是敌人，还是同志、朋友，不论是拥护、赞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还是反对、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都很重视《矛盾论》的研究。这方面，国内外的争论很多。这里讲主要的几点：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

1964年，阿瑟·科恩宣称《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在1950年到1952年写的，认为中国人讲“写于1937年”的说法“看来有欺骗性”。杜令和高拉斯在1964年第9期《中国季刊》上的文章也有类似的想法。1965年1月9日，斯诺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时说：当前教授们在研究一个问题，你的有名的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否如《毛泽东选集》所说的，真的在1937年夏天写的，还是实际上是在又过了几年以后写的。我自己好像记得，在1938年夏天曾看到过这两篇未出版的手抄的翻译稿。毛泽东同志说：确实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就是在这次谈话里，毛泽东同志说：《实践论》是比《矛盾论》更为重要的一篇文章。这说明，在那时国外就对《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的时间发生了怀疑。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一个日本人写了《“毛泽东哲学”的本来面目》，对《实践论》、《矛盾论》成为文献的经过进行所谓的“考证”。前些时候，一个大学翻印了这个资料，并在“编者按”中说：这篇文章“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篇文章认为：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在1940年前后形成的（许按：苏联人也把《辩证唯物论提纲》看成是1940年的作品），《实践论》、《矛盾论》是其中的两个部分。而《讲授提纲》大概是作为内部资料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行的，目的是“给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提供一本讲授哲学时作为依据的参考书”。这个日本人认为：编写《讲授提纲》的过程中，艾思奇拟的、作为《哲学选辑》（1939年出版）附录的《研究提纲》“可能充分发挥了作用”，《讲授提纲》“曾直接大段地用了《研究提纲》”。他还认为，“这个《研究提纲》也是为了编写《讲授提纲》而在研究过程中起草的文件”。这个日本人的结论之一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形成与

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集体工作。”他认为“两论”是集体编写完成的，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著作，只是以毛泽东的署名发表。

上述看法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据有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是1937年4月至“七七”事变，共一百多个学时。“七七”事变的爆发，毛泽东同志因忙于抗战大事，只好中断讲课，辩证法只讲了一个矛盾统一法则，其它法则和范畴没有能讲。据郭化若同志讲，讲课完了之后，曾印发过讲课记录稿。据我所查：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曾在《抗战大学》（半月刊，广东统一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六期（1938年4月8日）以及以后的几期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发表过，并且标明毛泽东同志主讲。该杂志在编者的话中还特别说明：“本期‘新哲学讲座’，所发表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前年毛泽东先生在‘抗战大学’所主讲的讲义”。以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中国出版社、大连《大众书店》、上海“民主”杂志等又公开出版过此书。《实践论》是这本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是第三章的第一节。《讲授提纲》的最后一行文字是：“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年8月7日”。这说明《实践论》、《矛盾论》是讲课完了，在“七七”事变之后至8月7日这一段时间整理成的。所以“毛选”出版时《实践论》标的写作日期是1937年7月，而《矛盾论》则是1937年8月。艾思奇同志到延安是毛泽东同志讲课以后几个月了。毛泽东同志得知艾思奇同志到达后，把亲自署名“两论”的油印本送给艾。

1939年艾思奇同志选编了《哲学选辑》，并拟了哲学《研究提纲》，作为这本书的附录。这个《研究提纲》无疑吸取了（但不是照搬）毛泽东同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主要是《实践论》、《矛盾论》）。当然，《研究提纲》也吸取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著作和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所以，日本人说的《讲授提纲》引用了《研究提纲》是颠倒历史。《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综合了中外哲学思想的成果。但是“两论”并不是集体创作，更不是其他人写的、毛泽东只是署个名而已。

二、《实践论》、《矛盾论》的修改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一节和《矛盾统一法则》一节在收入“毛选”时，作者都有所修改。《实践论》修改不很多，主要是增加了一大段和删去了一大段。在论述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作者增加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一整段话，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这一大段。作者对《实践论》另一重要修改是在论述人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限制的缘故时，删去了对社会条件的具体阐释，即：“许多人受了阶级条件的限制（反动的剥削阶级，他们已无认识任何真理的能力，因而也没有改造宇宙的能力，相反地，他们变成了阻碍认识真理与改造世界的敌人）。有些人受了劳动分工的限制（劳心、劳力的分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些人受了原来错误思想的限制（唯心论与机械论等多属于剥削分子，但也有被剥削分子，由于剥削分子的教育而来），而一般的原因则在受限制于技术水平与科学水平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利用自己天然优胜的阶级条件（这是任何别的阶级所没有的），利用新的技术与科学，利

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地依靠革命实践的基础，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论理的东西随历史的东西，平行并进，达到完满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实践论》除了上面较大的一增一删之外，作者对初稿只作了个别文字的增删、变动和修饰。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斯拉特哥夫斯基等人集体编写的《毛主义的政治本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肆的歪曲和攻击。该书说：“经过重新修订在 1951 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与哈斯哈契贺在 1940 年以前写的《物质与意识》中的某些原理几乎逐字逐句相同。这表明，毛在‘修订’时利用了这一苏联著作”（该书第 117 页）。这种说法能成立吗？否，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如前所说，1950 年 12 月重新发表的《实践论》与原来的解放前多次出版的初稿基本相同，而《物质和意识》一书是作者在 1939—1941 年间写的。作者在 1942 年牺牲。该书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之后由别人整理发表的。该书的第四、五章的中文译本 1951 年 8 月出版，书名为《世界可知论》。该书其余部分的中文译本 1956 年 1 月出版，书名为《物质与意识》，《实践论》与《物质与意识》都是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以两者在根本原理方面的一致是很自然的。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哈斯哈契贺对认识论的安排是这样的：第一章人的认识过程，其中包括感性认识（感觉；感觉为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源泉；感觉为客观世界的主观形象；感觉为外间刺激力成为意识事实的转化；知觉；表象）和理性认识（抽象思维；概念；判断；推理）这两节。第二章真理，其中包括客观真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真理的具体性）和实践在认识真理中的意义这两节。可见，《实践论》的结构与此根本不同。说《实践论》与《物质与意识》中的“某些原理几乎逐字逐句相同”，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作者的主观臆造。

与《实践论》不同，《矛盾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对初稿作了较大的“补充、删节和修改”。下面就来具体分析一下作者在 1952 年对《矛盾论》初稿的“补充、删节和修改”情况。

《矛盾论》初稿原来的标题是“矛盾统一法则”，约二万五千多字。修改时删去了近七千字，增加了六千字左右。修改后的稿子约二万四千字。

初稿除了引言和结论之外，还有七个部分。修改时删去了第二部分：“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在 30 年代，苏联哲学界曾一度把形式论理学（即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认为形式论理学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是一切反动理论的方法论，对形式论理学进行了批判。苏联哲学界的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中国哲学界。如，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专门写了“形式论理学的批判”一节。在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也把形式论理学等同于形而上学，把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等同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所以，他在讲了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之后，紧接着讲了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的对立。作者的目的是想说明：“全部形式论理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把形式论理学等同于形而上学，这无疑是错误的。修改时加以删去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一部分也有许多合理的、正确的思想。如，作者指出，形而上学者为什么否认矛盾呢？“因为他们在事物的联系以外，在事物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以外去看事物：即在静止中看事物，不在运动中看事物；在割断中看事物，不在联系中看事物。所以他们以为承认事物及概念中的矛盾性及否定

之否定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而主张了死板凝固的同一律。”作者又说，辩证法家的任务是“向着研究的对象，集中注意找出它的矛盾的力量、矛盾的倾向、矛盾的方面、矛盾的定性之内部的联系。客观世界与人的思想都是运动的，辩证的，不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革命的矛盾律（即矛盾统一法则）在辩证法中所以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理由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合理的、正确的思想在修改时被吸收到其它部分了。

修改时的其余的删节主要是去掉一些例子。

如，在论述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时，作者在“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之后删去了如下一段话：“中国东北沦亡，华北危急，主要由于中国之弱（1927年革命失败，政权不在人民手里，造成了内战与独裁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乃得乘机而入。驱逐日寇，主要依靠民族统一战线执行坚决的革命战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这是苏东坡的名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也是孔夫子的实话。一个人，少年充实，他就不容易感受风寒；苏联至今没有受日本的侵袭，全是因为他的强固；雷公打豆腐，拣着软的欺了。全在自强，怨天尤人，都没有用。人定胜天，困难可以克服，外界的条件可以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哲学。”

又如，在修改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一部分时，作者删去了生与死，正规战与游击战，战争中的进与退、攻与守、迂与直、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和阶级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主与自由，民主与专政等等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具体例子。

在修改时，作者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论点。

第一部分的标题原为“两种发展观”，修改时作者改为“两种宇宙观”。这种改动表达了作者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看作两种发展观的对立，而且看作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在这一部分，初稿只概述了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没有对辩证法发展的历史过程加以叙述。修改时作者加上现在的倒数第二大段，补上了辩证法历史发展的概述。这一补充，使这一部分的内容显得更加完整。

初稿的第一部分最后是这样说的：“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主张辩证法的发展观。我们是变化论者，反对不变论，我们是内因论者，反对外因论。”修改时作者改成：“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矛盾普遍性”这部分，原来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好，我们不用读桐城派的古文义法了，列宁告诉了我们更好的义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法。”作者在修改时改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作者的这两处的修改，显然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变动，而是增添了新的思想，明确指出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目的和意义，进一步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鲜明地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又是认识的根本规律和方法，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在“矛盾特殊性”部分，作者增加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的这大整段的论述，阐明了人类认识过程中一般

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进一步论证了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

在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作者增加了“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这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这一段和紧接着的下面的一大段。这两段的增加，进一步具体地说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在修改“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部分时，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在初稿中虽然也包含有这一思想，但毕竟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出来。在这一部分，作者还增加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一整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增加，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概念的含义，而且揭示了宇宙间新陈代谢规律的内容，说明了事物的质变、飞跃、新陈代谢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联系。

关于矛盾的统一性，作者在说明了列宁关于对立面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之后，增添了这样一段文字：“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面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这一补充，深刻地揭露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反动本质及其阶级根源，说明了同一性为什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指出了辩证法同一性的革命意义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修改这一部分时，作者进一步强调了辩证法的同一性是现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而不是幻想的同一性，指出“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这一部分，几乎全部是重新改写的。从“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起至这一部分的倒数第二段为止，全是新增加的。在这一增补中，作者依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精辟地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极大的推动作用，揭露了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欺骗宣传。同时，作者总结了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经验，指出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以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指出党内非对抗性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在这一补充中，作者还增加了矛盾的“斗争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和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等新思想。

除了删节和增补之外，作者的另一一些修改则是把原来的思想表述得更为准确。

如，原稿在概括形而上学的特征时是这样说的：“所谓形而上学与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概括说来，是说发展是数量的增减，外力的推动，场所的变化，一切事物及这些事物在人的思想上的反映，都永远如此。”修改时则

改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显然，修改后的表述更为准确和全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教条主义的批评问题。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毛泽东同志就严厉地批评过党内的教条主义：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专门批评当时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过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本本主义”。往后，他在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等方面都同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抗大讲哲学时，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重点是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在《矛盾论》的初稿中，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对教条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对经验主义的批评）。这也许是出于当时策略上的考虑。在修改时，作者在引言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在正文中，作者有七处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这种增加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是针对修改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发的。

最后还应说明的是如何看待作者本人对《实践论》、《矛盾论》的修改。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恩格斯在1891年修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时所作的说明。

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根据他在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几次讲演写成的。它最初是在1849年4月《新莱茵报》上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问世的，以后印成小册子，出版过好几次。在1891年，恩格斯对此著作进行了修改，重新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单行本的导言中说明了修改的理由。他说：马克思在发表这著作时，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是在50年代末才告完成的。所以从较晚的著作看来《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在供一般读者阅读和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正因为如此，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恩格斯接着说：“但是，当新刊印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他又说：“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他还声明；在将来如有机会应“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

马克思本人有没有修改过自己已经公开出版过的著作呢？也有。马克思的最主要著作《资本论》在第二版时就作了不少修改。这一点，马克思在《第1卷第二版的跋》的一开头就作了说明。马克思说，第一章的第三节已经完全改写。又说，第七章，尤其是其中的第二节，也大大地改作了。

恩格斯对他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的第三编“理论”这一章也作过增补。他在第二版的序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但是，

一是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二是这是一个论战性的著作，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修改。恩格斯说：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理论”这一章。这里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叙述，所以我力图写得通俗些，增补得完整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有所责难的。他还说：当拉法格把《概论》、《历史》、《理论》这三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德文、俄文、丹麦文等出版时，如果我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原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末这将是一种迂腐的行为了。恩格斯的这种增补，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及，是无可非议的。

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著作在再版时作必要的修改，也是无可非议的，况且在解题中作了明确的说明。难道作者没有修改自己著作权利吗？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自己反革命的目的，任意删改历史文件，这是应当谴责的。但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对毛泽东同志在出版“选集”时对自己所写的文章进行修改一事加以非难、指责，这是毫无道理的。作家在再版自己的著作时，加以修改，古今中外，都是常见的。

应当指出，1952年修改发表的《矛盾论》已经不是1937年时的初稿了，而大致是1952年所写的。它反映的已不再是作者在1937年时的理论水平，而是1952年的理论水平。它所总结的也不仅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且也包含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矛盾论》时应加以注意的。

节选自《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的讲稿。该讲稿载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书（西安地区军队院校教学协作中心哲学专业组、陕西省哲学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1982年8月印）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矛盾论》题解。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

李达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毕生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他和雷仲坚同志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出版）是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他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曾读过十遍，并赞誉这部著作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解放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和解说，做了大量的工作，亦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李达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有巨大的功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不读李达的著作。任何否认或贬低李达这方面的功绩，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极不公正的。正确地宣传李达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绩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近两年来，在理论界有这么一种说法：似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有人甚至说：《实践论》、《矛盾论》中没有一个论点不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有的同志在宣传李达同志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时，按照《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介绍《社会学大纲》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给人一种《实践论》、《矛盾论》似乎确实是抄《社会学大纲》的印象。

《实践论》、《矛盾论》是否是抄《社会学大纲》，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我认为《实践论》、《矛盾论》抄《社会学大纲》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理由是：

第一，从文字叙述上看，《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授哲学当然也必须从先辈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出发。根据解放前多次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课时除了利用当时已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之外，主要是参考了三本苏联哲学著作：一本是前面提到的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本是《新哲学大纲》（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1936年6月出版），再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1936年12月出版）。毛泽东的讲授提纲除了《实践论》、《矛盾论》之外，大部分内容是对上述三本哲学著作有关原文摘录的编纂，或者是对上述三本书有关内容的改写。《实践论》、《矛盾论》也吸收了上述三本书的许多思想和材料，但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实践论》、《矛盾论》与上述三本哲学著作之间文字叙述上的联系是清清楚楚的。

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论述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时指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丢开人类底实践活动，丢开他底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不仅是费尔巴赫底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该书第182页）很明显，《实践论》的第一段话就是从这里来的。

又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指出，无论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都不了解矛盾特殊性，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

方法去解决”，“与托罗斯基主义及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该书第 286—287 页）《矛盾论》吸取了这些论述，并进一步对矛盾特殊性展开了创造性的系统的说明。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文字叙述上的这种联系呢？很难找到。

据何长工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是 1937 年 4 月至“七七”事变，共讲了一百多个小时（见《难忘的抗大岁月》，载《光明日报》1981 年 6 月 25 日）据在抗大当过教员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的讲课因“七七”事变而中断，所以辩证法的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没有讲了。解放前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最末一行是：“论矛盾统一律完。 1937，8，7。”这说明《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课后至 8 月 7 日之前整理完毕的。李达同志给《社会学大纲》写序的日期是 1937 年 4 月 1 日。《社会学大纲》是 5 月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写作“两论”时很可能还没有读过《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在 1938 年 2 月 1 日写的《读书日记》证实了这一点。《读书日记》开头是这样写的：“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六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 1~385 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 页。”假如说，毛泽东同志在整理《实践论》、《矛盾论》时已认真阅读过《社会学大纲》，那我想从文字的表述上一定能找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的联系，如同它们与上述三本苏联哲学著作之间的联系一样。但遗憾得很，我们很难找出《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哪一段话，或哪几句话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实践论》中最后的关于认识总规律的表述难道不是吸收《社会学大纲》中关于认识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表述吗？我认为并不见得。《社会学大纲》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是这样说的：“‘实践直接的具体 抽象的思维 媒介的具体 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又说：“这个圆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该书第 366367 页）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1936 年 1 月出版的单行本）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从实践到感性，“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所以我认为，《实践论》关于认识总规律的表述与其说是吸收了《社会学大纲》的表述，不如说吸收了《大众哲学》的更为恰当。

总之，从文字的表述上，我们看不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很可能是在抗大讲授完哲学后才看到《社会学大纲》的。

第二，从内容上讲，《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决不是能从《社会学大纲》和其它哲学书本上抄得到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虽然从文字上看不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

社会学大纲》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从内容上看，前者是从后者那里来的。

我认为，从内容上看，更不能说明《实践论》、《矛盾论》是抄《社会学大纲》的。

《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都利用了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著作，讲的又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所以它们在许多根本观点上的一致是很自然的。但如果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社会学大纲》讲认识论，首先考察人意识的生成，之后依次分别考察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最后则是批判形式论理学。这种认识论的体系与苏联的哲学著作大体一样。《社会学大纲》虽然也说：“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该书第 284 页）但书中对认识过程的阐述，实际上只讲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没有讲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实践论》则始终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说明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地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实践论》不仅准确而明晰地概括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基本特征，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而且论述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一认识过程，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谈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实践论》还论述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获得；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限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实践论》的这些宝贵思想决不是从《社会学大纲》或其它哲学教科书中抄得的。

再说对矛盾规律的论述。

《社会学大纲》首先阐述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与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就是承认万物的不变性、静止性”，“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承认世界的运动性与可变性”（该书第 164、165 页）；进而论述了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说明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接着说明了对立物的同一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说明了矛盾有拮抗（即对抗）与非拮抗的区别。《社会学大纲》对对立统一法则则是辩证法的核心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该书第 176 页）。《社会学大纲》也指出，在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时，必须“依照事实的材料，去研究特定现象中所固有矛盾的发展的具体性。”（该书第 179 页）但应当指出，《社会学大纲》并没有像苏联哲学著作那样说明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更没有对矛盾特殊性进行专门的论述，也没有吸收苏联哲学著作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

《矛盾论》则依据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充分利用苏联哲学界的新成果，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从两种发展观、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等方面，对矛盾统一法则的丰富内容，对如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

盾，进行了系统地创造性的论述。《矛盾论》对所论述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对所说明的论点用大量的事实加以科学论证。《矛盾论》创造性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专门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

《矛盾论》的结构十分严谨，各节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反映了人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辩证过程，体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纵观前人与同时代人的哲学著作，我们可以毫不夸大他说，《矛盾论》是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矛盾学说的丰富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对辩证法的核心进行“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实现了辩证法发展的必然。

《社会学大纲》与《实践论》、《矛盾论》的明显差别还在于：前者既没有结合中国哲学史，也没有结合当时哲学界的争论，当然也更谈不到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革命斗争实际来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学大纲》的全书中我们很难找出有联系中国实际的地方（那怕是简单举例）。《社会学大纲》的功绩是在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根本缺陷则是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基本上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翻版。这一点与李达同志在党成立后不久就离开实际的政治斗争，专门从事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有关。我们不应苛求于他。这一点，不仅是李达同志一个人的缺陷，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中国哲学界的弱点。艾恩奇同志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说：抗战以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

《实践论》、《矛盾论》则不同。这两篇著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知行问题和辩证法思想的精华，而且从哲学上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了总结和概括，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革命的活的经验。我们若把这两篇著作同毛泽东同志在此以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两篇著作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内在联系，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什么紧紧抓住实践与认识的基本矛盾来论述认识的辩证运动，为什么用最大的篇幅详尽地说明矛盾特殊性、论证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为什么能提出矛盾问题的精髓，为什么强调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重要性。

《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达同志当时的哲学理论修养比毛泽东同志逊色，而在于李达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参与了中国的革命，而且直接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指挥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得到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王明教条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认识与实践、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问题作出系统的说明，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

通过《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的比较，我们不仅不能得出《实践论》、《矛盾论》是从《社会学大纲》或其它教科书中抄来的，相反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

李达同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哲学界的老前辈。这篇文章决不是为了贬李褒毛，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的关系。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

1984年第2期

注释

1935年11月出版的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指出：“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的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近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该书第384页。）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98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704页。

据我所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曾在《抗战大学》（半月刊、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第1卷6期（1938年11月8日）及以后的几期的新哲学讲座上发表过，该杂志在编者的话中还特别说明《辩证法唯物论》是毛泽东先生在“抗日大学”所主讲的讲义。以后，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社、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中国出版社、大连《大众书店》等又公开出版过此书。

见本书第182—184页。

程敏：《光辉的榜样，深刻的启示》，《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

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同上书，第552页。

李达：《（实践论）解说》，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页。

李达：《（矛盾论）解说》，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页。

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

王炯华同志的《(大纲)的创造性贡献及“两论”与它的联系》一文(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王文)对拙作《(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一文(见本书第200—208页)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学术研究上开诚相见的讨论是很有益的。为了求得讨论的深入,我再作些补充说明,以就教于王炯华同志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仁。

(一)王文注说:“所谓‘两论’‘抄’《大纲》的说法,笔者在一些学术会上也听到有同志反驳过,笔者也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至今尚不知这种显然是浅薄的说法出自国内何处。”应当坦率地承认,本人确实没有见过有据可查的文字材料(也许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自知有些浅薄,故未敢见之于文字),也未亲耳听到有同志讲过上述观点。但这种说法决不是笔者和其他反驳者所编造出来的。笔者不仅一般地听到过这种说法的传言,而且确有同志告诉我:某同志在同他个别交谈中对他讲过“两论”是抄《大纲》的观点。又有另一位同志告诉我:某大学的学生曾问他,“两论”是不是真的是抄《大纲》的,因为这位同学的老师讲过这种看法。我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仁们多数都知道,此种说法出于国内何处。王炯华同志不知其源出于何处,不免使我有点愕然了。

(二)王文认为,我们很难确定毛泽东同志《读书日记》中所记载读的《大纲》“是北平版还是上海版”。《读书日记》虽没有全文发表,但根据现已公布的部分,我们是可断定它是1937年5月的上海版,而不是北平版。因为《日记》中所记的第一篇“唯物辩证法”的页码是“从1—385页”。这与上海版相同,而与北平版不同。再者,现在保存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批阅的《大纲》是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的初版本。

此外,所谓的北平版是指当时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5年的铅印讲义,共544页(上海初版则有854页),并未公开发行。以至李达同志在《大纲》第一版序中连提也没有提到这个讲义。他在序的一开头是这样写的:“这本书是前著现代社会学绝版以后的新著,内容完全不同了。本书的原稿,是在最近三四年以内逐渐写成的。”《李达文集》编辑组也长期不知有此讲义,直到1982年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可见当时印数是很有限制的,影响也不大。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读过北平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是可以推想而知的。

(三)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两论”期间是否读过《大纲》,现在尚难完全断定。因为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提供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读《大纲》的时间。那么,我们能否根据已有的材料来判断毛泽东同志在那时是否读过《大纲》呢?我认为是能够的。这主要是看“两论”以及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文字叙述上同《大纲》是否有直接联系。如拙作所指出,“两论”及《讲授提纲》与苏联三本哲学教科书在文字上的联系是一清二楚的,《实践论》关于认识总规律的表述与《大众哲学》的联系也是明显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作如下的推理是可信的:倘若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读过《大纲》,并利用了《大纲》的思想资料,那我们一定能从“两论”与《大纲》的文字叙述上找出其直接的联系之处;倘若我们找不出两者文字叙述上的直接联系之处,那就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并没有读过《大纲》,

并没有利用《大纲》的思想资料。王文虽然引了《大纲》中的一些话，但它们只能说明“两论”与《大纲》在基本观点上的一致，而不能说明两者文字叙述上有直接联系。观点上的一致并不能说明文字上的直接联系，其道理十分简单，拙作已经指出，在此不再重复。笔者在此重申：从文字的叙述上，“两论”与《大纲》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尽管如此，笔者考虑到从时间上讲，并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能读到《大纲》的可能（诚然，这种可能性很小），故拙作只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很可能还没有读过《大纲》。又说：他很可能是在抗大讲授完哲学后才看到《大纲》的，拙作并未完全断定毛泽东同志在那时没有读过《大纲》。但我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很可能没有读过《大纲》的论据，要比说在那时很可能（或可能）读过的论据要“充分得多”。至于能断定那时读过《大纲》的史料，至今尚未发现，而王文也未能提供。

（四）王文认为《大纲》对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是他“删改”“两论”的许多“契机”中的“一个”，并以此来说明《大纲》与“两论”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的有关“两论”与《大纲》关系上的一种新说法。说法虽新颖，但我认为它没有事实根据，难以成立。

先从王文所举的例子说起吧！王文说：“《讲授提纲》认为‘矛盾统一的法则，质量互变的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到了《矛盾论》才开宗明义地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应该说，《矛盾论》的这种表述与苏联三本哲学著作无关，而与《大纲》有关。”历史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第一，1937年8月7日完稿的《讲授提纲》在“矛盾统一法则”的标题下，开宗明义地写道：“这个法则，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所以，“最根本法则”的提法并不是著者在“删改”时加进的，而是在1937年8月就有的。第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来源于列宁的思想，因为在上述话之后紧接着的是：“列宁说：‘就根本意义上来讲，辩证法就是研究客体本质中的矛盾’，所以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实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的辩证法，就从这个问题讲起，并且把这个问题讲得比其他问题详细一些。”第三，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依据列宁的思想，也有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最主要”、“最重要”法则的提法。如《新哲学大纲》指出：“伊里奇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展开上，加以很大的注意，把它看做唯物辩证法的中心问题，看做‘辩证法的核心’。这个法则，是作为客观世界的最主要的发展法则。”（第160页）《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也说：“对立体的一致，对立体的相互贯通的法则，就成为辩证法中最基本最重要和决定意义的法则。”（第203页）王文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不仅没有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且太偏重了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安排了两章）。”以笔者之见，该书虽在形式上把范畴分为两章，但它在论述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时却突出了对立法统一法则。它用三节讲质量互变，用一节讲否定之否定，而用七节讲对立统一。就其所讲内容而言，虽然举例较多，理论分析、概括不够，但却有许多精彩的新思想。总之，说《矛盾论》“关于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的论述是受了《大纲》影响而在“删改”时增加的说法，是无事实根据的。

那么能否从“两论”的其他修改中找出与《大纲》的联系之处呢？笔者在1980年曾对“两论”在收入《毛选》时的修改作过一番考察，并未发现有

哪一处的修改是受了《大纲》的影响，与《大纲》有什么直接文字上的联系（因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举例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研读过《大纲》，肯定有所收获。但由此得出十几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修改“两论”的“契机”之一是受《大纲》的影响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按照这种逻辑，毛泽东同志修改“两论”的“契机”就大多了。因为他在修改“两论”之前所读过的、并有所收获的哲学著作是很多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毛泽东同志在修改“两论”时吸取了《大纲》或其他著作的论点，或接受了某一同志的意见（笔者并未发现，这纯粹是一种假设），那么能否说《大纲》或其他著作、或某一同志的意见对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是他修改“两论”的一个“契机”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契机”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事物转化的关键”也。

总之，我认为在未拿出确凿可靠的事实以前，就断言毛泽东同志受《大纲》的影响是他修改“两论”许多“契机”中的一个，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欠严肃的。

王文说：“依据历史的事实”，应该“承认“两论”与《大纲》的一定联系。”令人遗憾的是王文并未提供这样的历史事实。相反，根据现有的材料，足以说明“两论”与《大纲》并没有直接文字叙述上的联系。至于两者通过中间环节（如马、列著作或苏联哲学著作）的间接联系无疑是存在的。我想王文所说的“联系”并非是指这种间接的联系。因为王文与拙作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间接联系，而在于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五）王文认为《大纲》是“在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首先，应当说明，笔者所指的自然是中国人自己“比较全面地介绍”，而不是指外国人，这是从拙作的行文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二，在《大纲》之前，确实“早有中国人编写的讲义或专著”（除了王文列举之外，仅从北京大学现存图书中，笔者还可开列许多种），但从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体系看，它们都够不上“比较全面地介绍”。要知道这一点并不困难，只需浏览一下这些著作目录的章节标题便可知。就《大纲》而言，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只是“比较全面”，而不是像王文所说“完整而系统”。因为《大纲》并没有讲“社会革命”和“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样历史唯物论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三，按照王文的推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评价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因在它之前，“早有过中国人编写的讲义或专著了”。我想，王炯华同志是不会赞同这种说法的。

（六）关于《大纲》的“根本缺陷”。拙作因不是专门评论《大纲》的，又因篇幅所限，所以仅指出《大纲》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未能对其产生这一缺陷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不过，笔者所说的“不应苛求于他”，主要是顾及了当时反动的社会环境这一点而言，当然也还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有一个过程。但我认为“根本缺陷”的提法是符合《大纲》本身实际的。在此不妨作点具体说明：

第一，《大纲》并非完满无缺，受历史条件限制，是有错误与不足的。如《大纲》和苏联哲学教科书一样，把形式论理学（即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就是明显的一个错误。又如上所讲，《大纲》没有论述“社

会革命”和“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明显的不足。但我认为，上述错误和不足（以及其它的一些不足），同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这一缺点相比，都是次要的、非根本的。

第二，如拙作所指出，理论脱离实际，这是当时中国哲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但《大纲》尤为突出。笔者所说的“结合中国实际”的“实际”，并不只是指（就《大纲》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而且还包括中国哲学史、当时哲学界以及整个思想界的争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一般情况。如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要求著者在书本中或讲堂上谈论中国革命斗争，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但我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中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结合其他方面的中国实际是完全可能的。在30年代的哲学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指名道姓地尖锐地批驳了张东荪、叶青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激烈地批判了托派的观点吗？《大纲》的作者在序中也谈到准备在第六编中分析研究中国社会，令人遗憾的是第六编未能问世，更加令人遗憾的是作者也未能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过程中联系中国社会，联系当时思想界的斗争。退一步讲，这些方面的联系因社会环境及个人经历等原因，都难以做到，但联系中国哲学史总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著者在一本论著中将中国多方面的实际都联系到，或要求联系很多、很好。但我们总可以要求它多少联系一点，哪怕是简单的举例。但《大纲》除了序言以外，在正文中很难找得出有联系中国实际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根本缺陷”的提法并不像王文认为的“略嫌太重了”，而是切实地指出了《大纲》不足之所在。

（七）关于《大纲》的主要历史功绩。王文认为《大纲》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在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于作者“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认为《大纲》是“一部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具有特色的著作”。说《大纲》的主要功绩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传播”，而在于“发挥”、“创造性贡献”，这又是一种新颖的观点，但这种评价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能成立，值得商榷。

先看《大纲》著者自己的评价。他在第一版序的最后说：“关于本书编纂经过，及所用参考书名称，留待跋文中叙述。本书内容，虽没有新的创见，但基于数年的研究，自信还有一些新的收获。”这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辞，但恐怕也并非完全如此。我们今天没有见到跋文，当然也无从知晓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究竟参考了哪些书。但可以肯定，它们并不只限于王文所提到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两本书。所以王文仅将《大纲》与这两本书的体系比较，借以说明《大纲》“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是欠妥的。《大纲》中不少引文并没有注出处，笔者也没有找出他们出于何处。但笔者还是可以略举一两例说明《大纲》与其他著作的联系。

《新哲学大纲》第七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共有以下

几节：

对立统一法则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化法则

否定之否定法则

本质和现象根据（理由）和条件形式和内容

必然性和偶然性法则和因果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社会学大纲》第一篇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法则”共有以下五节：

对立统一的法则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大纲》末节分三个目，中间的一目为“根据与条件”）

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法则与因果性（《大纲》在目的安排上“法则与因果性”在中间，“可能性与现实性”在最后。）

《新哲学大纲》和《大纲》关于认识论的结构和标题，也大体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大纲》多了第一节“认识过程考察的根据，意识的产生”。

当然，笔者应当说明，两书所讲的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是很不一样的。读者不能根据标题、结构相同就推出内容完全相同。但两者标题如此相同，总不能说是巧合，而没有一点直接联系。

再者《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不是无关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唯物论部分第七章第五节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宗教斗争”，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五年计划顺利的实现，计划化原则之侵入社会经济，自觉节制社会经济之成功——所有这些，使每一个人都训练成为社会主义底建设者，所有这些足以毁灭旧的、奴隶的宇宙观，而使千百万劳动大众脱离宗教底羁绊。只有在政权已被劳动阶级争取到手而他们从事建设新生活的国度里，才有可能进行这样广大的无神论运动。这种运动首先当然表现于战斗无神论者协会底工作上。

《大纲》一书的最后一目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的斗争”，其中有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五年计划的成功，社会经济中计划原理的渗入、以及社会经济之意识的统制事业的成功，把人们教育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改变了旧的、奴隶的世界观，抛弃了宗教的偏见。这种事实，首先在战斗的无神论者的同盟中表现出来。

笔者也应说明，读者决不能由此得出《大纲》的历史唯物论是照抄别人的。因为上述情况是不多的。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但上述事实总能说明两者是有关系的吧！至于李达是参照的外文版还是中译本，我们无从知晓，但这无关紧要。

王文列举《大纲》的“独到之处”，笔者没有深入研究。但以我浅见，有的恐怕也难以成立。比如，关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和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及发展”这一点，并非《大纲》独有。这方面的论述是当时许多哲学著作共有的。如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伏尔佛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1930年上海出版）、陈唯实同志的《通俗唯物论讲话》（1936年上海出版）和《通俗辩证法讲话》（同上）等均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论述的详略和方式各有所不同。

再比如，关于“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前面已有说明，这里不妨再引一点《现代世界观》一书的材料。该书说：“辩证法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则，即是对立融合的法则，或对极统一的法则”（1930年版，第163页）。又说：“对立融合法则”是“辩证法最普遍最广泛的根本法则（一切别的法则都由这法则发生）。”（同上书，第156页）书中还进一步说：“否定之否定法则，即是在时间和连续中的过程（或进行）上的对立融

合”（同上书，第 178 页），而“量到质和质到量的转变法则，只是对立融合的第一命题的特别应用。”（同上书，第 181 页）《大纲》把“当作辩证法的核心看的对立统一的法则”作为一个目加以论述，这是其他著作所没有的，但它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些提法，就很难说有“独创性”。

笔者认为，《大纲》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在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要比“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的提法似乎更为恰当些。笔者这样看并不否认《大纲》在理论上有“新的收获”。以笔者之浅见，《大纲》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全书的结构、体系及其内容，比较好地体现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即逻辑学）的一致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统一。在这方面，《大纲》确实比当时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高出一筹。同时，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论述的科学性、深刻性、完整性和明晰性，亦是当时国内哲学界仅有的。所以它被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无愧的。

（八）拙作说：《大纲》的“根本缺陷则是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基本上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其意思无非是指《大纲》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基本上是在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述和介绍。笔者从不认为它是某一本苏联哲学著作的照抄。如本文所述，笔者虽然对王文许多看法不敢苟同，但对王文的“翻版”提法不妥的指正，则真诚接受，并致谢意。因为这确实改正了我们的一个不确切的提法。

最后，我还应再次说明：《大纲》未能结合中国实际这一根本缺陷及其它不足，并不影响它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巨大的历史功绩，也并不妨碍我们对李达的尊敬。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

1985 年第 3 期

《大众哲学》与《实践论》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的成名之作，在解放前共印行过 32 版。现在人们在评价这本著作的价值时往往只注意它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迪人们走向革命的历史功绩，而很少注意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某些深化。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杰出哲学论著。它总结和概括了我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许多研究者在探求《实践论》的理论来源时，往往只注意它与马列著作和苏联 30 年代哲学著作的联系，与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的联系，而很少注意它与《大众哲学》之间的联系。

本文并不想对《大众哲学》和《实践论》作全面的评价与比较，而只是想从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一侧面来看《大众哲学》的理论价值。

李公朴先生在为《大众哲学》写的“编者序”中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写成的，这本书里的哲学，“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学，而不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进一步指出：有人怀疑“通俗会流于庸俗”，但《大众哲学》却“出浅入深”，“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的比其他一切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他又说：“作者对新哲学的理论系统，也不是完全照抄外国的著作的。”李先生在 1935 年写的这些话对吗？我认为是对的，是符合实际的。

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替即将来临的伟大抗日战争作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发奋读书、潜心研究哲学。他读的著作相当广泛，既有马列原著，又有中外古典名著，既有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又有中国人自己写的论著和小册子。从他在 1936 年 10 月 22 日致叶剑英、刘鼎两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极为注意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那时，叶、刘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提到：“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并嘱咐“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可见，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之前已读过《大众哲学》，并将它作为教材向延安的干部推荐过。“真正通俗而有价值”一语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大众哲学》的评价。

如李公朴先生所说，《大众哲学》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突出表现在认识论的解释上。《大众哲学》讲认识论的篇幅虽然不多，作者自己也认为对认识过程并未讲清楚，但与当时国内外著作相比确实颇有些特色。而这些颇有特色之处正是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吸取之所在。《大众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众哲学》突出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运动

在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著作里（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般都有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说明以及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批判。《大众哲学》的特点是更加突出了这一对矛盾。《大众哲学》讲认识论一章共五节，它差不多用了两节讲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对立与统一。它反复说明：感性

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理性认识则能认识事物普遍的和整个的东西；在哲学史上，经验论者“就相信感性认识，以为照片式的认识是最靠得住”，理性论者则“太相信理性的认识，而以为感性的认识是混乱不情的幻影”，“认为理性是认识的真正来源，认为理性的认识是真正的认识”。它又指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没有感性认识做基础，也没有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丰富、更深刻，可以推测到事物的内部情形”。它正确地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分不开的”，指出了割裂两者的害处。

《大众哲学》的上述思想无疑对毛泽东有影响。在《实践论》里，他吸取了《大众哲学》和其它著作中有关思想，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基本特征、相互关系以及由前者向后者飞跃的条件作了更为系统而深刻的论证。二、《大众哲学》反复论证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

它指出“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因此，我们常常把实践称为“变革的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我们要在实践中去矫正主观的错误”；“实践能使主观和客观统一”；“实践能使人类的认识进步”。《大众哲学》尤其强调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识事物这一点。它指出：“只有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最高的真理”，“要认识一件事的真理，只有在改变的行为中去认识，只有实践”，“只有变革的实践，能够使人认识真理”，“只有那在变革的实践中得来的理论，才能够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身”。它又说：“人类的认识是根据实践而得来的，所以和照相不同”，“最真实最具体的知识，是由实践得来的，而新的知识，也是在实践中发生的”。因此，它说：“实践是最重要的”，“实践是人类的认识的基础”。

当然此时的作者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义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写的《（哲学讲话）批评的反批评》一文中。艾思奇在文中说：“实践论并不能代表唯物论的认识论”。美国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今日世界上的法西斯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是实践论。他又说：“新唯物论的最高成果里所以没有把自己的认识论名之为实践论，就知单的实践，并不足以代表唯物论认识论本身的特征，虽然新唯物论也不能轻视实践。”尽管如此，《大众哲学》对实践意义的论述要比其他著作更加突出，更加深刻。我们可以设想，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并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毛泽东，在读到《大众哲学》的上述论述时一定会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共鸣，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实践论》里，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综合了同时代其它著作的思想，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实践论》指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给予人的认识以深刻的影响。这就强调了实践的社会性、历史性，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形形色色唯心论和旧唯物论的实践观的界限。虽然《实践论》还未明确地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规定为社会实践的三种主要形式，但它在两处将这三者并提，从而突出了科学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意义。这也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谈到实践的意义时，更多地是着重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点，鉴于反对党内主观主义斗争的实践，《实践论》则更多地是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离开不实践。这一点，《实践论》与《大众哲学》是相一致的。不同的是《实践论》更突出了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它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而一切唯心论和机械论，都是“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实践论。以上这些都是《实践论》高出《大众哲学》和其他著作之处。

三、《大众哲学》对认识过程作了精辟的概括

《大众哲学》虽然没有能充分说明认识过程，但它对列宁关于认识真理的途径（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作出了进一步发挥。它指出：“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在另一处，它又说：“认识的过程是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又再由理性的认识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又开始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不断地像螺旋一般地循环下去，每循环一次，我们所晓得的东西就进步一次。这就是认识的运动过程。”很明显，这里作者自觉地将发展的螺旋式的原理运用于认识过程，旨在说明“认识是作螺旋式进步的”。

《实践论》则在详细阐述了认识辩证过程的基础上作出了如下的总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这一总结的原型出自《大众哲学》，这是一看便知的，勿须我多说。这里应说明的是，《实践论》的这一总结又高出《大众哲学》。首先，《实践论》已不再把感性认识看作认识的起点。在《实践论》里，实践并不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而是认识的基础，贯串认识的全过程。第二，《实践论》的表述突出了认识过程的两次能动飞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第三，《实践论》的表述包括了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即人的改造和环境的改造的辩证统一的新内容。第四，《实践论》的表述，不仅说明人的认识，而且说明人类社会的实践，是在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实践论》的总结主要不在于说明认识发展的螺旋式，主要的在于说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总规律。

四、《大众哲学》的认识论结构具有它的新颖之处。这时毛泽东同志写《实践论》有一定的启发

在30年代，国内外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包括艾思奇在1936年写的《思想方法论》一书）一般都按照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次序讲认识论。这种讲法的优点是对感性认识的形式、理性认识的形式和理性思维的方法讲的较细，其缺点是只讲了认识全过程的前一半（即由实践到认识的第一阶段），不能揭示认识过程的根本规律。毛泽东的《实践论》则打破了这种流行的框架。他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来讲认识论。他明确地将认识过程概括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认为后一半认识过程比前一半认识过程更重要。《实践论》着力于说明实践的内容及意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本

质和规律。毛泽东之所以能这样讲认识论，首先固然是基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因为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认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问题。其次，是与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传统问题有关。此外，我认为，这也与《大众哲学》有关。《大众哲学》的作者虽然还没有自觉地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当作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应围绕这一矛盾来讲认识论，而只是在讲到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时讲这一对矛盾。但《大众哲学》的认识论与一般著作的不同。它除开头一节讲反映论，最后一节讲真理论之外，中间的三节讲的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以及实践的意义。它并没有讲具体的认识形式和思维的方法。这种讲法很可能对毛泽东有所启发。若将《实践论》与《大众哲学》的有关部分相比较，我们可以从《大众哲学》中约略地见到《实践论》的端倪。

艾思奇十分谦虚。他诚恳地接受读者的批评，坦率地承认《大众哲学》存在着不足和缺点。他认为，《大众哲学》不过是本“简陋的入门读物”，“写作方法只是以外国书本上的某些知识的通俗解释为主”（1947年《重改本例言》）。尽管如此，《大众哲学》的某些思想为《实践论》吸取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本通俗读物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它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而且为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0月，艾思奇由上海到达延安。从此，他的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十分尊重艾思奇。我们从他所作的《艾著（哲学与生活）的摘录》以及他给艾思奇的信中可以看到，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如何虚心地向理论工作者学习，如何平等地与理论工作者一起探讨理论问题，艾思奇更是十分敬仰毛泽东。他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他是我国较早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工作者之一。

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艾思奇在1947年重新修改了《大众哲学》。他在《重改本例言》中说：《大众哲学》出版以来的十二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并且也因此使我们看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如何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来的学习所得，尤其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努力想把这些发展的成果加以吸收。”经过修改本的《大众哲学》，“就其内容来说，它和旧本已有基本的不同。”它大量地吸取了毛泽东的思想，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又如，在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阐述上，它吸取了《实践论》关于由前者向后者飞跃的两个条件的思想（即积累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对感性材料的思考加工）。可以说，经过改写后的《大众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的另一种联系。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实践论》明显地吸收了《大众哲学》的某些思想。但艾思奇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未谈到这一点。而且他在1947年的重改本和1950年的最后修订本中删去了我们前面所引的关于认识过程总结的第一大段话。我认为在纪念艾思奇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有必要如实他说明《实践论》与《大众哲学》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全面地评价《大众哲学》和实事求是地评价《实践论》，另一方面，我们从两者的联系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并不是只有大部头的、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

学的、通俗化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普及，哲学的解放，同哲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千万不能轻视哲学的普及，更不要把哲学加以神秘化。

第二，不只是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有人企图否认或贬低领袖兼哲学家的人物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贡献是完全错误的），也不只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可以发展哲学，就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理论工作者也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不要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得太神秘了，不要瞧不起青年理论工作者。青年人，框框少，容易接受新鲜经验和吸取新的科学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力军。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不纯粹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由他在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综合前人和同时代人优秀成就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才会高出于同时代人的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如实地承认《实践论》（以及《矛盾论》）吸取了同时代国内外哲学著作中的积极成果这一点，丝毫也不会贬低它的理论价值。

第四，《实践论》与《大众哲学》之间的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领袖与普通理论工作者之间在学术理论上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同志式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倘若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把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变成单纯的单方面的服从关系，那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
（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年12月出版

注释

毛泽东：《致叶剑英、刘鼎》，《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艾思奇：《〈哲学讲话〉批评的反批评》，《读书生活》杂志第4卷，第8期。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92、295、296、297页。

《实践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认识论专著。它以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了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马克思交叉实践观的系统说明

《实践论》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后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革命很快走向高潮，成了东方革命的中心。但是，中国革命却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去进行新的探索，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回答。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一切从本本出发，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结果使革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取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但是“左”的影响仍未彻底消除。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认真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以利于正确地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毛泽东于1937年7月撰写了《实践论》这一理论名著。

针对当时党内仍然存在的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实践论》的第一部分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了系统的说明。

（一）论述了社会实践的形式

他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因为人们只有首先通过生产活动解决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资料问题，然后才有可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其他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生产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的，因此，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在各种不同程度下逐渐地认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实践论》将社会实践过程归结为三种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和“科学实验过程”。这就抓住了社会实践的根本内容，同旧唯物论和唯心论划清了界限。因为有些旧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也讲“实践”，讲“行”，但他们都将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排除在外。《实践论》在1937年就将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起看成是三种主要的社会实践形式，这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的许多哲学著作虽然也讲到科学实验，但都未能将它看成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实践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实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实验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实践论》将凡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政治、科学、艺术等一切实际活动，都看作是实践，这就防止了对社会实践作简单化的了解。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个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也不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社会实践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每一个人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主持会议，处理日常工作，无疑是一种实践，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

调查研究，则是更为重要的实践。没有这种实践，那他就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写作是一种专业实践活动，但深入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调查搜集创作的原始材料，同样是更为重要的专业实践。如果缺少这种实践，那他的作品只能是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主观的自我表现。

还应指出，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无疑是正确的。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然不能再这样看，而应把各种改造社会的活动如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以及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活动，看成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二）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实践的意义时更多地着重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可能是因为反对的主要是理论形态的唯心论和不可知论。毛泽东则不同，他面对的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是口头上的唯物主义而行动上的唯心主义。因此，他在全面阐述实践的意义时，着重说明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他指出：“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实践出真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你要获得新的知识、新的技能，你要在工作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勇于实践。

知识来源于实践，这是就人类知识总体而言的。然而，“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可见，《实践论》在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时，丝毫没有否认接受书本知识和他人经验的必要性。在知识增长异常迅速的时代，如果有人轻视书本知识和教育，排斥外域的科学文化，拒绝他人的经验，固守于自己狭隘的经验，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蠢人。科学上的任何发明、发现都来之于实践；科学上的任何发明、发现又都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们应向实践求真知和向书本学习结合起来。

（三）论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认识世界的目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实践对认识的检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有时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我们不能根据一时的“成功”或“失败”来判定认识是否正确，我们也不能将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某些事例等同于社会实践，更不可以先对某种实践作出主观主义的评价，然后再用它来为自己的某种认识或行动作辩护。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很多的，在建国以后，我们不仅把领导人的“指示”、“讲话”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且曾多次把实际上是错误的理论和政策说成是为“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东西。还应指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否认逻辑证明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在某种理论、计划、方案进行实践验证之前，总是要根据现有的知识对它们作出某种判断，在今天，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科学实验的计划、方案，都要在付诸实践之前进行可行性论证，这样可以去掉盲目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有人拒绝逻辑证明，事事须待经过实践之后才能作出判断，那他就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狭隘经验论者。当然，逻辑证明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逻辑证明了的东西还须由实践作最后的验证。

二、认识辩证过程的明晰阐述

列宁曾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实践论》在其第二部分中明晰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大大丰富和发挥了列宁的上述思想。

（一）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开始认识到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表面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反复多次，于是在人的头脑中便产生了一个飞跃，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达到了对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认识，了解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和规律。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错误，《实践论》用较大的篇幅反复说明两者的辩证统一。它指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针对轻视经验的教条主义，它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针对轻视理论的经验论，它指出，认识有待于深化，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因为感性认识虽然重要，但它们只是反映事物片面的、表面的东西，不能反映事物的全体和本质。《实践论》既批判了教条主义，又批判了经验主义，唯物而又辩证地阐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在学习《实践论》时往往只注意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忽视了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结果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将事物某些表面的、片面的东西当作事物的本质和全体，把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当作可以套用的教条。以轻视理论、轻视知识、固守于自己原有的经验为特征的经验主义，至今仍在一部分同志中严重存在着，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障碍，因此，克服经验主义是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一个紧迫任务。

（二）阐述了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

它指出，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基础是实践。为了保证飞跃的正确：一是要“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前一个条件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详细地搜集和占有材料。后一个条件要求我们善于思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的抽象，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维过程，也是认识论中最需要深入精细研究的问题。《实践论》主要是从总体上考察认识过程。因此，毛泽东只是以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对思考作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诀”的概括，而未能详细展开。1961年，毛泽东在同李达谈话时提出应重视认识论的研究，并说他很想研究辩证逻辑，但苦干没有时间。这表明他一直在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离开了实践当然不可能有认识。但仅仅参加实践，也不等于一定能获得真知。只有在实践中勤于思索、善于思索的人才能求得真知。多想出智慧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要把勇于实践和勤于思索、善于思索结合起来，养成多思的习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我们固然

要掌握认识的根本规律，懂得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但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还须进一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规律，提高思维的能力。

（三）说明了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的重要性

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哲学家在讲认识过程时往往只讲到真理论为止。30年代的许多哲学著作因囿于传统的观念，讲认识过程也只讲到理性认识为止。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理论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针对这两方面的情况，《实践论》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后一个飞跃之所以更重要，这是因为：第一，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在于改造世界；第二，这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

理性认识是一般的、抽象的东西，而实践总是个别的、具体的。因此，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同样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间要有一系列的环节，切不可简单化。首先要将一般的理性认识与具体的个别情况结合起来，化为具体的实践方案。然后对实践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在行动方案付诸实施之前，还要进行个别的试点和中间的阶段性试验。最后，还须将计划、方案交给实践者，为实践者所掌握。

（四）指出了正确的认识需要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此，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人们只有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失败与成功的多次比较才能认识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实践过程中的失败与成功、错误与正确，要胜不骄，败不馁，允许犯错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本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暴露，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仍然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三、认识根本规律的科学揭示

《实践论》在讲清了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过程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

（一）认识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它指出：客观世界是向前推移和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如果认识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前进，那就会落后于社会实践，犯右的错误。相反，若认识超过了当前的实际，把幻想当作真理，把仅仅在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事勉强放到现在来做，超越了的现实，也就会犯“左”的错误。“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力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它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我们要注意实践和认识的具体性、历史性，切不可把一定条件下所获得的真理性认识和经验无条件地加以推广和

运用，要时时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发展着的实际情况，时时警惕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分裂。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相对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绝对的、僵死的、凝固的统一。当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唯一科学的态度是改变主观以适合客观，修正理论以适合实践。倘若固执主观。抱青“神圣的”理论不放，那必定在客观向前碰壁。

（二）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通常人们往往把改造世界理解为只是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论》则不同，它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两个方面。它把改造主观世界看成是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从根本上讲，主观世界是由客观世界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内容是受社会实践制约的。人们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但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人们要想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最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主要的不在于客观世界本身，而在于主观世界自己。因此，主观世界的改造反过来又促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所谓改造主观世界，是指“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认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反映水平的高低，决定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因此，从认识论上讲，改造主观世界最重要的是提高和改造认识能力。在今天，为了提高和改造认识能力，一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思维的经验教训，自觉地防止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克服旧的狭隘的思维方式；三是要尽可能地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改造主观世界还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克服主观世界中一切不符合客观世界的东西，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认识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错误，使认识符合于客观。

（三）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

它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概括科学地揭示了：

1. 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认识一旦形成之后，又反过来能动地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正是实践和认识的这种相互作用，既推动着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又推动着实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2. 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和由理性认识向实践的两次飞跃构成的。这充分表明了认识的能动性，也反映了认识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

3. 认识过程的无限性、曲折性和前进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无限循环的螺旋式的前进运动，反映了认识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和实践，总是互相渗

透的，不是截然分开的。《实践论》对认识过程的分析 and 概括，揭示了认识过程的本质和规律。这种概括既符合于整个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又符合于个人的认识发展史，也符合于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过程。这一概括简洁明了，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政治路线来源于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共党内思想最本质的问题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思想路线问题。《实践论》科学地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又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过去的正确解决，并不能保证今天的正确解决。今天的正确解决，并不意味着今后一定能正确解决。为了保证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我们应经常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经常学习《实践论》，自觉反对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实践论》曾指导我们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它将继续指引我们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原载《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10月出版

注释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337、338页。

《矛盾论》在辩证法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在《矛盾论》中，他综合了前人和同时代人辩证法思想的优秀成果，总结了我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系统的创造性的说明和发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矛盾论》是人类辩证法史上一颗闪烁着异彩的明珠，本文试图说明《矛盾论》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以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

一、《矛盾论》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必然

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它内在的必然逻辑。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人类认识史的一环，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和实质的明确提出，毛泽东对核心和实质所作的系统而深刻的说明和发挥，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人类辩证法思想合于认识发展规律的一种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他们成功地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等方面，运用于指导工人运动。1858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遗憾的是马克思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没有像黑格尔那样给我们留下《逻辑学》这样的专著，他只留下《资本论》的逻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主要内容，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特征和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自然科学，计划在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辩证法的主要内容。马克思逝世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整理和出版上，不得不中断这方面的写作计划。他留下了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所以恩格斯也未能实现从理论形态上系统地论述辩证法的宿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矛盾，都达到了顶点。而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却十分害怕矛盾，极力回避矛盾，掩饰矛盾，调和矛盾。这时候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运动、发展、变化，而在于如何理解运动、发展、变化，在于承认不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种情形必然要求把矛盾问题的研究提到首位。在《哲学笔记》里，列宁对辩证法的丰富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他还明确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的著名短文对此作了初步的、纲要式的说明。《哲学笔记》为辩证法勾画了明晰的轮廓和指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但也应当承认，《哲学笔记》还只是读书笔记，还不是系统地阐述辩证法的专著。他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并未完成。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在 30 年代初，苏联产生了一批比较完备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都很重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在论述这一规律时提出了内因与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新概念、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教科书对对立统一学说丰富内容的安排比较零乱，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未能造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教科书对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也未能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论证。所以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没有完成列宁所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它只是为完成这一任务作了最初的尝试和准备。但这也表明，在列宁逝世之后，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系统地论述确已成为辩证法向前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综合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成果，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系统的说明和论证。他首先从宇宙观的高度阐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说明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接着，由矛盾的普遍性入手，进到矛盾特殊性和矛盾特殊性的两种特别重要情形即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再深入分析矛盾着对立面之间又同一又斗争的关系，最后讲矛盾的对抗与非对抗，说明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矛盾论》的这种结构与安排，对矛盾理论的层层深入的分析，反映了人们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客观辩证过程，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一致性。《矛盾论》的各节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它把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从具体的内容上讲，《矛盾论》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它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

毛泽东用大量事实科学地论证了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精辟地分析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全部形而上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否认矛盾；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规律。他还具体地说明了事物的矛盾运动与事物的量变质变和新旧事物的代谢的内在联系，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的思想。

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时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而且也是认识的根本规律，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矛盾论》则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具体化了。毛泽东在论述每一个具体原理时既说明了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又指出它的方法论意义。整个《矛盾论》鲜明地体现了辩证法和认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为我们如何学习、运用辩证法指明了方向。

（二）详尽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

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根据马列的思想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但是教科书并没有对矛盾特殊性的各种情形展开论述，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也没有提及，更谈不到说明。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斗争，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矛盾特殊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结合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矛盾特殊性原理作了详尽的创造性的考察。

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认识矛盾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和基础，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我们只有把握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点，拒绝对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一种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

怎样研究矛盾特殊性呢？他指出，研究矛盾特殊性就是要研究“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各个方面”等五种情形。《矛盾论》还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情形专门辟出一节单独加以论述。他指出，这两种情形都是矛盾力量不平衡性的表现。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均衡论。这就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放在颠扑不破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他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概念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论证，分析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及转化，指出了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理论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三）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在分别考察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进一步说明了两者的关系。他指出，每一事物内部不仅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还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我们在研究事物时应注意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结，要善于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又要善于在普遍性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特殊性，以便进一步丰富普遍性。

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贯串于矛盾学说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在把握对立统一学说时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还应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注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区别；在承认矛盾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时，还得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区别；在注意到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对立面之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如果我们割裂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那就没有辩证法。就陷入形而上学。在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中，如果片面强调特殊性，强调本民族的特点或新时代的特点，否认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但仅仅停留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上，对具体事物的矛盾运动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那我们仍然没有认识事物，更不可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否认特殊性，不顾实际情形，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拒绝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关于矛盾精髓问题的概括是他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所作的哲学总结。总之，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学说的关键，是运用辩证

法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因此，“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关于矛盾精髓问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对学习和掌握辩证法，对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进一步研究了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说明了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

列宁在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十分重视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思想，明确地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研究对立面同一的学说。但他没有加以展开和论证。毛泽东大大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把同一性明确规定为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这两方面的含义，并用大量例子加以说明。《矛盾论》透彻地说明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革命意义，深刻地揭露了否认转化的形而上学的反动性和阶级本质。《矛盾论》还强调了矛盾同一性的条件性，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对立双方既不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不能转化。这就划清了唯物辩证法与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界限。

《矛盾论》发挥了列宁提出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他指出，同一性的相对性是指一切过程的常注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斗争性的绝对性是指一种过程转化为它种过程的变动性是绝对的，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始终，并使一个过程向着它过程转化。同一性和斗争性密不可分，同一性中存在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因此，任何割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企图都是错误的。辩证法要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坚决反对只讲同一，否认斗争，或只讲斗争，否认同一的形而上学。

在研究矛盾斗争性时，毛泽东还专门研究了斗争形式问题。他指出，矛盾的斗争虽然是普遍的、绝对的，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矛盾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他还说明了矛盾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区别及相互转化，发挥了列宁的“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的思想。

可以说，继列宁之后，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了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矛盾着的双方如何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他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说明和发挥对我们坚持彻底的、革命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诡辩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矛盾论》无论从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来讲，还是从文字叙述的简洁、明晰、生动、易懂来讲，都是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无法与之相比的。综观前人和同时代的哲学著作，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矛盾论》在辩证法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实现了辩证法发展的必然，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所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如果再考虑到苏联哲学界在30年代后期抛弃了他们原来的许多宝贵成果，在一段时间里严重地离开了辩证法这一情况，那就更显出《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958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曾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

二、《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为什么列宁提出的而苏联哲学界没有完成的对对立统一规律“说明和发

挥”的任务，却经过中国人毛泽东之手完成了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去寻找，从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去寻找。

哲学思想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该时代精神的精华。《矛盾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国，这绝非偶然，它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一时代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直接提到议事日程上，成为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革命，这是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任务，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重大新课题。列宁曾对东方共产党人说过：“你们面临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哪—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只能由东方的共产主义者“依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

那么，为什么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解决这个时代的任务呢？

这是因为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最激烈的一块肥肉。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奇特的图画。旧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是世所罕见的。所以，十月革命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东方矛盾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说：“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加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中心。”《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年8月29日）指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今天已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许多起义和革命中暴露无遗”，“其中最大的、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中国革命”。因此，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革命的问题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要正确地反映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出一条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理论，进行了革命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军事围剿，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这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最烈，在全党统治达四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党内政治上、军事上的机会主义，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机会主义，它们共同的思想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

论与实践相脱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一切从本本出发，盲目执行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的指示，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是当时党内主要的错误思想倾向。在党内的另一部分同志中则存在着经验主义，这部分同志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醉心于局部的经验，把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把它们当作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经验主义成为它的助手。为了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批判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还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武装全党。为此，毛泽东同志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亲自在抗大讲授哲学，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光辉的杰作。

“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矛盾论》是中国社会活生生的辩证法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尖锐、复杂而又曲折的矛盾运动在理论上的再现。我们只要把《矛盾论》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其它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矛盾论》中详尽阐述的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内在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又是如何善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思考、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可以清楚地看出《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是如何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起来的。《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以往辩证法思想的总结和系统化。

毛泽东既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家、军事家，又不同于一般专门的从事理论研究的哲学家。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于一身。他既有丰富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实际经验，又有高度的哲学理论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这就使得他比党内其他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对复杂的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也正因为兼有实践和理论这两方面的优点，使得他能写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哲学论著。

《矛盾论》通篇充满了中国革命经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矛盾论》每一节都讲到战争问题，它也可以说是一部兵书，是战争哲学。因此《矛盾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单重复，更不是从哪一本哲学教科书中可以抄得的。它绝非是一般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哲学专门家所能写得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浇灌起来的精神花朵，不是参与并直接领导中国革命的人，不是亲自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同王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人，不是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的人，是写不出《矛盾论》这样的论著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和领会《矛盾论》的精神实质。

《矛盾论》的诞生是与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最伟大、最活跃、各种社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相关的。从1931年“九

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特别尖锐特别突出，而中国与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则相对地降到次要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内阶级矛盾和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之间相互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相当尖锐、激烈、复杂。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奇特地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牢牢地把握住主要矛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必须灵活地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根据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斗争，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倾向。为了指导伟大的抗日战争，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用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矛盾运动诸问题。《矛盾论》正是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而诞生的。

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东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革命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作为这个革命的精神产物的《矛盾论》在世界思想史上自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看不到《矛盾论》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密切联系，就不可能对它的历史地位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矛盾论》是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矛盾论》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运动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是产生《矛盾论》的实践基础。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富有哲学理论修养的中华民族的大地上诞生的《矛盾论》与中国历史上的辩证法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矛盾论》与中国历史上辩证法思想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引用上，而且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的内在联系上。《矛盾论》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我国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异常丰富的。它的最主要内容是天才地猜测到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认识到对立的双方有主次之分。如，我国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易经》，已从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概括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阴阳互相交感和作用产生万物，推动万物的变化发展。后来的《易传》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的互相作用产生万物的运动变化称之为世界发展的根本规律。《易传》还看到了矛盾双方有主次之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代表作《老子》和《孙子兵法》中充满了诸如有无、虚实、大小、生死、善恶、美丑、祸福、强弱、攻守、进退、得失、曲直、治乱、胜负等等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宋朝的王安石发挥了《老子》的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思想。他把对立面相反相成的关系叫“有对”，认为万物“皆不免有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阴阳两气，充满太虚，“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阴阳两气”，自然界的一切都处于对立面的统一之中，“独阴不成，独阳不生。”近代的思想家魏源进一步发挥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观点，而且还论说了矛盾双方

必分主次的道理。他说：“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纵观我国辩证法发展史，可以看出矛盾学说，即关于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和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思想，始终是我国历史上辩证法思想的中心内容。这是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它比其它国家古代辩证法思想略高一筹的地方。我国古代辩证法著作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物极必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相反相成”、“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富有辩证哲理的精辟语句，已成为中国人民熟知的格言和成语，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发生深刻的影响。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斯诺在1937年写的这些话并非是溢美之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喜爱哲学，与同学一起成立研究哲学小组。他熟谙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从他求学时代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有相当的了解。如，在批语中，他列举了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等对立的观念，进而认为，“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他又说：“人世一切事皆有差别比较而现”。当然此时的毛泽东还受到中国哲学史上相对主义的影响，还不能分清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界限。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自觉地批判继承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使之为中国革命实践服务。他把中国古代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创造性的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为红军制定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取得了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矛盾论》则从理论形态上批判地吸取中国古代矛盾学说的合理因素，对相反相成的辩证法进行科学的说明。毛泽东在抗大讲课时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其中不少例子在1952年正式公开出版时删去了），借以说明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他在举例时常常用“相反相成”、“许多相反的东西，却同时又是相成的东西”、“相反的东西中间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相成的因素”、“极端相反的东西之间有同一性”、“相反的东西中间互相渗透、贯通、勾搭”等语句。《矛盾论》阐明了“相反相成”一语的科学含义，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系起来，获得同一性。”毛泽东对中国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决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讲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时很少讲条件，因此划不清辩证法与相对主义、诡辩论的界限，这种辩证法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

《庄子》把《老子》的辩证法变成相对主义就是明显的一例。同时中国古代神话小说（如：《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有许多对立事物发生变化的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针对这种情况，《矛盾论》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同一性是现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而不是幻想的同一性，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我认为，《矛盾论》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辩证法发展史上思维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矛盾论》指出，在封建社会的很长的历史时间内，“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形而上学一直占居统治地位，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由于我国先秦时期形成辩证思维的传统，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的形而上学也有自己的特点：即不是一般地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不是否认矛盾双方有主次之分，而是否认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转化，把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当作凝固的、僵死的，以便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辩护。《矛盾论》对这种以否认转化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

正是针对历史上的和现实的形而上学的这种特点，《矛盾论》强调了转化的重要性，指出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着起变化。

毛泽东在讲辩证法时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我还认为，他在讲对立统一规律时，则突出了矛盾的同一性，特别是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指出：“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11)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的许多有关辩证法问题的文章和讲话中，同样是着力阐发矛盾转化的理论，批判否认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错误思想。可以说，毛泽东对矛盾转化理论的阐发和运用是人类辩证法发展史上少有的。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这种特点既是对中国古代相反相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总结。

周恩来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12)毛泽东在抗大讲授矛盾统一法则时大量引用古代文化典籍和历史故事，以说明深刻的哲学道理。如，他在讲到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时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这是苏东坡的名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也是孔夫子的实话。”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他引用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格言以及《水浒》上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以说明在分析矛盾时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在谈到矛盾同一性时，他除了多次引用“相反相成”之外，还引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名言。毛泽东这样做，使得他的哲学思想生动活泼，亲切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思想史的科学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通晓欧洲哲学史的，他们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是对欧洲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批判总结，一方面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数千年来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加到马克思主义宝库中，丰富了唯物辩证法。这是我们在评价《矛盾论》的历史地位时不能忽视的重要之点。

四、《矛盾论》的伟大指导作用和巨大影响

要科学地评价某一思想或著作的历史地位，必须考察它对当时及以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对《矛盾论》也应当如此。

革命理论是适应革命需要而产生的。革命理论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对社会实践发生巨大的作用。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一旦在毛泽东这样领袖人物的伟大“头脑”中升华为哲学理论，便立即会对中国革命实践发生深刻的影响。《矛盾论》的辩证法思想像一根红线那样贯串于它诞生之后的毛泽东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著作之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着伟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写的许多重要科学论著（如：《论持久战》、《论政策》、《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他的军事辩证法、战略策略中的辩证法、党的建设中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国际斗争中的辩证法、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矛盾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展开和发展。因此，《矛盾论》以及它的姐妹篇《实践论》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是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钥匙，也是认识和了解中国革命发展史的钥匙。我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它们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真理。这是大家都共知的事实，在此不再多加赘述。

《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党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基本教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简要地介绍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前《实践论》和《矛盾论》传播、出版情况。

1937年4月至“七七”事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因忙于其他事务，讲课只好中断，辩证法只讲了一个矛盾统一法则，原计划讲的其它两个法则和一系列范畴没有能讲了。讲课后，他将讲课的记录稿整理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印发给大家学习。现在保存最早的油印本是1937年9月印的。同时，在延安又将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即《实践论》和《矛盾论》单独油印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不仅成为当时延安革命干部学习哲学的教材，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据笔者所查，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1938年4月8日的第六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内连续刊载讲授提纲，并标明“毛泽东主讲”。以后延安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1941年2月以前，具体年代不详）、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上海中国书店（1946年3月）、大连大众书店（年代不详，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等公开署名出版发行过，某报社在1944年9月亦内部印行过。1965年1月9日，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对毛泽东说，他“好像记得，在1938年夏曾看到过这两篇（许按：指《实践论》和《矛盾论》）未出版的手抄翻译稿。”

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1942年2月18日、19日发表了张如心同志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该文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分为三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张如心同志认为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同志的全盘理论和策略的、他长期参加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全部实践的活动的思想基础”，是最重要的部分，文中列举的学习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著作中，第一本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还明确地把这个讲授提纲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起当作是“我党思想方法的基础”，这表明《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中共党的思想路线

的理论基础，成为党内思想路线教育的基本教材，决不是解放以后的事，而是在延安时期，至少在 1942 年时就已如此。

《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诞生后不仅对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发生影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有一个过程，由于客观上和主观上的种种原因，在《矛盾论》、《实践论》问世以前，我国专业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13）。《矛盾论》和《实践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和道路。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在延安的《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2、3 期（1941 年 8 月 20 日）上发表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一文中说：“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即《矛盾论》——引者）是最好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还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以上的事实足以说明：《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解放后正式公开出版之前早就在中国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对我国哲学的发展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50 年，《实践论》经过著者润饰后重新发表。过了两年，即 1952 年，《矛盾论》也经过著者对原稿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正”后与读者见面。正式发表后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成为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读教科书，它们的基本观点已为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以至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所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实践论》和《矛盾论》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哲学和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影响。

重新发表后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人民和进步人士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955 年出版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14）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在他的 1956 年出版的俄文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说：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15）康福斯在该书唯物辩证法部分曾九次引证《矛盾论》，在认识论部分则十二次引证《实践论》。

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把《实践论》和《矛盾论》当作党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当作引导本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们之中有人说：“每一个共产党人联系生活和实践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巨大发展。”又说：“为了锻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需要学习和反复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一些头脑清醒、比较注重事实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巨大价值。美国人霍勒布尼奇在《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说：“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而他关于矛盾差别性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特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的辩证法来说，都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的。”他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得逊色。”“它们都是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们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

国外具有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政治态度和不同世界观的人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赞誉、称道、评价是否恰当，我们这里姑且不论。但这一事实本身却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些反共的马克思主义敌人和某些出于政治偏见的人对这两篇著作的攻击、诬蔑，则从反面说明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国界，否则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起劲攻击呢？

总之，《矛盾论》的产生有其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人类辩证法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当然，《矛盾论》同一切科学著作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它时代的局限性。《矛盾论》并不是完满无缺的，更没有穷尽对立统一学说。任何把《矛盾论》的思想绝对化、神圣化的做法都是反辩证法的，今天，我们已处在同《矛盾论》写作时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新的实践，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要求我们写出新的矛盾论，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生前所希望的。我们应当努力啊！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1期

注释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列宁：《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11)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33、303、333、330、331页。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页。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12)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13)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2页。

(14)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66页。

(15)康福斯：《辩证唯物主义》，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15 页。

“设置对立面”命题不应否定

“设置对立面”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一个思想方法。1980年，有人发表文章对“设置对立面”的命题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命题“很难成立”，它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唯心论。近两年，又有人在学位论文中否定“设置对立面”的工作方法，认为它是“左”的产物，导致“斗争哲学”。我以为“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不应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有必要比较详细地介绍毛泽东对这一命题的有关论述，以便准确地理解与把握这一命题的内涵。

1958年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评建国以后我国一些部门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时说：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两者是对立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

3月10日，他又讲：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

3月22日，他讲：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3月25日，他说：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

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讲了设置对立面问题。在5月8日的会上，他说：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于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置对立面。整风反右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了大字报，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他进一步解释说：设置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上不存在而去设置。所谓对立，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在5月20日的会上，他再次谈到设置对立面问题。他说：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全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另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但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办法设置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的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1959年3月17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就关于如何召开县和公社会议问题上指出，县召开五级——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干部会，每一级都要有人参加，而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帐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帐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为的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求得正确的、符合广大群众的政策。

3月29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又指出：“城市，无论工矿企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

在庐山会议上，他在7月11日夜谈的谈话中曾说到，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所说的“设置对立面”有以下含义：（一）在社会中客观上本来有的对立面才能设置，客观上没有的不能人为设置，在自然界，有的对立面虽没有，可以人为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要符合客观规律。有的论者认为，“设置对立面”就是凭主观意志去任意制造对立，制造矛盾，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二）“设置对立面”就是有意识地自觉地揭露矛盾，被设置的对立面并非就是敌人或反面教员。有的论者认为，既然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就用不着去设置。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因为对立面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往往为表面上的一致、单纯性所掩盖，并非是人人所能认识的。（三）“设置对立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主要意义是为了防止片面性。因为有了对立面，就有比较，就有争论，就容易求得对问题的全面的认识。我认为，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设置对立面”的命题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决非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应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处理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上有严重的失误。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但对这类错误也要作具体分析。这类错误的发生并非是由于设置了对立面的结果，而是由于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矛盾、错误地判断矛盾性质的结果。有的论者以毛泽东在应用“设置对立面”方法时所犯的错误来否定这一方法的真理性。我认为这种否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原理，只有在正确地应用它时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若应用得不正确，那就会犯错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自然科学家决不会因应用得不正确犯错误而否定科学原理本身。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统一。要正确认识事物就必须客观地认识矛盾双方的特点及相互联系，切忌片面性，努力做到全面性。毛泽东曾说：“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为了避免片面性，就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谈运用唯物辩证法问题时说：毛主席“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取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陈云的这些话是对毛泽东的“设置对立面”思想方法的一种补充说明。

总之，“设置对立面”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正确应用这一方法，经常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可以减少片面性，从对立面的比较、争论中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和处理矛盾，做好工作。

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1年第3期

“斗争哲学”与“和的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作为毛泽东的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宣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斗争哲学”受到批判，无人再敢提起。“物极必反”。在批判“斗争哲学”之后，有人主张“和的哲学”。近来，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哲学的走向是“和”，中国文化为21世纪人类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斗”和“和”呢？应如何评价“斗争哲学”和“和的哲学”呢？我想，弄清这类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

一、借冯友兰说起

冯友兰晚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著述。他实现了自己的宏愿。遗憾的是他只见到了前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卷即第七卷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这一卷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才由香港中华书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印行。冯友兰在书的最后一章谈了“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他认为，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特点是强调统一、和，未来世界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为论证，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辩证法加以比较。

他说：“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的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他又说：马克思、毛泽东是革命家，当然主张“仇必仇到底”。

紧接着，他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新的统治者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因此，“新的矛盾统一体”代替了“旧的矛盾统一体”之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就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上。“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字”。“‘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最后，他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这是冯友兰对张载“仇必和而解”的一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对自己原有观点的重大修正。在60年代初，他认为，张载、王夫之虽然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没有认识到辩证法的根本点，那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他们的“仇必和而解”是“阶级调和的反辩证法的理论”。这种评价在那时十分流行，并非是冯友兰一个人独有的。在今天，有许多人仍持这种观点。如张岱年在专为《张载集》写的《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中说：张载看到了对立面的斗争，却认为一切斗争都必

归于和解。“这表现了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冯友兰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见解。我想，他的这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同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评价相关联的。

冯友兰晚年肯定“仇必和而解”的思想在我国哲学界有一定影响。陈来认为，“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和”后面，还有一个道德基础，那就是仁。仁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体，和为用”，而西方文化缺乏和的精神，它只有强加于人的精神。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是“以仁为体，和为用。”

今年《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的郑国谦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一文，直接引用了冯友兰有关“和”的话，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以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其基本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这就导致了调和哲学”。世界要维持发展，人与环境所组成的统一体不能破坏，所以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的辩证法。该文又说：“世界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体现着以和为本的辩证法。”

笔者感到：“和的哲学”正在中国哲学界悄然兴起。“和的哲学”是对“斗争哲学”的一种回应，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潮。二、毛泽东讲“斗争哲学”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把“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当作毛泽东语录加以引用，其实，它并非毛泽东所言。它不过是毛泽东借用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话。毛泽东曾在中共的两次重要会议上讲到“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在讲到党的独立自主路线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时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邓宝珊（1896—1968年）是同盟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30年代，唯物辩证法思潮席卷全国，成了全国哲学界主潮流。受此影响，邓宝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1939年，他路过延安。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谈。谈话中，他对毛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此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邓宝珊的说法是正确的。故他在“七大”讲话中肯定“斗争哲学”的提法。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一直没有公开过，所以在此后“斗争哲学”无人提起。

毛泽东第二次讲“斗争哲学”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等的正确意见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彭德怀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8月16日，他在一个材料上批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

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文革”中这一批语广为流传。林彪、江青一伙大肆鼓吹“斗争哲学”，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历史已表明：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则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应究竟如何评价“斗争哲学”的说法呢？笔者认为，在评价时我们应将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作适当区分。因为从抽象的哲学理论到具体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理论上的正确并不能保证具体实践上一定成功。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上的正确，成功，就简单地肯定“斗争哲学”。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就简单地否定“斗争哲学”。而是应对“斗争哲学”本身作理论上的分析，看看它是否真有道理。

毛泽东讲“斗争哲学”不是无产阶级发明而是历史上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发明的。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在西方，“斗争哲学”可追溯到古希腊奴隶主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氏素有辩证法奠基人之称。赫氏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可以说，赫氏是“斗争哲学”名副其实的创始人。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引了上述赫氏的话（译文与今天略有不同）。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著时注意到李达有关赫氏辩证法思想的叙述，写了很长的批语。在批语中，他还摘引了“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不是和”等赫氏原话。

当然，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想并不来自于《社会学大纲》，来自于赫拉克利特，而是来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之于时代精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达尔文进化论传入我国，风靡思想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大力提倡斗争精神，坚决反对调和论。他说：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天职。“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循苟安之余地。”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也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11)受时代精神的感染，血气方刚的青年毛泽东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要毁旧宇宙，得新宇宙，立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察中国社会，全力投入社会革命。在30年代，他在学习、研究辩证法时十分重视列宁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的论断。他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的斗争问题”。“对立的统一性不是(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的斗争(是)。”(12)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强调斗争是十分自然的。不唯毛泽东如此，马克思也很崇拜斗争。他的女儿问他：“您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他回答：“斗争！”这已是人所共知的。1880年，美国一记者在英国兰兹格特海边采访马克思。记者问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问题是：“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马克思望着咆哮的大海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13)列宁也曾说过：他的命运就是连续不断地战斗。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是客观的辩证法。因

此，讲辩证法，讲矛盾，讲革命，就得讲斗争，离开了斗争，就无所谓辩证法，无所谓革命。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强调斗争的绝对性时，并不忽视同一性，毛泽东在讲“斗争哲学”时，并不忽视和、团结的重要性。下面就谈这方面的问题。

三、毛泽东讲“和为贵”

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斗争，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但他由此推论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仇必仇到底”，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许多人只知道毛泽东讲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却不知道毛泽东还多次讲过“和为贵”，讲到“和”。据笔者所见的资料，毛泽东讲“和为贵”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国内各阶级、各党派要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第二种是指人民内部要讲团结、友爱，不要进行无谓的斗争。

先说第一种情形。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致国民党当局和将领的信中提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14)“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5)。这里虽没有用“和”字，但为了共同抗日，国共两党要“和”的思想是很清楚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毛泽东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又不一切联合，否认斗争。1937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和“争”是对立的统一。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不赞成我们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建国。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亲赴重庆，进行国共和谈。1945年，毛泽东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席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16)。10月8日，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张治中设宴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在宴会上，毛泽东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17)。国民党违背人民的意愿，撕毁和平协定，发动内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带着一小部人跑到了台湾省去了。

全国解放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始终是毛泽东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56年，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之后，又提出可搞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他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开头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完结，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从他的临终遗言看，他对生前未能实现中国的最后统一表示遗憾。不过，他仍不赞同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显然，毛泽东讲“和”，讲“和为贵”，不仅是出于政治斗争策略的一种宣传，而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负责的真诚的政治方针。当然，这种“和”是有原则的，是包含着必要的斗争的。

再说毛泽东讲“和为贵”的第二种情形。

1941年夏，党内一部分同志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发生争论。8月

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复信中说：“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实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18)这是讲党内领导干部之间的“和为贵”。

1944年9月18日，他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时说：“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由此看来，“和为贵”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则。

“和为贵”是《论语》中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曾把“和为贵”作为“反动的孔孟之道”列入其中。看来，不仅这个材料的泡制者不知道毛泽东曾正面引用过“和为贵”，而且毛泽东本人在审阅这材料时也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这也就难怪冯友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误解为“仇必仇到底”了。

四、“斗”和“和”的辩证统一

“斗争哲学”与“和为贵”，在毛泽东那里看似矛盾，不相容，实则是统一的，并存不悖的。他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发挥了列宁关于“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的思想。他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具体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切不可将某种公式不适当地套到一切事物身上。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毛泽东反对乱斗一气的“左”的做法，十分注意讲究斗争的艺术和策略，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的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19)。“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20)这表明，虽然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但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斗争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有的矛盾以斗争性为主，有的矛盾则以同一性为主。也有这样的情况，同一矛盾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情况，在有的阶段以同一性为主，在另一阶段则以斗争性为主，对斗争也应讲究艺术。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是绝对的，但斗争要适度，“有节”就是要适可而止，以不破坏统一战线为前提。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令他的敌人也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同一性中存在斗争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泽东讲“和为贵”，讲团结，讲统一，并不排斥斗争。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人民内部，在党内，要巩固和发展团结，也离不开斗争，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团结中就包含着不团结。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党、阶级、人民都一样。

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但斗争的结局则是多种多样的：一是矛盾的一方战胜、吃掉另一方；二是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发生转化；三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产生新的对立面；四是对立面之间的结合；五是势均力敌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让步、妥协、调和、共存，等等。冯友兰所说的“仇必仇到底”只是斗争的一种结局，即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不具有普遍性。唯物辩证法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不承认有到处可以套用的绝对不变的公式。

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仇必仇到底”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

与“仇必仇到底”一样，“仇必和而解”也只不过是矛盾斗争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结局。冯友兰将它普遍化、绝对化同样是不妥的。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要共存数百年。它们之间除了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一面之外，还有互相依存、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一面。人类社会最终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实现大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万古长存，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犹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有它的必然性，但从发展看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其最终结局，不是“和而解”而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代替另一方。我认为，宇宙间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最终结果不是“和而解”，而是新的战胜旧的，代替旧的。唯有如此，世界才有进步，才有发展。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发展规律，“仇必和而解”则不是，不具有普遍性。“和的哲学”不过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和的哲学”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一样无多大的生命力。中国古典辩证法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同一，强调相反相成，而不像西方哲学强调揭露矛盾，强调斗争。中国的道家、儒家和佛家提倡不争、戒斗，提倡和。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提倡和，其实际的社会效果是弊大于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片面强调和，就会失去奋发进取的斗争精神，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以至归于淘汰。故我认为，当今的中国不宜提倡“和的哲学”。

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客观辩证法。片面强调斗争，或片面强调统一，皆失之偏颇，企图用一个“斗”字或一个“和”字来概括辩证法的本质皆不可取，重要的是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活的灵魂。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

1995年第1期

注释

张载：《正蒙·太和篇》。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7—258、280、261页。

冯友兰：《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7页。

见《群言》杂志1994年第2期。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陈独秀：《抵抗力》，《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第94页。

(11)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7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第 97、99 页。

(13)《马克思逝世之际》第 48 页。

(14)(1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88 页。

(16)(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31—32 页。

(18)(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7、109、127 页。

“部分质变”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长期以来，不少人在讲课、写文章时，把事物发展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原理看成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质量互变规律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例如，杨超在《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部分质变这概念，已经是我国哲学界所公认的科学概念”，他又说：“部分质变的原理是毛泽东同志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认识的一个深化。”钟锦泉在《毛泽东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新发展》一文说：“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列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部分质变的原理，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质量互变原理的新发展。”去年十月，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有位同志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事物发展的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思想，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属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理论或新结论”。

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总的量变过程中存在部分质变的原理，认为“部分质变的命题是五十年代提出来的”，“是为了从哲学上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断革命的过程”，“是‘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哲学基础”，也有的同志不同意“部分质变”是毛泽东提出的新观点的说法，认为早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李达同志在《社会学大纲》中就讲到部分飞跃”。

为了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同志对量变质变规律上的贡献，有必要对部分质变思想的由来和发展作一简要的介绍。

黑格尔是把量变质变规律作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来表述的第一个人。但他没有部分质变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没有明确提出部分质变的原理。不过他们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有所论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时把它区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样三个不同的阶段，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工业化时期；农业集体化时期等等。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依据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和苏联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明确地提出了部分质变的原理。据笔者所查，在苏联哲学著作中的中文译本中最早论述部分质变原理的要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1年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哲学研究所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著，李达、雷仲坚合译，1932年出版）。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论述“质的规定性”这一节时指出：一定过程中各种发展阶段上的质是有差异的，因此，“对任何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整个过程之质，并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质的差异上，研究这个过程的种种发展阶段。”这本著作还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例如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这种质量内部的飞跃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还特别指

出，过程内部的飞跃或质量内部的飞跃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飞跃的区别。从上面极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苏联哲学工作者提出部分质变的思想无疑是对马、列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后的苏联哲学著作几乎再没有提到过程内部的飞跃或质量内部的飞跃。

被苏联“遗忘”了的部分质变的思想，却为中国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37年5月出版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分析飞跃的多种形式时谈到“部分飞跃”，指出：“一定的质所包含的个个侧面，由于量的变化，通过其许多属性，形成许多局部的非连续性的变化（即部分的飞跃）。”李达把自由资本主义与独占资本主义以及恐慌与景气恢复、战争与和平、阶级的斗争与休战等都看成是全体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部分的质的飞跃。

毛泽东同志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认真研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在半年的时间里，他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之处写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语。这本书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最多，最长的一段批注近千字。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的部分质变的思想是了解的。他在抗大讲授哲学时，因“七七”事变的爆发，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和辩证法的其他法则、范畴没有讲。所以我们今天无法了解毛泽东同志对质量互变法则的全部看法。但是，他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用矛盾的观点分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深刻地揭示出总的量变过程中发生部分质变的两种情形（即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及其原因。

1939年，艾思奇选编了《哲学选辑》。在书中附了他拟的哲学《研究提纲》。这个《提纲》在质量互变法则这一部分指出：“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质变，和过程内部的质变，其飞跃的形式也不同，前者是过程全体的质变，后者是部分的质变。”1940年，他在《中国文化》杂志的哲学讲座中，对部分质变的原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指出，由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阶段的区别，因此，事物质的变化也要从两方面看：“第一是全过程的质变”，这是事物质的根本转变；“第二是过程内部阶段的推移，在这推移中没有质的根本转变，只有主要属性的更替，但这仍然是质的变化。”在论述质量互相转变时，艾思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还要注意的是一事物的发展突变，并不仅仅是在它的量变过程完结的顶点上才会出现，就在量变过程的中间，也会不断地出现各式各样的小的飞跃突变，”前一种飞跃是事物的全体质变，是总的飞跃。后一种飞跃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着的事物内部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的部分的量到质的转变。艾思奇还把这种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原理运用于革命的战略策略上。他说：“革命的总的战略为着完成总的革命目的，达到总的飞跃。然而在总的战略指导下又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形式来完成各个时间地点的具体条件下所规定的部分

的或一时的任务和目的，这就是为要达到部分的或一定方面的质变。”因此，我们不但在总的目标上应是一个革命者，而且要以革命的精神贯穿工作斗争的全过程，要多种多样地灵活地转变自己的行动方式，不要固守死的策略，不要在行动上顽固化、简单化。艾思奇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详细、深刻的。

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原理为当时许多人所接受和运用。1940年，郭化若在《军事辩证法》一书中谈到战略战术的辩证法时指出：“量变的过程是相当长的，在一个大的质变到来之前，往往有许多小的质变，这种小的质变，也可以看做全过程的量变。为要使全过程量之增加的变化加速，则领导者对此许多小的质变时机之把握与推动其推移，是非常重要的事。”

据我所见到的材料，毛泽东明确讲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话是在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但只是顺便提到，没有专门论述。60年代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对部分质变的原理进行了论证。

由此看来，部分质变的原理并不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也不是李达同志提出的，而是苏联哲学工作者提出的。至于那种认为部分质变原理是50年代提出，为“左”倾错误作哲学论证的说法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在部分质变原理上毛泽东有没有贡献呢？我认为也是有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的著作，虽然对部分质变原理有所论述，但均未能从理论上说明这一原理的普遍性，未能揭示部分质变的内在原因。毛泽东则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论证了这一原理的普遍性。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他又说，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他还以自然界、人类社会一些常见的、通俗易懂的例子来说明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如前所述，在《矛盾论》里，他对事物发展过程呈现阶段性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部分质变的两种形式及其产生的根源。毛泽东的对部分质变原理的说明使这一原理有着可靠的哲学根据。

第二，毛泽东把部分质变的原理出色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进一步补充和发展这一原理提供了生动的丰富的材料。中国武装斗争走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革命战争中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对部分质变原理成功运用的事例，他还把部分质变原理运用于社会革命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理论。现在许多哲学教科书和文章在论述部分质变原理时所运用的材料不少是取之于毛泽东的著作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实践。

第三，部分质变原理虽然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引起哲学界的

足够重视，以至苏联后来的教科书再也不提这一原理。毛泽东同志在 60 年代初对部分质变原理的论证，引起了哲学界的热烈讨论，推动了这一原理的研究与发展。从 60 年代开始，我国的哲学教科书一般都以一节或一节中的一个目来专门论述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原理。

总之，我认为把部分质变说成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原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由此而否认毛泽东同志对发展部分质变原理所作的贡献也是完全错误的。

原载《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的《理论探讨》

1982 年第 10 期

注释

杨超：《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3、183 页。

钟锦泉：《毛泽东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新发展》，载《青海社会科学》1982 年第 1 期。

王风贤、沈善洪：《‘部分质变’论质疑》，载《国内哲学动态》1980 年第 11 期。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唯物辩证法教程》，笔耕堂书店 1932 年版，第 256、274、275 页。

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9 页。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4 页。

艾思奇：《论质量的互相转变》，载《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3、4 期。

郭化若：《军事辩证法》，上海新群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87 页。

浅析毛泽东由“否定之否定”到“肯定否定”的变化

何祚榕的《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有无“否定之否定”的地位》一文（刊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年第3期）指出，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定律的精神实质有深刻的理解，并把它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应有其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一结论，我是赞同的。但何祚榕的某些观点，却难以苟同。现将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写出来，如有不妥之处，请何祚榕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

何祚榕说：“众所周知，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定律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摒弃。毛泽东同志没有纠正这一偏颇，他的文章中也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定律。在他的后期有时提到‘肯定、否定’，但并未展开说明。看来他对以‘三段式’为形式的否定之否定定律，和斯大林一样，是持否定态度的。”

确实，在解放以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并未见过他提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且也几乎未见（据我所查，在五卷《毛泽东选集》中仅有一处）使用“否定之否定”的术语。但由此得出他的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定律”，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持否定的态度，那就不对了。请看以下事实：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毛泽东1937年4月至“七七”事变期间在延安抗大讲授哲学以后整理成的。该书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引言部分明确他说：“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据当年在“抗大”工作过的人讲，因“七七”事变的爆发，毛泽东忙于其他事务，辩证法只讲了一个矛盾统一法则，其余的两个法则和一系列范畴没有时间讲了。很清楚，在1937年时，毛泽东是明确地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之一的。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认为它与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是“永远普遍地存在”。在此之后，他在一些讲话中仍然使用过“否定之否定”。如，他在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就说：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就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形而上学。现在又讲辩证法。他又说，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直至1964年2月，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还说，列宁、斯大林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毛泽东对上述历史过程的分析是否恰当，另当别论。但他以“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过程却是事实。

此外，毛泽东还把人类认识过程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把人类认识的正常秩序概括为特殊——一般——特殊，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等等。很明显，这些概括也都具有三段式的特征。

我所见的材料有限，但以上确凿的事实足以说明，毛泽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是完全肯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的，是多次使用过“否定之否定”这一术语的。何祚榕所说在毛泽东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毛泽东在晚年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有所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前面提到的用“肯定否定”来代替“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外，还表现在：

第一，他在1964年和1965年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不同意传统的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有三个的提法，提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把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在他看来，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这样就把否定之否定和量变质变由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降为处于与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等范畴同一层次的地位。

第二，他还认为，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他举例说，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于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封建社会是否定，对于社会主义又是肯定。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上述看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国外有的人片面摘引他的某些话，认为他根本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简单。对毛泽东上述变化了的看法应加以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我认为，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不同意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平行并列的传统观点，是合理的，是对列宁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的总结。他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亦是正确的。但他由此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降低了它在辩证法中的地位，这就不免失之偏颇了。

毛泽东关于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根本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完全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呢？我认为不是的。如果不拘泥于字句，而从实质上看，他所说的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是指他不相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的普遍性。这一点，我和何祚榕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何认为毛泽东不相信“三段式”的普遍性，是由于他囿于把否定等于质变的传统理解所致，是一种误解。这是我难以赞同的。我认为毛泽东否认三段式的普遍性，而把事物的发展过程看作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和内容，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用“肯定否定”来代替“否定之否定”的表述等问题。

何祚榕说：“否定之否定揭示的是由矛盾引起的事物存在形式的发展规律。就是说，事物的存在形式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规律发展。”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怀疑以三段式为形式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是由于因于把否定等同于质变的传统理解。若按照他所提出的新解，即否定只是事物存在形式的变化，而不一定是质变，那就不会怀疑三段式的普遍性了。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作为发展环节、联系环节的辩证否定是否是质变（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这里暂时不论），而在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否等同于发展过程的三段式。

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揭示事物的存在形式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发展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众所周知，黑格尔是西方哲学

史上第一个阐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人。透过黑格尔晦涩的唯心主义词句，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否定之否定思想中最本质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对否定的辩证分析以及对人类认识过程是圆圈的分析。黑格尔在阐述否定之否定原理时采用了三段式的表述形式。他认为概念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发展。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按照这一公式构造起来的。为了满足三段式的要求，他往往玩弄概念的把戏，进行牵强附会的说明。他的这种做法不仅使否定之否定带来某种神秘的色彩，而且使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对辩证法无知而又攻击它的人）把否定之否定以至整个辩证法等同于三段式。其实，黑格尔本人也不认为三段式是普遍的、绝对的。他说：“如果那第一个否定已经是第二项，那末，那被数为第三的，也可数作第四；抽象的形式也将不用三分法而被当作是一个四分法。”他认为二段式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它“只是认识方式完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他强烈地批评当时的许多人并不懂得辩证法，而只是形式主义的占取三分法，用它来构造各种体系。列宁充分地肯定了黑格尔对三分法的分析和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他说：“黑格尔无情地斥责形式主义，痛骂玩弄辩证法的把戏的无聊、空洞。”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否定之否定时所强调的亦是对否定的辩证分析和发展的螺旋形式。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所揭示的是事物按螺旋式发展的规律。他在《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草案中曾说：“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列宁虽然没有读到《自然辩证法》，但他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指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他说：“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他们并不反对三段式，但他们从来没有拘泥于三段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列举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许多事例中，有不少是三段式的，但也有不是三段式的。如，他说：“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逐层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他们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更只是指出，社会发展是按螺旋式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但革命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他们丝毫没有强调革命运动过程的三段式。他们还坚决反对将辩证法与三段式（或三分法）混为一谈。马克思在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谴责杜林将他的辩证法同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罗·施泰因“死板的三分法”相提并论的荒谬做法。列宁对马克思的这封信极为重视。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辩证法部分特别提醒读者要参看这封信。

何祚榕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精神实质有深刻的理解。那么毛泽东所理解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是事物存在形式发展的三段式吗？显然不是。如前所述，毛泽东也常常采用三段式来表达事物发展过程，但他也从来不拘泥于三段式。如，他把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表述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又如，他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概括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而把人民事业的逻辑概括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从毛泽东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否

定之否定规律的运用和说明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辩证的否定观，既反对否定一切，又反对肯定一切；二是坚持事物的波浪式或螺旋式发展，反对形而上学的直线论。而这两方面正好揭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我认为，毛泽东正是基于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和实质的深刻理解，才在晚年提出，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无限过程，才不相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不相信三段式的普遍性。

从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的抽象的唯心主义论述，到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的广泛运用和说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愈来愈清楚地看出：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即否定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的否定，肯定也不是绝对的肯定，而是包含否定的肯定；这一规律所揭示的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即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循环的，更不是倒退的，而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这种前进又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或波浪式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当作普遍的发展规律。所以我认为，把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成是揭示了事物（不管是指它的本质，还是它的存在形式）按三段式规律发展的观点，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可以说在黑格尔的时代就有，一直延续至今。主张或接受这种误解的，既有辩证法的拥护者，也有辩证法的敌人。毛泽东不相信三段式的普遍性，是对这种误解的否定，是正确的。不过，他确实也有点囿于这种由来已久的误解，因而在否定这种误解时，使用的竟是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语言。

三

最后，还要谈谈毛泽东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说明这种改称的理由。但从他对这一规律内容和实质的理解来看，他的这种改称是合乎逻辑的，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这种改称正确吗？我认为正确的。

首先，“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在实质上没有不同。因为作为发展环节的第二次否定，实际上是新的肯定，是前两项肯定和否定的统一。

其次，“肯定否定”比起“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具有明显的优点。从字面上看，“肯定否定”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概括了事物按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形式发展的全过程。而“否定之否定”却做不到这一点，它只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第三个环节。“肯定否定”比“否定之否定”更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因为“肯定、否定、肯定”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更明显地表现出事物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和仿佛向旧东西的回复。而“肯定、否定、肯定”的公式正是“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实践、认识、实践”，“团结、批评、团结”，“平衡、不平衡、平衡”等等具体公式的抽象和概括。

第三，“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表述方式上的黑格尔主义的遗迹。列宁曾指出：“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但列宁并没有解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遗迹。斯大林没有真正了解这一规律的实质。他因摒弃这一规律表达方式上的黑格尔主义遗迹而否

认这一规律，当然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用“肯定否定”来代替“否定之否定”，这就既肯定了这一规律，又摆脱了这一规律表达方式上的黑格尔主义遗迹，同时也有助于剥夺辩证法的敌人对它歪曲和攻击的口实。

总之，毛泽东由“否定之否定”到“肯定否定”的变化，并不是否定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不是离开了辩证法思想，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更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规律的内容和实质，因而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种进步。我们不仅应充分肯定“肯定否定”规律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地位，而且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也不宜再沿用黑格尔遗留下来的“否定之否定”的表达方式，而应采用“肯定否定”的表达方式。这恐怕也有一个破除旧的传统观念的问题。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1985年第2期

注释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4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列宁：《马克思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487页。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的内容，是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毛泽东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基本矛盾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科学的规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到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中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考察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评价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所作的贡献。

一、“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前史考察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考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些新的概念，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观上的伟大革命变革。他们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无可辩驳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在反对俄国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时，不仅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而且揭露了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发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理​​论，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光辉的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著作中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论述是哲学工作者们所熟知的，在此无须再作引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作家们虽然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作是贯串人类社会始终，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动力，把关于这两对矛盾的理论看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内容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南，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过“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术语，当然也更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明确地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

列宁逝世后，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的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哲学界曾一度偏离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进一步发展了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这一对矛盾的理论研究；二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

笔者所见到的中文译本的苏联三四十年的哲学教科书一般都很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都能用专门的一章来论述这一对矛盾，但却都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都未能用专门的一章来叙述这一对矛盾。如，1933 年出版的由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米了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用较大篇幅的一章阐述劳动过程、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劳动力的作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法等问

题。但该教科书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仅未能加以专章说明，而且也未能在节的标题上标出这两个概念。

1938年，斯大林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简明扼要而又通俗易懂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定义，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的特点作了明晰地阐述。但是，他在这本著作中不仅没有能纠正苏联哲学界存在的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的错误，相反还使这种错误得到了发展。他除了引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连提都没有提到。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时代，苏联哲学界都按照斯大林的体系讲，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照例不被重视。

这种状况直到50年代初才改变。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对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作了明确的回答，对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关系作了说明。从此，苏联哲学工作者才对这一对矛盾展开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看作社会的基本矛盾。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很少涉及上层建筑。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缺点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否认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论断。斯大林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支配着苏联理论界。

1940年，有一位苏联哲学工作者发表文章，指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这一矛盾就等于拒绝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上来”。为此，苏联理论界就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不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有个别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但是，绝大多数的苏联理论工作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之中有的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带有历史性（许按：着重号是原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胜利，一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最后一个对

抗性的生产方式），同时也解决和消灭了仅为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形态所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写的关于这次争论的《来稿综述》一文，大量引用无矛盾论的言论，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矛盾的观点。编辑部对这场争论所作的结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合，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矛盾的消灭”。可见，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在那时苏联理论界占了统治地位。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且认为，如果领导机关执行不正确的政策，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斯大林对自己原有的错误作了改正。但这种改正是不彻底的。因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这一改正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在 1955 年至 1957 年，苏联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又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和 1940 年的讨论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讨论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期盛行的形而上学无矛盾论的批判和清算。在这次讨论中，顽固坚持无矛盾论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但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基本矛盾，如果有的话，基本矛盾是什么，则又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有的人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有局部的、暂时的矛盾，不能有基本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没有根据。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的人中，对什么是基本矛盾的看法也是形形色色的。其中有的人认为，全体人民无限增长的文化物质需要和物质文化资料生产在每个时期内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的人则认为，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有的人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见，那时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基本矛盾以及什么是基本矛盾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

二、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的是毛泽东。

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十分注重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研究和运用。在《矛盾论》里，他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在同一著作里，他还明确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批评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他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把事物矛盾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研究的时期说：“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还明确使用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术语。

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具体地考察和分析，并依此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此，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都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杰出运用。

这里顺便指出,我国理论工作者对1940年苏联理论界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的争论表示过自己的看法。1940年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曾在第一卷第三期、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一期上分别译载了苏联三篇不同观点的文章,接着在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王思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的长篇文章。王思华鲜明地批评了苏联哲学界的无矛盾论,指出:若否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来源,结果他便陷于外因论的泥坑之中了”。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有矛盾。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差别,“因此也就包含着矛盾。因为差别就是矛盾”。他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社会发展的动力仍是其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王思华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矛盾论》的话,但十分明显,它确实是以《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为其理论依据的。当然,在那时,我国的理论工作者还不可能系统地纠正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形而上学错误。因为我们那时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发生了几件大事: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波兹南骚动。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下充分暴露出来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在这重要时刻,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学说,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针对斯大林以及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严重偏离这一情况,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科学规定。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在另一处,他又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1)他还说: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但“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2)所以共产主义制度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还要改革,还有革命。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串人类社会始终、推动人类社会永远不断前进的基本矛盾。

应当指出,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是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且也是为了澄清苏联理论界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出现的严重混乱。毛泽东对苏联1955年至1957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讨论情况是了解的。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中和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都谈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哲学界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开始有所

变化，产生了许多篇谈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文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苏联哲学界这一场讨论所作的“总结”。

从上面的简略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所作的明确规定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它既不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相对立的，又不是他们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是对他们思想的一种发展。我们可以设想，要是经典作家们早已对社会基本矛盾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说明，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很可能不会发生犯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的错误，不会出现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对社会基本矛盾所作科学规定的重要理论意义，应当记取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

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这决不是说，这两对矛盾在社会发展中起同等重要的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因此，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更为根本。如果把这两对矛盾平行地并列起来，或把后一对矛盾看得比前一对矛盾更重要，那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主要的表现以及解决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13）。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但它们之间的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相矛盾是次要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的，一般不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他还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4）1956年，我国虽然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旧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生产力不发达，因此它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只有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为此，他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5）的伟大号召，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的重要决策。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年4月出版

注释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5页。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9、105、107、108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

关于这次讨论的文章，我国《学习译丛》有译载。1957年《学习杂志社》又出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论文集》。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17—318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1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同上书，第319页。

(1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上书，第377、375页。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学习，喜读古书，钻研哲学。他对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等均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斯诺在 1936 年会见他后便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善于对我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继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求实学风在理论上的飞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他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在同中共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它也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重视对社会情况的实际考察的求实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进步思想家，写下了不朽名著《史记》。他在二十岁时就开始到祖国各地漫游，“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二十五岁时，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代表汉王朝去视察巡抚西南少数民族。司马迁的漫游、出巡，不仅使他饱览了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观瞻了历史遗迹，而且了解到许多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情况。这是他写出《史记》这样鸿篇巨著的重要条件，这种长途漫游、实地考察的求实学风，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宋朝的刘彝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明朝的鹿善继有“读有字书，却要识没字理”的名句。

中国历史上注重社会情况调查和向社会学习的优良传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写的《讲堂录》中记有“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该，遍游四宇尚已”等警句。他主张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要读无字之书，并特别赞赏游学。他说：“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矣；马迁览滞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 1917 年暑假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游历了长沙等五县农村，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在 1918 年赴北京途中，利用火车因洪水受阻的机会，到车站附近了解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北京期间，又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工人中调查了解工厂的生产和职工的生活情况。

当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便把对中国社会情况的调查看成是改造中国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他在 1920 年 3 月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为什么暂不“出洋”留学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认为不如先在国内做了“这层工夫”后再出国，这样可以“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著作中最早明确他讲到调查研究的一段文字。

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原有的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被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了。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自进行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对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方法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发展的逻辑必然，并使它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世纪30年代，国内外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都是按照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理性认识（概念、判断、推理）、理论思维方法（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的顺序来讲认识论的，都是在讲真理的标准问题时讲实践问题的，《实践论》则冲破了当时国内外流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它紧紧抓住认识和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具体地阐明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揭示了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因为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表明，能否正确地解决好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其次，我认为，这也与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有关。

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的，中国哲学史上知和行相互关系上的争论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行先后问题，是先行后知，还是先知后行，抑或知行合一；二是知行本末、轻重问题，是以知为本，重知轻行，还是以行为本，重行轻知，抑或知行并重；三是知行难易问题，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抑或知难行亦难。这种争论从古代孔子起，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孙中山。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至《实践论》问世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还没能对知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作出应有的马克思主义回答。

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时，虽然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像专门的哲学家那样去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但从现有的资料看，此时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抗大讲课时指出：唯心论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否认意识受物质限制。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则没有强调思维的能动作用，不能克服唯心论。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了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了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克服唯心论。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知行合一”论，当然不是王阳明的“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的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论，而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直接引用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但从他把“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该书的副标题赫然标出，则清楚地表明，整个《实践论》就是为了阐明“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阐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科学总结，并使它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是对我国古代辩证法的批判总结和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也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关

于矛盾对立的立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

《老子》、《孙子兵法》、《周易》是我国先秦时期最主要的辩证法著作。它们所包含的朴素的、直观的辩证法思想是异常丰富的。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猜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

从毛泽东求学时代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在批语中列举了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等对立的概念，并说，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他还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当然，此时的毛泽东还受到中国哲学史上相对主义的影响，不能划清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界限。

毛泽东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自觉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使之为中国革命服务。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他把中国古代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为人民军队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不仅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老子》等著作中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名言，而且对战争过程中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战略与战术、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前进与后退、得与失、胜与负等等相互关系的分析，贯串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矛盾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且也是对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总结和在新的基础上的发挥。他在抗大讲授《矛盾论》时曾列举大量例子反复说明对立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道理。他在举例时常常用“相反而又相成”，“许多相反的东西，却同时又是相成的东西”等语句，而且还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成语。《矛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系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就对“相反相成”作了科学的说明。

在封建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由于我国先秦时期形成的辩证思维的传统，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的形而上学也带有自己的特点，不是一般地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不是否认矛盾双方有主次之分，而是否认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转化，把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凝固化，以便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辩护。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在毛泽东看来，转化的理论是辩证法革命性的集中表现。建国以后，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矛盾转化的理论，反复说明生与死、战争与和平、好事与坏事、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这些相反的东西之间有同一性，可以相互转化。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讲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时很少讲条件，因此，划不清辩证法与相对主义、诡辩论的界限。这种辩证法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毛泽东总结了认识史上的这一教训，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同一性是具体的现实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的同一性，对立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缺乏一定的条件，对立双方既不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不能转化。这就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与相对主义、诡辩论划清了界限。

总之，纵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对矛盾转化理论的阐发和运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辩证法思想的这种特点，既是对我国传统的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以否认对立面转化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原载《光明日报》

1983年12月19日

注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页。 司马迁：《史记·大史公自序》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587页。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同上书，第474页。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孔夫子

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可称为中国现代的“圣人”。孔夫子，毛泽东，一古一今，他们之间有何联系，国内外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毛泽东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本人好读古书，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有着渊博的知识，“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古人的话借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在他引用的古人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占多数。有的论者据此便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而非主要来之于马克思主义。也有论者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批孔运动，称“孔学名高实批糠”。据此，有的论者便认为：毛泽东对孔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全盘否定态度可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造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

以上是两种极端相反的看法。毛泽东对孔子抱什么态度，孔子对毛泽东有何影响。这确实是毛泽东研究和孔子研究中的一个课题。我以为，毛泽东与孔子的关系甚为复杂，在毛泽东一生的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不宜一概而论，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本文将从不同的时期来考察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与评价，为正确认识孔夫子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点资料和线索。

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夫子

毛泽东少年时代受的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教育，八岁入家乡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共六年，1911年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求学，大大开阔了视野，读赫肯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等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由封建主义者转变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关于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相信孔夫子的情况迄今无发现留下什么资料，只好阙如。

毛泽东在转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对孔子取何种态度，是继续相信孔夫子呢，还是和同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抛弃了孔夫子呢？从留下来的大量早期文稿看，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夫子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很崇拜陈独秀，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有明显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孟子》、《史记》等古代文献中的典故、成语。他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在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师生还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

以上言行足以说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的崇敬态度。这与当时开展的猛烈的批孔运动形成鲜明对照。

受时代潮流的推动，毛泽东如饥似渴学习西方新思想，尖锐批判中国旧

思想、旧道德，希望以新思想、新道德来洗净国民头脑中的旧思想、旧道德。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继续推崇国学。他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认为：就学问来讲，“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殫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16年2月21日，他为学友萧子升开了一个国学书目，其中“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他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青年毛泽东身体力行，经、史、子、集，无不勤奋苦读。

青年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的影响。

在宇宙观上，青年毛泽东更多地是倾向于中国传统的心学。他认为宇宙之本原是宇宙之真理，而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毛泽东的唯我论的社会作用与传统的心学不同，它强调个性解放，实现自我，具有反封建、反教条的革命意义。

孔子主张智、仁、勇。《礼记·中庸》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毛泽东将智、仁、勇三者并举，改造为德、智、体三育并重。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颇受孔子的启发。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博学于文”，孟子所说的“博学而详说”，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在生活上，青年毛泽东也有受孔子影响的地方。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毛泽东所记的《讲堂录》中可看出，他的老师以此来教导自己的学生。受此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在生活上，他主张节俭，反对奢侈。他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在长沙求学时代，毛泽东受孔子及儒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早期文稿看，在形式上，国学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但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实质讲，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孔子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要“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毛泽东身上无一点“温文尔雅”的儒者气像。所以，我认为，中学虽然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不起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状况与他的恩师杨昌济有密切的关联。杨昌济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德国近十年。他主张“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服膺孔子，认为孔子之道乃“国民自古传来之精神的财产，固不可不珍重而保守之”。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在讲修身课时编了一本《语论类钞》作讲义。他提倡以资产阶级的新眼光去研究国学。从形式上看，杨昌济的中学气息很浓，但其思想实质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老师的这种思想状况直接影响到敬重他的学生。

青年毛泽东对孔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到北京后。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直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里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新学说。从长沙到北京，使他又一次开拓了视野，“思想越来越激进”。1919年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1919年7月，他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被否定，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一文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总之，毛泽东从主办《湘江评论》起，我们在他的文稿中已很难见到再有恭维孔子的话了，也很难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心中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1920年春，在第二次由北京取道上海回长沙的途中，他虽然一文不名，但还是下了火车，到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和坟莹，凭吊古代伟人。

二、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夫子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一年。这时，他虽然致力于新思潮的比较研究，但在思想原则上他依然十分明确：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1920年3月，他在一信中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他是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对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194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11)。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否就全盘否定孔子了呢？不是的，请看事实：

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有的干部“才力小干不了”时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1936年12月28日，他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引用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要求蒋介石兑现在西安事变时答应的诺言。

1937年10月19日，他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显然是在肯定的意义上称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毛泽东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更是从正面讲到孔子。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人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个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他在抗大讲话中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要我们作共产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孔子作教书先生是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当然，在教育上，毛泽东也有批评孔子的地方。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孔子虽然是圣人，便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人家问孔先生耕地种菜怎么做？他说不知道，去问耕田的人，去问种菜的人。”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他又说了相类似的话。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肯定。在此次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同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国的历史实际、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从肯定意义上引用孔子话的地方甚多。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孔子的全面评论集中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在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下，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写了有关墨子、老子、孔子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很重视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写了两封信。毛泽东肯定陈文“大体上是好的”，对不足之处提出了修改意见，主要有：

(一) 孔子的“正名”理论，“作为哲学的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

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二)在封建社会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

(三)“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没有发展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欢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据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这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在此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道德论进行多次批判。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判了抽象的“人类之爱”。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信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阶级之间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他还在一些文章中批评了“仁政”。

(五)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但也“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的说明。”

(六)孔子在普及教育上有功绩。(12)

陈伯达在文章最后总结性地写道：“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在精神上最完满发展的正宗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唯心论哲学的开山大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是不能掩盖的。”毛泽东是赞同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是有原则的、有分寸的。关于“中庸”，艾思奇原认为是折衷主义的，但在1939年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这很可能是知道了毛泽东致张闻天信后引起的），认为“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稳定性。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提纲》时两次指出艾的错误。他批写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种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毛的这些批语对中庸思想评析得更为透彻。

据《孔子评传》作者匡亚明讲：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两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

扬。(13)

孔子讲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辗转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他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李敏、李讷，以寄托自己的心愿。毛泽东为女儿的这种取名不也正是表明他对孔子一种态度吗？

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夫子

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不适用于革命而适用于治国。因此，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批孔，而在夺取政权后，则同历史上的当权者们一样崇孔。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1966年“文化革命”前，毛泽东虽然更多他讲到孔子，但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毛泽东在政治上、道德论上对孔子继续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1959年8月1日，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只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他继续认为，孔子的哲学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1957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一讲哲学少不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他要求大家不仅要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东西，需要读一读。”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多地是从肯定方面讲到孔子。

1956年6月，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直接填入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

1956年8月24日，他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7年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谈话中谈到许多新生事物在开始时往往受打击，被视为毒草，他先举了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然后说到孔子。他说：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认的，孔夫子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他的道理没人听。

1958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多次谈到孔子。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到破除迷信时说：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那很危险。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他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孔子二十三岁开始。往下讲到耶稣、释迦牟尼，讲到马克思、孙中山等人。

1958年11月21日，他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以后不大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元朝时便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孔夫子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校，他是宣传了封建道德的，那时人人都说他是个圣人，他是中国第

一个教育家。

总的看来，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在建国后，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道德论上继续批评孔子，但更多地是讲他的优点，承认他是有学问的，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夫子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端，他对孔子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始的。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是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此后，虽然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未成气候。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广东的杨荣国是反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学孔夫子的，你的那个书（按：指《中国通史简编》）上还有孔夫子的像，冯友兰也是学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些偏向，不学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劲。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紧接着，他又说：人家说老子是唯物论，我不赞成。毛泽东讲这些话并非要批孔，更非批郭沫若、范文澜。他是在讲文化革命要注意政策，对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教授要给以出路时顺便谈到的。在此以前，毛泽东认为孔于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家，而在这次讲话中则认为是代表奴隶主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变化。从毛的讲话中可看出：他很了解学术界在孔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就飞机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毛泽东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

据江青在批孔时的一次讲话说：1973年5月，她去看毛泽东，见毛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还给她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老二。”8月3日，毛泽东又读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批示“杨文颇好”。8月5日，毛泽东叫江青去。毛同江讲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还让江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批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64年时还认为孔子在教育上有可取之处，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那么在批孔时他又是怎么看的呢？在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写

了《论孔丘》一书。冯友兰在书中对孔夫子的政治、哲学、道德、文艺、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否定，并对自己过去的尊孔进行了自我批判。批孔运动中还出版了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该书从孔子的一生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的一生”这一点出发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和治学态度）作了全盘否定。该书把“孔子首创私学是孔子的一大历史功绩”、“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等评价视为“尊孔派”的谬论，大加批驳。读者可以看出：二冯所批驳的“尊孔派”在孔子教育思想上的“谬论”，有的正是毛泽东讲过的。毛泽东本人对二冯的书怎么看？他肯定这两本书，并作了推荐。他在1975年底或1976年初曾说：“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子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此时的毛泽东完全忘记了几十年来他自己在评论孔子教育功绩上说了些什么。

毛泽东批孔，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把孔子看成是保守、倒退、复辟的代名词，试图通过批孔批判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所谓“右倾”、“保守”、“倒退”、“复辟”思潮，提倡革新、进步的思想，以坚持“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革命”成果。作为政治运动的批孔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危险不是什么“右派”、“保守”，而是极“左”思潮的泛滥。

批孔，当然也有学术问题，即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孔子。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不赞成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毛泽东的见解只是一家之言，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受“左”的政治错误的支配，毛泽东以激烈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对历史人物客观的、具体的科学分析，得出了“孔学名高实批糠”的结论。这一结论一笔抹杀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种全盘否定的评价同他以往一贯的看法大相径庭，也违背了他提倡的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抽象他讲，这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着今天社会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精神的作用等。他只看到孔子对今天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今天也还有积极的一面，这也是一种片面性。

五、几点结论

毛泽东一生中论及孔子的地方很多，笔者所见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篇幅有限，笔者不可能将所见的论述一一罗列出来。从前面所论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毛泽东早年受封建教育，读四书五经，很相信孔夫子。在长沙求学时，虽然明确了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方向，但仍很推崇孔子，受孔子及儒家多方面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对中国旧学的深厚功底为日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极有利的条件。

（二）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代表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是为维护现存制度服务的。他坚决反对“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

（三）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人。孔子创立新的学派，是有学问的，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伟大的功绩。

(四)毛泽东尤其重视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称孔子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首创办私学。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与借鉴。他也批评孔子不注意生产，不注意经济的缺点。

(五)毛泽东认为，孔子的哲学从总体上讲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应给以批判，但其中包含有片面真理，有辩证法的因素。

(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子的态度。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以辩证的历史的科学态度对待孔子。他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哲学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善于改造、吸取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毛泽东对孔子思想及其他中国古代思想的吸取并没有影响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那种以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封建化”、“儒家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攻击。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评价、批判、改造与吸取，为我们正确地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原载《新东方》

1992年第2期

注释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毛泽东：《致湘生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同上书，第24页。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同上书，第37页。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同上书，第88、89页。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同上书，第59页。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同上书，第21页。

毛泽东：《〈一切人〉序》，同上书，第82、83页。

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同上书，第368页。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同上书，第474页。

(11)毛泽东：《致范文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12)毛泽东：《致张闻天》，同上书，第144—150页。

(13)见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4页。

孔夫子与毛泽东：古今伟大“教员”

孔子一生主要是办学教书。他从三十岁左右起收徒讲学，以礼、乐、射、御、书、数教授弟子。在教学过程中，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整理古代文献以充作教材之用。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又二，开创了儒家学派。冯友兰在 30 年代著的《中国哲学史》中称：“孔子是一教育家”，“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冯友兰的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今天人们对孔子的评价虽褒贬不一，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承认他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教育家。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有志于教育，自称“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1921 年 1 月，他又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他当过很短时间的教员，社会推动他走向政治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他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了人民的领袖，军队的统帅，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博古通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精深的造诣。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始终关注教育：民众教育、干部教育、军队教育、大中小学校教育。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他讨厌“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以终身当教员自慰。

毛泽东曾在 1938 年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那么，作为中国当代的伟大教员毛泽东本人从中国古代的伟大教员孔夫子那里承继了些什么珍贵遗产呢？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笔者虽不是研究教育学和中国教育史的，也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但愿在此将这方面的一得之见写出，以受教于毛泽东和孔子的研究者。

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毛泽东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肯定、吸取和改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肯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

毛泽东早年受了六年传统的文化教育，相信孔夫子。之后进了新式学校，受七年新式教育。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时期，青年毛泽东虽然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却与陈大相径庭。从存留下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 1919 年 7 月以前，他没有非孔言论，孔子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是圣人。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利弊，两者应取长补短，互相融合，他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一面又继续推崇国学，诵习经、史、子、集。1917 年 11 月 9 日，他主持的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在开学仪式上，师生还向“孔圣行三鞠躬”。

1918 年 8 月，他第一次到北京，扩大了眼界，思想大变。第二年 4 月回到长沙，7 月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他撰写四则时评，揭露康有为人等尊孔行径。这是他首次发表非孔言论。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认为孔子在政治上、道德上是守旧的，批判反动派鼓吹的尊孔读经。他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一分为二，认为从总体上讲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但含有片面真理，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更偏重于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绩。1938 年 5 月 21 日，针对部分教员不安于心于教育工作这一情况，他在抗大讲话时，以黑格尔、孔夫子为例，勉励大家要

有当一辈子教员的思想准备。他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先生，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黑格尔、孔夫子。他又说：孔夫子是个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在我们三四百人中，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几个黑格尔呢？同年7月9日，他在抗大讲话时又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要我们作共产党了。”毛泽东认为：孔子作教书先生是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建国以后，他虽然在政治上继续批评孔子，但也仍肯定他在教育方面的功绩。1956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1964年2月13日，他在春节谈话中肯定孔子教育思想中有好的一面，提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同年9月4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

毛泽东把孔子定位为中国第一个教育家，孔子的主要贡献是在教育方面，这对吗？笔者认为是对的，准确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孔子在世时以收徒讲学、创立儒家学派而被时人称为圣人。孔子在政治上是失意的，不得志的，而在教育上是成功的。孔子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主要也在教育方面。司马迁在写完孔子世家后评论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据近人研究，《论语》全书所搜集资料共509条，其中有关教育的言行371条，内有孔子的教育言行332条。因此，可以说，《论语》基本上是孔子及其门人的教育和教学的实录。

二、肯定孔子教育思想有人民性

中国古代教育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末期已有学校的萌芽。“米廩有虞氏（舜）之庠也。”到了奴隶社会已有学校。“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商、周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在官府”，只有极少数奴隶主贵族的子弟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到了孔子时代，奴隶制已崩坏，文化下移，出现了私学，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孔子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1）。他又讲：“自行束（12）以上，吾未尝无诲焉”（13）。据近人考证，他收的弟子中真正出身于贵族的并不多，大部分来之于平民，还有不少人是贫贱人家的子弟。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家境贫困，“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14）。另一位有名的弟子子路是“卞之野人”（15）。孔子这种不分贵贱、贫富、种族、地域广招学生的做法，打破了只有少数奴隶主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局面，这是教育史上的一大革命。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文化的下移，具有人民性。“有教无类”的原则，为后世所称道，对中国教育影响颇大。

毛泽东肯定孔子的“有教无类”有人民性。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教育战线也掀起了革命，当时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陆文强调教育从剥削阶级手中工具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批评了“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的观点。8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陆文初稿时增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5)

8月22日，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信中又特别指出：“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毛的这些话纠正了陆文的偏颇，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国教育史，而且对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都有重要意义，对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国文化遗产都富有启迪。1958年8月，正是“左”倾思想泛滥的时候。毛泽东在这时写出如此大段的纠偏文字，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他对孔子及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有透辟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

三、吸取孔子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

孔子办学是以培养实现德治、仁政的人为目标的。他把德育放在首位。但作为一个理想的人，仅有德还不行，还要有智与勇。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6)《礼记·中庸》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给学生开的课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书、数四门，属文教，培养学生的德与智；射、御两门属体育，培养学生有顽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魄。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将智、仁、勇三者改造为德、智、体三育。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17)针对当时学校轻视体育这一点，他在1917年写了《体育之研究》(刊《新青年》)，专门论述体育之重要，说明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他指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知识、道德诚可贵，然而不管多么高的德与智，一旦身体不存，也将随之而隳矣！他称引孔子以说明养生健体的重要。“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饫而饬，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毛泽东又指出：“体育者养生之道也”，要有强健的身体，无过于体育锻炼；体育东西方各不相同，孔子教学中的射御就属于体育(“仲尼取资于射御”)。他批评当时的学校，“课程密如牛毛”，使学生不堪重负。他主张：“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18)当然，青年毛泽东注重体育，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除了源于孔子之外，更直接的是源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源于他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是教育家，主张德、智、体并重，反对学生负担过重，强调“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19)。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贯串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1957年，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0)他多次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注意学生的身体，各类学校应“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64年2月13日，他在春节座谈会上在肯定教育路线正确的前提下，尖锐地批评了教育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他提出：学

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教学内容要少而精。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颜回、曾子等贤人。他批评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提醒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

四、继承和发扬孔子宝贵的教学经验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处理师生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所说的“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自然不限于课程设置少、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一点，而且还包括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

孔子在理论上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者，然而他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好古敏以求之者”（21）。孔子出身贫贱，给人办丧事，当吹鼓手，相礼。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看管牛羊畜牧的小吏）。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2）孔子的学问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对孔子的这种经历，毛泽东多次谈到。1938年8月5日，他对抗大毕业生说：毕业后，既要当学生，又要当教员。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碰到一个人就可以从他那里学得一些东西，也可以教他一些东西。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从他的老师项案那里学来的，是他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的。毛泽东以孔子等中外名人勉励在职干部好好学习。

1958年，毛泽东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多次讲到孔子。5月8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他学了很多本领。1964年2月13日，他在春节座谈会上又说过类似的话，借以说明，许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从社会生活中学来的。

孔子善于向他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3）这表明，孔子不仅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长处，而且善于从他人的不足、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他谦虚，总认为自己知识不足。他勤学好问，“子入太庙，每事问。”（24）毛泽东很赞赏孔子的“每事问”的学习精神。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讲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25）毛泽东赋予了“每事问”新的含义，将它同向群众学习、调查研究、做好领导工作联系起来的。

在学习上，孔子主张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6）他又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7）毛泽东继承并发扬了这种老实的科学态度，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上教育干部：“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他进而解释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

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28)1949年，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又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29)

孔子在自己的学习上，“学而不厌”；在教人时，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30)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31)“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了中国教学的格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学习问题时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32)中国共产党人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启发式。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3)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多闻阙疑，触类旁通。毛泽东在自己教学实践中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1929年，他在谈到红军教育训练时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其中第一条为“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最后一条为“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他本人讲课、作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令人回味，富于启迪。1938年8月5日，他在抗大的讲话中批评了注入式，说：不要用注入式的教学方法灌学生，而要用下毛毛雨的方法去教育学生。建国以后，他更是多次批评注入式，要求实行启发式。1964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印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再答疑。毛泽东主张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让学生主动地自由地生动活泼地学习，反对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书本里。

在教学中，孔子能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论语》中保存有这方面的相当数量的资料。如孔子在答复别人“问仁”、“问孝”、“问政”时，常常针对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的回答。《论语·为政》记载四个人“问孝”，孔子的回答因人各不相同。这就是后人概括的所谓“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这一方法，影响深远。毛泽东在教育上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规定不同的教育目的、要求、内容和方法，反对“八股式”的、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方法。

正确处理师生关系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论语》中保存有孔子与弟子之间尊师爱生的生动记载。孔子在教学上海人不倦，对弟子一视同仁。他严格要求弟子，批评起来不留情面。在生活上，他体贴关怀弟子。弟子有病，亲自看望。他对弟子坦诚相见。弟子敬爱孔子，也可直言批评自己的老师。师生之间互相切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感情甚笃。这种师生关系，为后世楷模，尤在古代书院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对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这种感情甚笃的师生关系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很向往的。在学生时，他就对学校制度一直很不满，他认为：“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34)1920年6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下这样愤激之语：“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35)他认为新式的学校与中国古代的书院各有利弊。学校的坏

处是：第一，师生间没有感情，施教授教是一种商行行为；第二，以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找贼人性；第三，钟点过多，课程过繁。中国古代书院，则没有这些坏处，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力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也指出，就研究内容来说，学校优于书院。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36）。“自修大学”强调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从毛泽东对学校与书院利弊的对比中，从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对孔子及中国古代教育的吸取与改造。

如前所提到的，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中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同年3月，他在一个材料的批示中又写道：“现在学校课程大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读者若仔细地想一想，不难发现，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同他青年时代对学校的批评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对孔子教育思想并非全盘肯定，也有否定的一面。这主要有两点：一是多次批评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强调我们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二是指出孔子所教的那一套早已不适合今天的需要，批判反动派把孔子的那一套当作宗教教条强迫人民接受，强调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内容。

毛泽东除了继承和改造孔子教育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外，有没有受孔子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消极影响的一面呢？这是一个尚待研讨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有，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教学内容上是“重人伦、轻物理”。孔子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均是以“明人伦”（《孟子·滕文公上》）为内容和宗旨的。孔子虽设六艺，但教学内容仍以“文、行、忠、信”为主，以“明人伦”为宗。孔子“重人伦、轻物理”的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思想到了近现代，则有碍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革命的时期，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必要的。遗憾的是，在建国以后，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期，他未能摆脱“重人伦、轻物理”传统思想的束缚，依然过分偏重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教育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巨大作用。他所发表的大量教育言论，基本上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较少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角度讲。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这种偏颇，从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角度讲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重视教育。

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影响既深且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精神导师。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吸取与继承自然不限于教育方面。毛泽东与孔夫子之间的联系是多层次的，既有文字上的显性关联，又有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习惯传统上的隐性承袭。作为现代中国精神导师毛泽东与作为古代中国精神导师孔夫子之间的多层次的、复杂的关系是一个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原载《孔子研究》

1993年第4期

注释

(17)(35)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9年9月1日）、（1916年12月9日）、（1920年6月7日），《毛泽东早用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毛泽东：《夜学日志首卷》，《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礼记·明堂位》。

《孟子·滕文公上》。

《左传·昭公十七年》。(11)《论语·卫灵公》。

(12)(21)(23)(30)(31)(33)《论语·述而》。

(13)《论语·雍也》。

(1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16)《论语·宪问》。

(18)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19)《杨昌济文集》，湖南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2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

(22)《论语·子罕》。

(24)《论语·八佾》。

(25)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26)《论语·为政》。

(27)《论语·公冶长》。

(2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9)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

(3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535页。

(34)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

(36)详见《湖南自修大学创刊宣言》，《新时代》第1卷第1号（1923年4月）。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来源之一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精通中国旧学的学者。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造诣。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这些已是我国学界的共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上，研究者们则有不同见解。有的人主张，毛泽东思想只有一个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有的人则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有两个，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请看事实：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说：对国民党，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建国以后，周恩来将这三条应用于外事活动并有所发挥。1963年4月24日，他在同来访的外宾谈话中阐述了我国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他说：“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三）中国有句话，‘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退避三舍’。”他在逐条解释后又说：“我们中国人办外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周恩来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很有启发。

毛泽东思想中直接源于我国民族传统的远不止以上四条，还有别的，而且有的还很重要，比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各个部分，是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许多文章、著作在阐释这一思想时都极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找其理论源头。当然，毛泽东这一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相一致的。然而笔者以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并非直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从自强不息”；“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绵延不绝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1935年12月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的气概、决心、能力正是在尔后逐渐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根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非闭关锁国，拒绝外援，而是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援。国外某些自认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一度歪曲、攻击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诬蔑它是“反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攻击从另一方面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确实非源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邓小平

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1989年9月4日，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的最后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一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一脉相承，且都源于我们的民族传统，都深信于我们的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倘若我们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是一切听命于他人，盲目照抄外国的经验，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倘若不继续坚持这一方针，顶住外来的各种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路，那就不会有今天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

同任何事物具有两重性一样，中华民族传统也有两重性，既有有利于社会稳定、进步、发展的优良传统，也有有碍于社会稳定、进步、发展的不良传统。因此，对民族传统应取分析的态度，继承、发扬其优良传统，批判、剔除其不良传统。民族传统是发展的，即使对优良的民族传统也不能固守不变，而是必须加进时代的新内容，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诠释。毛泽东思想中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那些部分已非原来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现代的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蕴藏着无数的珍品瑰宝。在认真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还必须认真研究历史，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批判和剔除其有碍现今社会进步的糟粕。

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4年第2期

注释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周恩来：《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0—431页。

《周易·乾卦》。

《周易·大畜卦》。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邓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同上书，第323页。

关于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意见的浅析

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一直是毛泽东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37年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指出，现在中国许多辩证法的书，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大好，使人望而生畏。他自谦他说，自己的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他有一个志愿，希望自己将来有可能写出本好书，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其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写出了许多充满哲学色彩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杰出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不可能像专门的哲学家那样去著述教科书式的专著，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不过，他一直在思考着哲学体系的改造。他在1965年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明确提出：希望搞哲学的人，深入实际，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在当前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中，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有关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不是绝无裨益的。

一、哲学体系要反映时代的需要和民族的特点

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时代、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历史阶段。哲学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这是毛泽东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

60年代初，他在谈到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时候说，资产阶级哲学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他举例说，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18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还进一步指出，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和俄国的。他又说，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国来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谈的是哲学为政治服务的一般道理，但它对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是下无启发的。它启示我们：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并不是要否定或改变它的基本原理，而是为了让它汲取当代最新的认识成果，更能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二，哲学体系不仅要反映时代的需要，而且还要反映自己民族的特点。

上述道理，好像是哲学工作者们都懂得的。可是，在探讨哲学体系改造的时候，不少同志却往往忽视这个平凡的真理。

如，前几年，不少文章在论述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造的必要性时，主要是指出现行的哲学体系存在着层次不清（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门类不全（缺少自然辩证法和辩证逻辑）、掺进了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结构不严密等等缺陷，而很少有文章指出，现行哲学体系的根本缺陷是内容陈旧，没有反映

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是由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演变而来的，虽然其中增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 30 年代体系的框架。它仍然按辩证唯物主义（其中又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讲。从某些局部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辩证法范畴。现在许多教科书，只是沿袭苏联 30 年代教科书所讲的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几对，而没有增加新的。全体与部分，这本来是一对很古老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这对范畴作了杰出的运用。这对范畴也是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因囿于 30 年代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一直将它排除在外。

再如，现在许多讨论哲学体系的文章主要是在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究竟有哪些部分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层次结构。有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由辩证唯物主义总论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等分论组成。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此相反，有的文章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的文章继续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组成，如此等等。许多文章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怎么讲，列宁怎么讲，毛泽东怎么讲。有的文章试图按照恩格斯的哲学体系或列宁的哲学体系来构造新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在探讨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当然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请教，弄清他们对哲学体系的见解，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停留于此是非常不够的。现在许多文章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探讨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哪些新成果，以及哲学如何去总结概括这些新成果上，没有注意现在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哪些新的需要和挑战。这不能不说是前一段哲学体系讨论的一个不足之处。

现在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哪些新成果、新需要，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这是需要大家共同探讨的，我对此无多大研究。不过，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建设新社会的丰富经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引以自豪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等等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也毋庸讳言，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出现过巨大的挫折和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不如有些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挫折和失误有极为复杂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从理论上讲，这与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有关。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尊重自己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优点。没有这种优点，革命不可能胜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地发挥这个长处，致使这种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缺点。马列本本上没有讲的，革命领袖没有讲的，甚至上级机关没有讲的，一般的人不能讲，也不去想。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束缚着人们去探索社会和自然的奥秘，妨碍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人们以智慧，使人聪明。可是最近几十年新发展起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未来学等新学科，大多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搞起来的。我们的哲学固然应对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对失误和挫折，也应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失误和挫折，这种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与我们长期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关系，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值得严肃地加以思考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肃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决不会丧失它原有的客观真理，失掉的只是套在它身上的教条主义锁链，使它更加朝气蓬勃的发展。

二是，我们正处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的巨大变化，更加明显地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社会美好的前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扩大和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如，以前我们讲认识论，历来不讲认识工具。但是，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类将愈来愈把“机械思维”交给“电脑”去执行，使人脑从繁重的“机械思维”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从事辩证的创造性思维。现实问题愈来愈复杂，有些大系统包含有上千个、上万个变量和约束条件，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单靠人脑是很难解决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作为人脑延伸的“电脑”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认识工具，将引起认识方式上的巨大变革。又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我们永远必须坚持的。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和日益复杂，信息量的急剧增加，仅仅依靠原有的经验型决策方式来领导现代化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利用信息技术，建立起一个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的国情、国势的科学决策系统，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进行模拟实验和预测。这就有一个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问题。再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的发展，大大加深和扩大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像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信息与反馈等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的范畴，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阐述。

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是不行的。社会生活发生的急剧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使得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正是哲学体系改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哲学体系不仅要反映时代的需要，努力做到现代化，而且还要反映本民族、本国家的特点，努力做到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一定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生命力。今天，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所面临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各国的哲学、文化传统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各个不同国家所要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如果有人企图将自己的体系奉为绝对权威，视为正宗，别人都得照抄照搬，否则就是异端邪说，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上，缺乏自己的独创性。毛泽东对此是不满的。他批评我国

不少哲学工作者搞的是“洋哲学”，希望能写出适应我国需要的新著来。我们在探讨哲学体系改造时，一方面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夜郎自大，闭目塞听；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别人的体系，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需要从很多方面努力。我认为以下三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要反映当代中国实际需要。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大的政治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哲学是为这一总目标服务的。为此，应当加强对四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原理的研究和阐述。

第二，要充分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包括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进一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出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训异常深刻。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哲学思想中存在的缺陷。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改造现行哲学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

第三，汲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但实际上，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对欧洲哲学史的总结。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哲学遗产加以科学总结，把它的珍品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去。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特别注重哲学体系内容的改造，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体系形式的改造不重要。现行的哲学体系结构不合理，逻辑不严密。根据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同一的原理，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由抽象到具体等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的内容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无疑是改造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将哲学体系内容的充实、革新和形式方面的改造结合起来，使改造后的哲学体系既有丰富的新内容，又有合理的新形式。

总之，“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去追求建立一个绝对完满无缺的、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民族的哲学体系，而只能希求建立一个适合当代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衡量我们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的价值，不在于看它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体系完全相同（时代不同了，即使把他们的体系搬到今天也是不行的），而在看它是否满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造时，应着力去研究当前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需要，去总结社会实践和人类认识的新经验、新成果，去汲取中国哲学史的珍品，将哲学体系的改造同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化统一起来，把它们看作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

二、哲学就是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这是当前哲学体系改造讨论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哲学体系上的种种分歧，都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有关。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著名论断。

他在抗大讲授哲学时，专门探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

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他又说：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不必要三个词”。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这些思想，反复地阐述了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那时译为论理学）是一个东西。他用通俗易懂的言语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建国以后，他重申了上述思想。在1958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当他谈到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时说，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呢？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在1963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又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一年以后，即1964年8月，他在同周培源和于光远的谈话中明确他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

毛泽东对“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没有加以展开说明，但从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这一论断是他过去一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即兴而发的言论。第二，这一论断的理论根据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第三，这一论断不仅是指哲学具有认识论的功能，而且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认识论。

目前，我国哲学界对“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论断是科学的，是一种灼见。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论断是不科学的，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我赞同前一种意见，不过对“哲学就是认识论”应加以正确的理解。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在马列著作中缺乏根据。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古代，哲学被看成是各种知识的总汇。哲学家们重点探讨的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即所谓本体论问题。到了近代，各门具体科学先后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认识论的研究。但是当时有的哲学家仍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黑格尔就建立了一个包括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的体系。不过他天才地猜测到存在规律、认识规律和思维规律是同一的，将本体论（即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当作同一个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之科学”的终结，在哲学对象上发生了变革。恩格斯多次指出：“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形式逻辑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了。因此，哲学最后只剩下辩证法。很明显，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就是大写字母的逻辑学，他在同一著作中又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的上述关于哲学对

象的论述似乎有矛盾。前者是把思维及其规律做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把自然、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关于外部世界运动的规律和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认为，在恩格斯那里，说哲学就是辩证法，与说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

被恩格斯称之为“不依靠我们，甚至也不依靠黑格尔”独立地发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对哲学对象作了历史的考察。他指出：随着各门自然科学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最后“哲学选择了认识本身、认识的方法作为它的对象，它想认识怎样做到借理智之光来认识其它对象”。他认为，哲学并不想知道一切，而只是“以理智为专门的对象，即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为对象。他又说：“作为哲学的专门对象的认识，只是、也只能是推广的逻辑学。”他明确地指出：把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新的更高级的逻辑，称为认识论，称为辩证法，“这只是字面上的争论”。可以说，狄慈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早明确他讲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人。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思想除了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之外，很可能还受到狄慈根的启发。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是与恩格斯、狄慈根、列宁的思想相一致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反映了哲学发展的总趋势。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取消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无法同现代西方哲学划清界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首先就是世界观。因为第一，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是科学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第二，认识规律、思维规律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来之于客观世界。这就是列宁说的：“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发展’中引申出来。”所以承认哲学就是认识论，丝毫不否认哲学就是世界观。若把认识论仅仅归结为研究认识的能力、认识的源泉、认识的过程以及真理等问题，而把认识对象，即客观世界及其发展一般规律，排斥在外，那它就不是科学的认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只能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有的同志之所以产生上面的误解，其原因在于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分开。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离开本体论的认识论，也没有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本体论也是认识论，认识论必然包含本体论。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会导致取消历史唯物主义，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领域中实行革命变革之所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泽东也一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历史唯物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出去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承认，恩格斯在谈到哲学的对象时并没有说明，他所说的辩证法是否包含历史唯物论。狄慈根、列宁和毛泽东在谈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一个东西时也没有说明它们是否包含历史唯物论。如何“处理”历史唯物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通常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分开，当做互相并列的两大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讲哲学就是认识论，是否就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

不仅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是同一的。试想，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怎么能讲清楚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怎么能讲清楚世界统一于物质等问题。更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要研究认识的对象及其规律，而且还必须研究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认识的主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同唯心主义不同，而且同旧唯物主义也不同。唯心主义把自我、绝对、神当做认识的主体。旧唯物主义把抽象的个人当做认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认识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是群众、阶级、政党，是社会。人类社会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它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的主体。要讲清楚认识论，必须研究认识主体，即人类社会。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在的哲学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绝然分为两大部分，在讲认识论时一般都下讲认识主体，不讲认识的社会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毛泽东把群众和民主引入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直接联系起来，这就为我们如何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的同志之所以产生上述担心，其原因在于这部分同志囿于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的传统观念。殊不知，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认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基本思想贯穿于认识论的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和广义的认识论是同一的。

还应指出，现在哲学教科书的历史唯物论部分的内容庞杂，掺进了一些不属于它的内容。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这种掺入在历史上有其理由，并起了积极的革命作用。因为那时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被独立地加以研究，写出自己的教科书。还因为那时无产阶级政党直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把这部分内容回归给科学社会主义。

有的同志还会说，哲学就是认识论，这就取消了辩证逻辑。广义的认识和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广义的认识包含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辩证逻辑。科学的认识论不仅要阐述正确的认识路线，说明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规律，还必须深入研究感性认识如何才能正确地上升为理性认识，思维如何才能正确地把握和表达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等问题。毛泽东讲认识论，着重阐述了前一方面的问题。这是他的优点。他对理论思维研究不多，则是明显的不足。1961年他问李达谈话时提出，要加强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并说他自己也想研究辩证逻辑，但苦于工作太忙。历史经验证明，轻视理论思维的作用，必然导致经验主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理论思维的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所以科学的认识论不能没有狭义的辩证逻辑。

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说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呢？这是因为：

第一，哲学就是认识论，更能反映哲学的本质和对象。哲学要研究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但哲学又不是直接以整个世界为其研究对象的。它是通过总结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通过总结人类的认识史来探求世界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的。毛泽东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唯其如此，哲学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哲学就是认识论，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功能。毛泽东所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正是指哲学具有认识论的功能。

第三，哲学就是认识论，概括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最高问题，而且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善于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都是围绕着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展开的。根据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应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强认识论教育。

毛泽东多次谈到过狭义认识论的内容，但对作为整个哲学的广义认识论的内容和结构则并未论及。根据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我们是否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设想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认识的客体，即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存在的最一般形式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第二部分是研究认识的主体，即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第三部分是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主体与客体如何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亦即研究主体和客体矛盾运动的规律。

这三部分之间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也不是互相并列的，而是一个比一个具体，一个比一个复杂，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二部分包含了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包含了第一、二部分的内容。整个哲学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而展开的，亦即是围绕着人类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愈来愈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展开的。这种结构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这种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统一的逻辑，是同哲学史的逻辑相一致的，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相一致的。至于每一部分应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则是需要根据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整个人类哲学史，共同加以探讨的，实非一、两个人所能办到的。

改造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一项任务，是新的时代、新的实践的需要。改造哲学体系，也是一个带国际性的理论问题。在国外，一些国家的理论工作者从60年代起就探讨这一问题，但至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其中包括从事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自然辩证法、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研究的同志）应同实际工作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结成联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经过共同的努力，建立一个既反映当代最新科学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使我们的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3期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44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90页。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同上书，第357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484页。

狄慈根：《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2、339、347页。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16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地位新见

中国学术界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 60 至 70 年代的很长时期里，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都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有的同志还对此进行了理论论证。从 70 年代末以来，除少数同志仍然主张“新阶段”观点外，大多数同志则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还构不成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中期的主要代表。以下拟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一、从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定时代的哲学总是一定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矛盾运动的产物。一定时代真正的哲学是该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因此，要正确地评价某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正确认识产生这一哲学的社会实践和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同中国革命在现代世界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的。

中国革命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最伟大的革命。从本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起至 40 年代末，中国成了东方革命的中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东方革命的中心，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是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的一块肥肉。所以帝国主义世界的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了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

说中国成了东方革命的中心，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自吹。早在 20 年代后期的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就说到这一点。当时的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在 1926 年 11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是“资本主义解体的第三个最大因素”，“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吸引东方殖民地日益觉醒的群众的伟大中心。”他指出：“共产国际必须十分重视中国革命问题。”日本共产党代表片山潜在这次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十月革命后，曾有一个时期，似乎整个欧洲都卷入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巨大冲突，似乎这个冲突会导致世界革命。但现在应当承认，欧洲处于一个稳定时期，同时“俄国工农的革命运动，已经转移到了东方”，“中国的运动已经成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范例。”他又说：“我们应该承认，中国革命必将成为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在以后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中继续高度评价中国革命，认为“伟大的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极其重要因素。”“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越来越大。”“中国工农的斗争是共产国际前沿阵地的斗争。中国革命依然是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相比，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要把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东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极大的创造性。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也必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既然中国革命是本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革命，是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末期东方革命的中心，那么，作为这个革命精神产

物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有客观根据的。

二、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革命实践不等于革命理论，一般的革命理论也不等于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能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中期的主要代表，还需看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他兼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优点。他喜爱哲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指挥革命战争，善于从哲学上来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以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至 50 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不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的，但也应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实践理论、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现略述如下：

（一）关于实践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引起认识论上的变革。可是，在《实践论》问世以前，还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系统地阐述科学的实践观，阐明认识的辩证过程，揭示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经常遇到的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中国革命的曲折过程，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比较充分地暴露了认识与实践的内在联系，暴露了认识过程的本质及规律。因此，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正确地阐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揭示认识运动的根本规律。《实践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实践论》的理论价值首先在于它提出了以认识与实践为基本矛盾的认识论体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他们并没有以认识与实践这一矛盾为中心来阐述认识过程，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著作一般都按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顺序讲认识论。这种讲法的优点是对具体的认识形式、思维方法讲得比较细，它的明显的弱点是不能清楚地揭示认识过程的本质及其根本规律。《实践论》则不同，它把认识与实践作为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牢牢抓住这一矛盾来揭示认识运动的根本规律。

《实践论》在具体内容上也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地方。如，它在全面地论述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更加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点，而经典作家更多地是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如，它完整地清晰地阐明了认识的全过程，将认识过程概括为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过程，并强调了后一飞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特点，同时也克服了一般哲学著作只讲第一个飞跃而不讲第二个飞跃的缺点。再又如，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它深刻地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论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此外，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关于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关于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

能动性思想等，都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关于矛盾学说

列宁曾指出，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哲学工作者为论说对立统一规律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在这方面，西洛可夫等人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具有更大的价值。但该书对对立统一学说丰富内容的安排比较零乱，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未能造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他们自己认为这是一本“不成功的、没有内在联系的教程”。所以，苏联30年代的哲学著作未能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它们只是为完成这一任务作了最初的尝试和准备。

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是世界所罕见的。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前提。可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致使在革命中碰壁。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将矛盾问题的研究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成果，将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实现了辩证法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的《矛盾论》不仅在体系上比同时代的人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在对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以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等方面的阐述上也大大越过了同时代的人。这方面的内容已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再详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政治战略策略的著作、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著作和有关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是十月革命后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列宁只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斯大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逝世前一年，即1952年，他才吞吞吐吐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作为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并加以探索的是毛泽东。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他指出：应坚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过它们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是非对抗的，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它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分析了经济建设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矛盾，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还是初步的，有不少

不完善之处，而且在以后，毛泽东本人又背离了它。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他为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从这一时期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情况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从本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逐渐滋长起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风气。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38 年，斯大林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起过重大作用。但这一著作并没有吸取苏联哲学界的新成果，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时期，这本著作却被推崇为“辩证唯物主义发展上底一个新阶段——最高阶段”，“是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最高峰。”这本著作出版后，苏联哲学工作者都按斯大林的体系讲，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积极成果。从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中期，苏联哲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进展，但总的看来，则是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在有些方面还严重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受教条主义的束缚，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情况也与苏联相类似。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起来抵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错误。所以，正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处于低潮的时期，而在中国却出现了高潮，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倘若我们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比，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相比，那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不是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而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中，很难有著作可以同毛泽东的上述四篇著作相媲美。至于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充满哲学色彩的论著，同样也是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重大的影响。在 50 年代，苏联哲学界曾高度评价《实践论》、《矛盾论》，把它们写进哲学教科书。这是许多同志都知道的，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再补充一点情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后，在日本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日本学者松村一人认为，毛泽东哲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国际意义”，它“对一切推动历史前进而奋斗的人来说”具有指导意义。英国的康福斯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吸取了“两论”的思想，其中直接引证《实践论》的有 12 处，引证《矛盾论》的有 9 处。书中称《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有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两论”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教材，认为“两论”“属于全面地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最优秀著作之列”，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有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指出：“两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

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来相提并论。” 这些评论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它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中期的主要代表，这样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至于 1957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处于低潮。所以，“1957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阶段”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1986 年第 6 期注释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146、147、158、159、319、320 页。

《过去五年间的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 1936 年第 1 期。

米丁：《斯大林对马列主义哲学底伟大贡献》，见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第 1 册，第 163 页。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载《思想》杂志 1952 年第 9、10、12 月号。

《略论毛泽东的国际意义》，载《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 1981 年 7—8 月号，见《共运资料选译》1982 年第 2 期。

霍勒布尼奇：《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载《弗·艾伯特基金会报》1962 年 9 月，转引自《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第 62 页。

国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情况简述

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在国外，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学习或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对于国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将看到的有限材料加以综合，作一简述。

据我们接触到的不完全的材料，我认为国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50 年代；第二阶段是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第三阶段是 80 年代初以来。

一、50 年代的研究情况

国外介绍毛泽东，可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早在 1927 年 5 月 27 日出版的《共产国际》俄文版及 6 月 25 日出版的英文版上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 1—7 部分。同年出版的《革命东方》俄文版第 2 期上也刊登了该考察报告。30 年代初共产国际的刊物就介绍过毛泽东的生平活动。1935 年 12 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 33—34 期合刊，在“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领袖”的总标题下，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民族英雄方志敏”为题目，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的生平。文中赞扬“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优秀品质。”有人统计，《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 10 多篇文章，其中包括《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论新阶段》。

把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向全世界作介绍的第一个人是斯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几处明确谈到这点：“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斯诺还说：“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

斯诺在同毛泽东会见后得出毛泽东是“认真研究哲学”、“对中国的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看法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也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斯诺的这本书自 1937 年 10 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至今为许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所引用。《亚洲研究》杂志 1982 年 11 月号上的一篇文章在谈到研究毛泽东的几种不同类型时，首先提到的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在斯诺之后，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对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作了许多报导，但总起来看，在那时还谈不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

国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是随着解放后重新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开始的。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对“两论”的介绍和评价进行的，以苏联为主要代表。当《实践论》还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苏

联抢先发表了，并配发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实践论》的评价比我们的评价还高。文章说：《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斗争中意义的原理”，“关于客观东西与主观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并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文章认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辩证性结合在一起。”

当时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实践论》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这篇著作中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神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列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

斯大林否认对立面之间有同一性，不同意《矛盾论》中有关同一性的观点。但苏联还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 1952 年第 9、10 期上刊登了《矛盾论》。在介绍“毛选”第 2 卷的文章中，对它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性。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的研究。”

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和康士但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对“两论”都作了极高的评价。前者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后者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

1958 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 5 处直接引了毛泽东的话。书中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该书第 8 章第 3 节“不同矛盾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吸取《矛盾论》的思想写成的。该书在讲“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末尾，引了《实践论》结束语：“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

此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两论”也作了很多研究工作（包括翻译、注释、介绍和评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松村一人。1952 年，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上连续三期发表《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以（矛盾论）为中心》，评述、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认为“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他认为毛泽东哲学“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且有中国民族形

式，而且具有国际的意义。”他的某些提法今天看来不一定恰当。但在 1952 年的日本，他公开发表上述见解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有重大意义的。松村一人研究了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征（他很可能是提出并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个人）。他认为：“哲学同本国革命理论相结合，哲学贯穿于以解放为目标的经常斗争之中，哲学同民族的智慧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哲学的第一个根本特征。”毛泽东哲学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理解”。他对《矛盾论》的基本理论作了较深刻的阐述。

西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开始进行研究。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一书的日本版序言中说：“由于中国革命及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增写了伟大的新的篇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 年，他出版了经过修订过的俄文版。在修订时，他吸取了“两论”的思想，直接引用《实践论》的有 12 处，引用《矛盾论》的有 9 处。其中说：《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完备的探讨”。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南斯拉夫的普·弗兰尼茨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他在 1961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指出：在《实践论》、《矛盾论》里，“卓越的辩证法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毛泽东当时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所谓教条主义者。他们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学院的出品，并且由于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书中介绍和引用了“两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实践论》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认识论不同”，他把实践理解为认识、历史和整个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书中还认为，毛泽东对“人民内部对立作了著名的分析”，“这些分析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分析要深远些”。普·弗兰尼茨基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专著。因此，弗兰尼茨基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写入马克思主义史的学者。

在 50 年代，国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很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则更少。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也与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关。正如施拉姆所说：“对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在 50 年代仅仅处于幼年时期，并且‘共产主义中国’被报刊认为是苏联产物，他不是有什么意思的产物”。

二、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的研究情况

60 年代初，由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六七十年代，一部分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对毛泽东思想十分推崇，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有的共产党把“两论”当作党内思想建设的基本教材。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者）机关报《先锋报》在 1966 年 6 月下旬发表的《改造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一文中说：“每一个共产党人联系生活和实践，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巨大发展。”“我们钻研了毛泽东所概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和科学，就能解决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为了锻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和作用，需要学习和反复地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1968 年，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在《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学习毛主席对辩证法的新贡献》一文中说：现在“在我们整个党内的各级干部

开始进行毛泽东的伟大理论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学习”。

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在《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命胜利的强大武器》的通栏标题下，刊登工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座谈纪要。这家报纸在按语中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引导日本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哲学著作的指导下，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党的活动和党的建设的飞跃发展。”还说：“《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认真执行群众路线，科学地调查社会情况，用一分为二这个革命观点，分析矛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60年代，日本曾出现过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会、讲习会。据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杂志《日本和中国》的报导：1961年夏在名古屋举办过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会，每期人数都增加。第1期63人；第2期71人；第3期84人；第四期201人。1967年9月日本大坂地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该院的院刊《学院新闻》经常刊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1977年该院成立10周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星星之火》的纪念册。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后，日本的一些地方还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研究会，定期组织学习、研究活动。

在日本，有的学者虽然认为“两论”是以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半期的苏联哲学的所谓“列宁阶段”里产生的、是以米丁为首的教程、辞典的著作为基础的，毛泽东只增加了自己若干解释和中国革命的实例。但他们承认“两论”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了日本，对战败后的日本有启蒙的意义。毛泽东思想在西欧也有重大影响。1973年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的《实践论》，法国学者米歇尔·卢瓦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介绍了《实践论》的写作背景、意义，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为反对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所写的，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它们和苏联人的著作相比，特别是同1938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比，“有其独到之处”。米歇尔·卢瓦还批评了某些人对“两论”的歪曲，指出有的人把“它从昨天为止还占有光荣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统统删去”。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在悼念毛主席逝世的声明中说：“毛泽东一直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在革命的德国共产党内成了教科书，这些著作是我们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性著作的一部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南针。”

挪威一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署名文章《我们愿意被称作‘毛主义者’》说：“毛泽东永远是我们的导师，他教导我们如何改造社会。我们记得《实践论》和《矛盾论》打开了我们对事物的新的认识。”

从60年代开始，欧美的资产阶级学者逐渐加强对中国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的人因研究毛泽东出了名，如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政治教授施拉姆。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关系上的新变化所引起的。美国著名的中国学教授费正清在1968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70年代的任务》的讲话中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问题，需要特殊对待”。他说：“中国太弱，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世界也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此，“我们一定要理智地面对我们的中国问题，把它当作一个要求重新思索的特殊问题。”在这篇演说的最后，费正清说：我们一定要把一句中国战略性的格言“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变得很时兴，同中国的和解，必须努力奋斗，必须获胜。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和东亚的专家们，必须在一个共同任务中联合起来，双方都要了解对方及其相互有利的作用，费正清的这些话最清楚地说明：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进程。基辛格曾说过：“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在毛泽东逝世时，美国《新闻周刊》在《最后一位巨人》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的一生，“使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评价比对当前任何其他世界领袖更符合事实”。正是由于中国和毛泽东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出现了一个研究毛泽东的热潮。日本和欧美的一些研究机关不惜重金搜集和出版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尚未公开正式发表的著作（这方面的著作在香港、台湾以及在苏联也都印行过）。70年代初，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1917—1949年）。1983年又发行了第2版，同时出版了5卷（毛泽东补卷）和1卷著作年表。施拉姆在1974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文集。1979年，西德编辑了解放以后的毛泽东著作，共7卷。六七十年代，欧美、日本出版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从50年代以来海外出版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英文著作近200种（其中50年代只占很少一部分）。

国外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政治态度不同，学术流派不同，他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态度、观点也是形形色色的。从我所见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虽然观点各异，甚至完全相反，但研究的重点却大体一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研究法，将毛泽东的言论和思想同马、恩、列、斯对比，同中国古代哲学相比，也有的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同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比较。有的研究者态度严肃，比较客观。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有启发。

下面简要地介绍有关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情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是纯属于中国的产物，因而不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并非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的一种。野村浩一甚至认为，《实践论》、《矛盾论》大体是中国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触媒。新岛淳良则不同意上述说法，他在《毛泽东哲学》（1976年版）第10章《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阴阳二元论》中批评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接受了‘阴阳二元论’的影响。但是，这影响是指唯物论接受了唯心论的影响或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影响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新岛淳良对中国的阴阳学说作了解释。他认为，中国的阴阳学说的“本质在于其机械论与预定调和论”，因此，“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是渗透着阴阳二元论，而是与之根本相对立的。”“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整体是毛泽东思想的反面教员，传统的阴阳二元论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辩证法的反面教员”。新岛淳良反对野村浩一等人抹煞毛泽东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区别，这无疑是对的。但他对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作了错误的解释，因此，他没有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内在的联系。

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11)一文中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毛泽东哲学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据有三：其一是根据语言分析学派的理论，语言结构上的差别导致了各哲学流派。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所以中国哲学自成一派。其二是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无本体论的观念，毛泽东也不讨论本体论，因而他的哲学属于中国传统哲学之内，其三是根据《毛泽东选集》所引用资料的统计，证明他读过的书中，中国古书最多，对于马列著作读得很少。因此，他认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之处，而从源流来说，则是属于中国传统哲学。

我国香港地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思愷写了一本《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1976年出版，有英译本)。这本书值得一读，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比较客观、公正。金思愷逐条批驳了霍勒布尼奇的观点。并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忽视辩证唯物论既为世界观，又为认识论、方法论的特点，强将之拆为本体论与认识论来研究；不理解它的整体性，强将之拆为一片片，寻章摘句地分别与中国古代某些哲学家联系起来。他用专门的一章(“民族形式”)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他认为“毛泽东哲学来源并不是来自传统哲学，而是学习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传统上丝毫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但是这种继承并不是囫圇吞枣的继承，而是经过改造、限制，使之适合与有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条件下的继承。”他说，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讲，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尽管表现在某些局部上可能是唯物的、辩证的，但从整体来说，都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都是着眼于‘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些传统思想的社会理论都是唯心史观为核心的”。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从排除传统思想的基础核心出发，使之适应马克思主义基础核心，即辩证唯物论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金思愷首先强调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说“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批判的资料尽管非常零散，经过整理，还是可以看出以上述方面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巩固他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内容的思想。”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在著作和讲话中对有关古代文化典籍资料的评价，以说明他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如：《矛盾论》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批判；《实践论》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批判；《青年运动方向》中对孔子不实行劳动，轻视劳动的批判；《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仁政”的批判；1964年哲学问题讲话中对“仁者爱人”的批判等等。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不适用于革命，而适用于治国，毛泽东在革命阶段反对儒家思想，夺得政权以后成为当权派，就要像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者那样崇孔。金思愷认为，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他看来，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历史上的传统思想一一批判，“而事实上他将自己的思想与这些传统思想在各个环节上划分清楚了，作了概括性的批判”。

金思愷认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主要是形式的继承，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语言，引用古代的“词汇与典故”，他引证了毛主席著作中引用的许多成语、格言、典故。

二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不过他说：“毛泽东所接过的三民主义，是排除了原来的哲学基础与社会思想核心，代入了辩证唯物论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三民主义，如果说它具有继承性，那末也是形式的继

承。”

三是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继承了这种“革命传统”，“将这种继承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与控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

四是革命的爱国主义。但“他们强调的爱国主义也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限制与改造，是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非传统的爱国主义。”

他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并非民族传统的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经过他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内容的理论，结合了中国实际而实践，因而具有民族形式。”

把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仅仅说成是形式方面的继承，这当然是片面的（其实，金思悄所讲的不少是内容方面的批判继承）。他也公开声明：本人是“基于科学立场，与毛泽东的基于革命立场迥然不同”。但从上面的十分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在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上，美国人弗赖伯格写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一文值得一读。文章指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直接来自他在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要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就应当在最能体现他亲自实践的地方去寻找，而这种实践与其说是一个职业家的实践，还不如更确切他说是一个军队司令官的实践”，这种见解，在资产阶级学者中是为数不多的。他认为从思想渊源上讲，“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以西方和中国的传统辩证法为基础的”。他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吸收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思想。从他的分析和论述表明，毛泽东是从内容上吸收了孙子的合理思想，他说：“毛泽东对‘相反相成’的分析运用贯穿于他对中国战争研究全过程”（12）。他的这种见解有合理之处。确实，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古代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为红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在60年代初，西方学者就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起因可追溯到40年代末。1948年，美国资产阶级教授费尔班克发表了《美国和中国》一书，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一个农民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运动”，毛泽东“遵循的是中国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13）。1951年，本杰明·许华茨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及毛的崛起》一书。提出了“毛主义”这个术语。许华茨认为：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含蓄的挑战”。毛主义的战略构成了“异端行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思想背离。（14）许华茨认为：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就离开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原则了。1952年康德拉·布朗特、本杰明·许华茨、约翰·费尔班克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纪实》，进一步发挥了上面的观点。威特福格尔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在1960年《中国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一文，他认为，提出“毛主义”这一术语是缺乏根据的，是一种传说，一种神话，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毛的理论并没有任何独创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就有有关农民问题的大量论述，第三国际主席布哈林也高度赞扬了毛的《考察报告》，称它是“一个杰出的描述”，毛的《考察报告》的一部分内容在1927年的《革命东方》（俄文）杂志和《共

产国际》杂志（英文）上发表过。威特福格尔说：毛也从未讲过自己是一个革新者，在理论上有独创性。许华茨在《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回答威特福格尔对他的批评。他指出：在威特福格尔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革命的学说和策略，是预制的应付一切环境的处方，它永远不会为新的偶然事件所变动，中国革命是由莫斯科根据斯大林的“行动密码”策划制造的。许华茨认为，新的“理论”是在权力斗争中和现成教条所无法提供应付环境的努力中形成的。毛泽东是“伟大理论的革新家”，毛主义有许多独到的创造，背离了“旧的教条”。这种争论虽然是无结果的，但对尔后的研究有重大影响。可以说，后来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一个问题而展开。

在西方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这种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来之于马克思主义。他们有的说：“中国只‘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内容没有了’”。他们自认为，这并不是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是为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

金思恺则是把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学习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学习自斯大林。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毛泽东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当然应包括斯大林思想中正确的东西。金思恺对斯大林哲学中错误的批判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如批评斯大林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分开；忽视内因，重视外因等。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对斯大林错误批评的言论，说明毛泽东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金思恺的看法也有参考价值。他写道：“概括的说是，将唯物的认识论，具体化为‘实践——理论——实践’这个公式，应用之于改造主观世界；落实之于社会，创造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用之于改造客观世界。澄清与突出对立统一规律为辩证法的唯一的基本规律，落实之于社会，创造统一战线革命方法；强调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使‘一分为二’的观点贯彻于任何社会。结合思想改造、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统一战线的革命方法，又归纳出他的革命政策的制定和推程序。”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具有系统性、逻辑性的思想”。他自认为他的上述概括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基本轮廓”。

前面提到的霍勒布尼奇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都作出了贡献，就辩证法讲，他认为有两点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而他关于矛盾的差别性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特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的辩证法来说都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的。”他还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们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导言》来相提并论”。他的这些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时，国外有些学者十分注意“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1978年，我从俄文的书刊中知道，苏联的有些人认为两论的许多原理是从他们30年代著作里“抄来”的。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抄的是哪些书。国内有的人也说是抄苏联的，后来又有个别人说是抄30年代中国人自己写的。为了弄清问题，1979—1980年，我花了些工夫，看了几十本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哲学书，发现毛泽东在抗大编的《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与苏联的三本教科书有密切的关系：一本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一本是米丁等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沈志远译），一本是米丁等编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1983年我见到一个日本人在我国文化革命时期写的《“毛泽东哲学”的本来面目》（作者、出版日期不详）中文译文，从中知道，有些日本学者早在60年代就在研究“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1963年出版的尾崎庄太郎的《（实践论）、（矛盾论）入门》一书就指出，“两论”有许多地方借助于西洛可夫《教程》（第107、108页）。板本贤三的《现代中国哲学批判》和中岛岭雄的《现代中国论》也都谈到这一问题。1969年4月，竹内实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型》，对“两论”成为文献的经过作了“考证”。由于他们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因而所作的“考证”也不过是一种“可能”的推测，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他们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内容上有许多借助于上面提到的苏联三本书，这是第一步。1939年艾思奇选编了一本《哲学选辑》，在书后附了两个附录，一个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是艾思奇自己拟的《研究提纲》。艾的这个《研究提纲》除了参照苏联的三本书外，还参照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是第二步。1940年前后，形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是其中的两章，这是第三步。他们认为，艾思奇的《研究提纲》“也许就是为了编写《讲授提纲》而在研究过程中起草的文件”，在编写《讲授提纲》过程中“可能充分发挥了作用”。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讲授提纲》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作品，“大概是作为内部资料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行”的；“两论”的完成，“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集体工作，基本上应当看作是他们共同的财富”。这当然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包括“两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后完成于1937年8月7日。现在保存最早的油印本是1937年9月印的。据我在1979年所查，《讲授提纲》首次在《抗战大学》杂志（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1938年第6期及以后各期的新哲学讲座栏内连载过，并标明，毛泽东主讲。在编者话中还特别指出：这是“毛泽东先生在“抗日大学”所主讲的讲义”。不是毛泽东的《讲授提纲》利用了艾思奇的《研究提纲》，而是艾思奇的《研究提纲》吸取了毛泽东的《讲授提纲》。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他们的研究指出了“两论”与苏联30年代教科书的联系，这对正确评价“两论”是有益的。威特福格尔在《关于毛处理辩证法概念问题的评述》一文中也讲到毛的《讲授提纲》同苏联著作的关系。在一段时期里，我国理论界对“两论”评价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不了解“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

国外有些人根据“两论”吸取苏联30年代哲学成果这一点便否认“两论”的理论价值，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15)“两论”不是苏联哲学教科书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融合了我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两论”对认识过程和矛盾规律的阐述，要高于当时国内外的著作，也高于1938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苏联学者讲：为了在联共（布）党史中写一节哲学，斯大林指示，组织10个哲学家撰稿。初稿有300页。斯大林看了后删去一半，交回给哲学家，要他们再删去一半。删完后，再由斯大林最后审定。这10

个人中有米丁、亚历山大罗夫。很明显，苏联哲学家们在 30 年代初提出的一些新思想，经过删来删去，都被删没

在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由于我们不恰当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把它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阶段，把“继续革命理论”说成是“创造性的贡献”，“第三里程碑”。这种极“左”的思想，在国际上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进步团体和友好人士，也随着我们的说法，宣传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也失之过高。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日本的著名哲学家、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柳田谦十郎。他在 1977 年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一书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两论”在日本的“唯物论学者当中曾广泛流传，尤其是在过去的唯物论者中间，几乎人人都读过这些论文，这绝非言过其实。”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就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条件、中国的现实，来直接为当前的革命实践服务。”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既深又广，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离开了这个理论的指导，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与马、恩、列相比，毛泽东的理论只能看作是有限条件下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殊理论，没有马列理论那样的普遍适用性，当然更不能说是当前世界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理论。他认为，“两论”是毛泽东根据苏联的教程加工而成的，它们“使东方人读起来感到亲切，易懂，在行动上容易起到直接的效益，即实用价值。直至今日，仍然是值得一读的好论文。”这两篇论文在理论上也有创新的地方，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点。但不能认为它们在辩证唯物论发展历史上有某种划时代的创造性的意义。柳田谦十郎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日本人民教条主义的学习毛泽东思想，“那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理论本身的过错。他还指出：尽管毛泽东对晚年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负有责任，但决不能把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误都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的责任；对于当今中国的事情，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来加以认识，即由于中国是从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农业国，一举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特别复杂，作者最后指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无疑具有国际意义。因此，必须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研究毛泽东。柳田谦十郎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发表的这些见解是十分可贵的。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新华社编辑了一本《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书中收录了毛泽东逝世之际世界各政党、政府团体、报刊、电台以及许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所发的唁电、声明、评论、谈话、纪念文章（我们报刊已发表的除外）。看看这本书，看看世界各地所举行的悼念活动，就可知道毛泽东对世界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人在去世后像毛泽东这样广泛地受到世界人民的悼念。1977 年 1 月，伦敦出版了《从历史衡量毛泽东》。这是《中国季刊》邀请不同国家 10 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写的评述毛泽东的论文集。

1979 年英国出版了戴维·麦克米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该书的第四编“中国和第三世界”，主要是叙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作者把毛泽东的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代表。作者指出：“中国已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模式”，毛泽东的理论“对第三世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认为：“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些

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他虽然比较客观地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理论，但他却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一个农民党。这一结论当然是错误的。在国外，有些人将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如，1977年出版的柯拉科夫斯基著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最后1章第6节的标题就是“毛泽东的农民马克思主义”。

在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将毛泽东的认识论同实用主义相比较，认为毛的认识论与五四时期产生过相当广泛影响的美国实验主义者杜威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德国法兰克福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实践论》“从总体上看，它属于杜威，甚于马克思”。当然这种看法是极肤浅的、错误的，只看到毛泽东讲实践，杜威也讲实践、实验，看不到两者本质上的不同。

三、80年代地来的研究情况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国际上刮起了一股“非毛”的歪风，日本的三浦勤认为，“毛泽东死后，毛泽东主义仍能支配着中国”，但已开始出现了“非毛化”的朕兆。“应该由中国人之手来扬弃毛泽东主义，为此，我们有在理论上助一臂之力的义务”。他表白：他的《毛泽东主义》（1976年12月）这本书，为的是在“非毛化”之时，“对有心的中国人起点作用”。三浦勤虽然认为苏联学者对毛泽东主义的批判是粗暴的，但实际上，他对毛泽东思想所持的态度与苏联学者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以片面而歪曲的手法继承并加以畸形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性与民族主义则对这种畸形发展及坚持这种错误起了作用。为此，他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所谓的“全面批判”，他的“批判”充满了歪曲，有时也暴露了他的无知。如：他认为，毛泽东不讲真理转化为错误的问题，不承认真理和错误的对立是相对的，等等。事实上，在经典作家中，毛泽东是讲真理与错误转化问题最多的一人。

“非毛”是不得人心的。“非毛”的风刮了一阵子也就渐渐停了下来。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美国波上顿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苏说：“不管你个人对毛泽东有什么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确实，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因而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个人，他把现代中国这个蒙受耻辱的千年古国，从君主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彻底转变为独立强大的国家所做的贡献，也许比中国其他任何领导人都大。以至于在当今的任何国际关系中，中国都必须被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说，中国“既复杂又具有键力”，“如此引人注目而又令人难以理解”，“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的是对中国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所了解”（16）。施拉姆在1984年写道：“今天，虽然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已不如60年代那么巨大，但并没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退。”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情并没有减退。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邓小平提出应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路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国内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国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几年，我国继续出版了一批以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书信，出版了更多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史料和著作，这为国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这对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十分有利的。施拉姆曾多次（1981、1983和1989年）来我国访问，这无疑有助于他对中国、对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

我国国内的上述变化，使80年代以来国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更趋于实事求是。如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1981年7—8号发表了题为《略论毛泽东的国际意义》一文，表示赞成我们党的《决议》，文章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有效，而且有国际意义。文章简要地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但很少有过头的话。文章认为：“否认毛泽东其一生犯过错误，那是不对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分析自己的错误，他去世后，别人有责任检查他的错误，特别是他晚年的错误。”文章最后写道：有人说几年以后，毛泽东的名字将会消失或被掩盖起来，我们认为，这种事实肯定不会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将引导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获得解放并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将得到发展。在《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1982年9、10月号上又刊登《正确评价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的署名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正确的东西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继续存在。1986年4月15日出版的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全党开展一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运动，以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文章认为“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说：每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思想上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只要反复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就会豁然开朗，使我们得到进步。文章指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最主要的是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文章最后恳切地希望党内的年轻同志们，要紧密结合个人实践的经验，精读这两部哲学著作，既要肯动脑子，又要有学习的热情。

7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有所深化。有些成果对我们有启发性。

日本学者今掘诚二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一文（17）对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编辑各种版本的指导思想及我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政策，他认为：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作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教科书而出版的。作者对《毛选》版本的这种研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

1964年科恩等人声言称“两论”是1950年和1951年写的，中国人说是1937年写的，“有欺骗性”。施拉姆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斯诺还谈到这件事。但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两论”写作日期的争论在国外并没有结论。1980年尼克·奈塔在《中国季刊》第84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解放前的文本》。文章从“语言的分析和比较”、“概念的分析”和“引文写作日期的分析”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两论”确实是解放前写的，批评了科恩等人的错误说法。

近几年以来，国外出现了一些有关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专著。其中有：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夏威夷1982年）、M·亨利·戴的《毛泽东，1917—1927：文献》、安格斯·麦克唐纳

的《农村革命的城市起源——1911年到1927年中国湖南的精英人物和群众》、林德·谢菲尔的《毛泽东和工人们：湖南劳工运动，1920—1923年》等，沃马克的著作注意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在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活动和著作中最鲜明的特征是他满怀热情、毫无私心地关注公开事务；毛泽东早期的每篇文章都包含有一个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的建议，其意义重大，理由充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投身于他们建议的行动；毛泽东的重实践的倾向对他的理论风格有重大影响，毛泽东最关心的是现有理论的正确，而不是对各种供选择的假设作抽象的比较；事物的辩证依存和辩证变化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明显地占着中心地位，在以后的著作中，辩证法仍然是他的基础。作者注意毛泽东早期思想同他以后生涯之间的关系，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方式（尤其是抓住当务之急的事不放这一点）、“联合起来的群众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斗争是不可缺少的、实践是最重要的、改造中国与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目标等是毛泽东思想中基本不变的东西。施拉姆称沃马克的这本书“是多年来已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论毛泽东的思想的著作”。

国外，有些学者也很注意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研究。有的人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同民粹主义相比较，把群众路线甚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民粹主义的。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爱德华·哈蒙德的《马克思主义和群众路线》(18)一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基本内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在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他根据我党文件中有关群众路线是从苏联学来的说法和毛泽东所讲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便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找群众路线的“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革命实践”的概念，强调了“革命实践”的意义，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根据提纲的这些思想，哈蒙德认为提纲“为群众路线这一更具政治色彩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共产党与一般无产阶级区别的基本思想在于：“共产党能够更好地理解运动的路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群众路线”。他进而考察了列宁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认为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为群众路线提供了深刻的说明，而毛泽东读过这本小册子，并深受其影响。作者认为，斯大林有关群众路线的思想对毛泽东也有影响。同时，他又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同王明的教条主义相对立的。《现代中国》1980年4月号上发表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格雷尼姆·扬的《论群众路线》一文，批评了有的人对群众路线的误解。在此以前《现代中国》1978年1月号上发表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米奇·梅斯勒的《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米奇·梅斯勒以大寨这个典型来说明群众路线。格雷尼姆·扬不同意梅斯勒的观点。扬认为不能将群众活动与群众路线混为一谈，脱离了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不是一回事，大寨的做法恰好违背了群众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分子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群众路线。他还认为，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实现群众利益的关键，群众的自治共同体若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

8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版的许多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中，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具有较大的价值。对这本书后面将作专门评介，在此从略。

最后还要说一下，我们对第三世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情况知道的很少很少。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声明中说：“埃塞俄比亚人广泛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制定了革命纲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对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有重大影响。1967年英国出版的《在东方的失败、毛泽东的战争成绩》一书称“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对诸如武元甲和切·格瓦拉等人的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被迫走向革命道路的领导人的思想。作者认为，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不懂毛泽东的理论的意义，过去导致了法国人在印支的失败，现在还在导致美国人在越南的失败，而且看来还要导致英国军队在东方遭受类似的失败，并且也有可能使非洲和拉丁美洲吞下类似这种无知苦果。”正如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一样，非洲一些国家的进步政党和人士是通过中国革命，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逝世时，马里的《发展报》在《毛主席，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说：“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正因如此，他才被看作既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导师。”1981年，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我国，在与我国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我们实在看不了、看不懂，也很难用。又说，他们能够搞成功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第1、2、3、4卷。毛泽东思想对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也有影响，据报导，1985年1月26日，尼加拉瓜桑地诺民主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桑地诺人民军总司令温贝托·奥尔特加在同新华社记者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读过毛泽东的许多著作，读过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许多经典作家的著作。”并说，他很希望能访问中国，看看中国革命的历史纪念地、毛泽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1978年印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出版了英文本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又名《毛泽东思想》），第二年美国南亚图书公司又出版了此书，书的作者曼诺朗强·莫汉蒂是德里大学研究中国和日本系中国政治专业的讲师。全书分4章：第1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2章“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理论”；第3章“现代世界的矛盾”；第4章“唯物辩证法的四个规律”。《毛泽东哲学研究动态》1986年第5、6期和1987年第1期刊登了该书的序言和第四章。作者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哲学，是中国近百年来革命运动的产物”，中国革命的政治哲学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想象力的产物，它们是通过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种种成功的和失败的试验，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不时定期地把运动中的实际经验教训和在哲学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或者“理论化”。因此，“只有研究历史变化的进程，才能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作者不同意当时苏联官方对“毛主义”所持排斥、批判的态度，也不同意西方某些学者将毛泽东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的说法。他认为，过去的十年中西方敬佩毛泽东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并没有看到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只看到为了建设一个没有西方工业社会各种弊端的社会所需要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作者不同意将毛泽东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撇开马克思

主义而来抬高毛泽东，就如同不了解印度教而学习瑜伽一样。”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作者认为：“必须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因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是理解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关键。作者没有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来介绍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是“试图把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革命经验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重新阐述唯物辩证法。”他认为：早期所有的辩证法的倡导者都把这种方法视为认识论，而在毛泽东那里，辩证法既是认识理论又是实践理论。莫汉蒂在理解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构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概念，把它确立为四条规律：知行统一规律、分析规律、综合规律和特殊规律。作者依据毛泽东的理论对这四条规律逐一加以说明。他认为，知行统一规律有三个方面：认识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性、作为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物质与观念的相互转化。“这三个方面一起形成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哲学观”，“形成了毛泽东的认识理论的核心”。“文革”中，中国有的人声称：“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到更高的、最完整的阶段”。作者说：“知行统一规律是否证实了这个陈述是有待讨论的。”紧接着，莫汉蒂指出，“这个规律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中找到渊源”，“不是什么新东西”。他认为：毛泽东“在认识论上不是以新的论据来对付唯心主义者和庸俗唯物主义者，而是运用认识论的概念于30年代中国革命战略的‘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为物质和观念关系的认识问题增添了更多的含义。“知行统一规律确实使日常实践简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概念”。很明显，作者以婉转的方式表示不同于我国当时有些人对毛泽东认识论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

莫汉蒂所说的分析规律是指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分析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他所讲的综合规律是指矛盾通过斗争而否定的发展，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转化。“为了促进矛盾向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一个组织和它的领导必须掌握综合规律，把它正确地运用于具体条件。”他所讲的特殊规律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包括三点：一事物矛盾的特殊本质；主要矛盾；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最后作者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四条规律“是把握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能割裂的，“因此，四条规律中，知行统一是最重要的”。作者对唯物辩证法的这种重构并不科学，解释也很一般。但作者将知行统一规律看作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条规律，有新颖之处。它包含着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不可分和唯物辩证法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合理思想。作者认为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理解上作出了贡献，他引证了英国哲学家康福斯对《矛盾论》的评价，同时，他也批评了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贬损。阿尔都塞认为《矛盾论》是“泛泛而论”，“总的来说是抽象的”。作者认为：实际上，毛泽东只有在和他的政党和人民面对的具体问题有关的地方才讨论哲学，他通过联系周围的环境，给辩证法以生命力。莫汉蒂指出，阿尔都塞孤立地读了毛泽东1937年的文章才得出毛泽东的辩证法是抽象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有效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点”，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的贡献并未表现出任何对恩格斯同类论述的偏离”。总起来看，作者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持赞扬的态度。由于这本书是在1978年出版的，因此，作者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已成为一种过

时的东西。这是不能苛求作者的。总之，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对第

三世界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知道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年6月出版

注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67—68页。

维·米海耶夫：《（毛泽东选集）第2卷》，载《共产党人》杂志1953年第8期，转引自《人民日报》1953年7月17日。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页。

康福斯：《辩证唯物主义》，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5页。

施拉姆1977年为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英译本写的序言。

载《光明日报》1966年7月8日。

载《人民日报》1968年7月17日。

载《人民日报》1970年3月27日。

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6期。

(11)载《中国季刊》（英文，伦敦）1964年第19期。

(12)载弗赖伯格，《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亚洲学者公报》（英文）1977年第1期，转引自《哲学译丛》1978年第6期。

(13)《美国和中国》（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260页。

(14)《中国共产主义及毛的崛起》（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25、77、191、197页。

(15)详见作者：《（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本书第174—184页。

(16)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

(17)载《现代与思想》杂志1979年第35期。今掘诚二，193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曾对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进行大量的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战时和战后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

(18)载《现代中国》杂志第4期第2号（1978年1月）。

(19)载《参考消息》1985年1月29日。

《毛泽东辩证法理论》评析

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辩证法理论》是西方在 80 年代出版的较有价值的一本著作。1983 年，中央党校的同志将该书翻译内部印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上选登了一部分。这里做一点评介。

作者弗朗西斯·苏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曾在中国和西方就学。从书中看出，此人很可能是华人，对中国哲学有相当了解。该书于 1981 年由荷兰的雷德尔出版公司作为 sovietca 丛书出版。sovietca 丛书是一种带国际性的丛书，它是瑞士弗里堡大学东欧研究所，波士顿大学东欧、俄国和亚洲研究中心和慕尼黑大学政治理论和哲学研究会三者的联合出版物，由 j.M. 博琴斯基于 1959 年创办（此人 50 年代写过一本《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至 1981 年丛书已出版了 40 多部书，“论述了马列主义这个当代哲学舞台上颇有影响的思想、流派的起源、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用我们的话说，它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丛书。出版公司在介绍《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时说：“近一百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各种思潮中，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无疑是最多的。《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辩证法理论，是试图从哲学上探讨这个复杂的问题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一些杂志为之作广告、写书评、在西方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作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文化分析法。他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反映综合法”。他认为，毛泽东的大部分著作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论战性的。本人并没有系统地制定其辩证法理论，因此，作者“不得不去理解、筛选、综合重新整理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并以最终系统的结构形式加以阐述”，他把自己的研究活动归纳为：“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毛泽东其人和他的时代”，讲背景。第二章，“毛泽东的方法论和出发点”，介绍毛泽东的“综合实践方法”的方法论。第三章，“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介绍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和“辩证法理论”。第二、第三章都是经过他整理的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介绍，无多少评论。第四章，“毛泽东的方法论”。作者通过与中国哲学史的比较，评价毛泽东的方法论。第五章“对矛盾论概念进行哲学评论”，通过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评价毛泽东的“矛盾概念”。第六章，“对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分析”。最后有一个结论，评价“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地位”。

作者的态度是严谨的，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言论绝大多数出自我国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对毛泽东理论的理解也基本上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评价总的来说也较为客观，书中并无攻击性的言辞，有的观点我们不能同意，但读了有一定启发。

一、毛泽东的方法论和出发点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活学”“活用”。他所说的“活学”“活用”和林彪所讲的“活学活用”是两回事。他把“活学”“活用”解释为：“活的学习和活的运用”，或“根据存在着的情况灵活地分析和灵活地运用”，或“根据存在着的情况具体地分析具体地运用”。他在引了毛泽东著作中五条有关“活学”的语录（主要内容是批判教条主义，讲理论联系实际）后指出：毛泽东强调学习任何东西，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抱着灵活又批判的态度，“避免盲目地把一切照搬到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而采取‘用脑筋

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关于“活用”，他也引了毛泽东著作中六条语录。他认为毛泽东强调要灵活地运用所学到的东西，“灵活性”是做到活学活用的“关键”，是毛泽东方法论的“精华”。他说：“十分清楚，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有关按照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况而采取适时和适当的办法的思想，给了我们一把从原著去理解他的方法论的可靠的钥匙”。他的这种观点与我们讲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

接着他综合出毛泽东的方法论有四个基本要素（或特征）：

第一个要素是“综合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全体——局部——全体’的研究方法”。

第二个要素是“历史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过去——现在——将来’的研究方法”。

第三个要素是“具体的客观性”，“遵循‘客观——主观——客观’的研究方法”。

第四个要素是“实践逻辑的观点”，“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所谓四个三重运动。他根据毛泽东著作对各个要素分别作了介绍。他认为，人们如果采用了这四种研究方法，“那么他的方法必定是灵活的和能动的”。他说，按照以上的解释，可以把“活学活用”译为“综合的实践”，其中“综合”指的是“全体——局部——全体”和“过去——现在——将来”，而“实践”指的是“客观——主观——客观”和“实践——理论——实践”。

接着他考察了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出发点。他说：“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他的‘社会实践’的概念的基础上的”。他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这一点，讲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作者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方法论的呢？他认为：“毛泽东的‘综合实践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毫无争论”。“灵活性”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列宁首创和运用的革命方法。毛泽东综合实践的说明充满了“实践”、“辩证法”、“上层建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针对有人认为（他称之为一种公众舆论认为）“综合实践”既然是马克思主义，那它也是反中国式的观点，作者将毛泽东的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的方法”加以比较。为此，他专门写了“中国哲学的方法”一节。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方法”或“中国的思维方式”具有四个特点：（1）“综合”，强调整体而不是部分，强调和谐而不是对立；（2）“直观”；（3）“历史的方法”；（4）“实践”。他说：“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无论从内容还是效果来说，都是地道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式的并非矛盾。作者对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的分析、概括是否恰当，这里姑且不论，但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深深地牢固地扎根在文化的土壤里”，“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式的”这一结论是可赞同的。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综合实践的有些方法与“西方哲学所理解的现象学的方法的本质大体上一致的”。这种观点笔者难于苟同。

作者最后认为，毛泽东的方法论有“两个困难”，一是“极难理解。更难运用”，因为毛泽东对如何使用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指导，而只是建议你深入具体情况中去研究，取得经验，发现解决的方法。因此，作者认为：“只

有少数人能正确应用毛泽东的综合实践，处理社会发展中各种复杂的事件或问题”。二是有局限性。他认为毛泽东的方法论“在处理与人和社会有关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时，证明是极为有效的和现实的。但在处理自然界中抽象或形而上学的问题时”就难以适用。作者否认毛泽东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不对的。

总起来看，作者对毛泽东方法论的介绍和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他把毛泽东的方法论归结为四个三重运动，特别强调其中的灵活性，这对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去研究毛泽东的方法论有一定启发。

二、毛泽东的“矛盾”概念

作者在介绍了毛泽东的方法论后阐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他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有三个“要素”构成；“普遍性”、“特殊性”和“辩证法”，而“毛泽东的整个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是“矛盾”。所以，他首先考察了毛泽东的“矛盾”概念。

他认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矛盾”这一术语被使用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的认识三种情况。他对毛泽东“矛盾”概念的哲学意义作了分析。他认为“矛盾”的哲学意义有两个：一是“互相对立”、“逻辑上的不相容”，这不是主要的；二是“互相作用的动态关系”，这是“矛盾的主要的本质的意思”，它包括一致与差异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运动关系。毛泽东“运用中国的格言‘相反相成’来说明这一思想”。弗朗西斯·苏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得出了矛盾的主要的本质的意思是“互相作用的动态关系”。他的这种见解是十分有意思的。“矛盾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的说法与我们讲“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又统一，又斗争”是相一致的。

作者在评价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时首先论述了中国人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虽然整个中国哲学史中‘辩证法’并未被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哲学方法和哲学体系未得到系统的、不断的发展，但是中国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辩证的”。他论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六个概念：变易、否定、合（统一）、相关性（人的相关性）、中庸和辩”。作者认为“相关性”是指“相关和相互作用的活动”。人与人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哲学注意的中心。因此，他认为：“人类的相关性”是中国人辩证思想的核心。他还认为中国人的“辩证运动”就是“阴阳运动”。接着作者将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与中国哲学“矛盾”概念相比较，指出：毛泽东“矛盾”概念的主要含义（即“互相作用的动态关系”）与中国人思想的辩证性即“相关性”几乎完全一致。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不仅包含部分而且包含整体，这正是中国人思想的“辩证运动”即“阴阳运动”另一种表述。

在评价毛泽东矛盾概念时，作者还将它同西方哲学史相比较。他认为“矛盾”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有“逻辑的”、“本体论”的以及“社会的”三种用法。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矛盾作为互相排斥和逻辑上的不一致。这类类似于毛泽东的矛盾概念的诸含义中的第一种含义，即“逻辑上不相容”。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是指“任何事物在其辩证的否定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环节”，是“新与旧之间的扬弃或中介”，根据这种看法，作者认为，虽然毛泽东的整个体系与黑格尔完全不同，但他的矛盾概念在两个意义上具有“黑格尔的特点”：第一，毛泽东认为矛盾本身上是一种过程，由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组成。这同黑格尔认为矛盾是辩证否定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环

节相似。第二，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也包括中介或扬弃过程。作者认为，矛盾一词在哲学上的第三种用法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提出的。马克思辩证法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社会性和历史性。毛泽东非常强调把矛盾运用于社会领域，因此，“从矛盾观来看，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有两个显著特点：“动态性与广泛性”。所谓动态性：一是指“矛盾”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这种理解排除了任何静止和固定不变的内容，包含了灵活的生动性；二是指它的实际有用性。他认为将毛泽东“矛盾”概念“运用得当的话，它能发现自然和人的关系中的一切复杂性，并解决由这些关系产生的任何问题和困难。”所谓广泛性是指运用于自然、社会、人的认识三个不同领域。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自己有两个弱点。”一是，它“在有些场合就不大有效或不太恰当。”他认为矛盾概念在三个领域中运用的有效性和适当性是不同的。他们的等级次序是“社会领域、认识领域、自然领域。”在自然领域中的适用性大大降低。这种否认矛盾概念普遍性的见解显然是不对的。二是，在“具体运用时没有客观标准”，“容易‘主观地’加以解释。”

作者对矛盾概念的总的评价是，它“本质上是中国式的”，它同黑格尔与马克思，尤其是同马克思的观点极为相似。他说：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为他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它根据这种世界了解 and 改变现实（即中国）”，作者认为，矛盾概念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三、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

前面已提到，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包括三个要素，普遍性、特殊性和辩证法。它在考察矛盾概念之后，逐一考察了这三个要素。他的考察实际上全是引文。客观地介绍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普遍性”、“特殊性”（包括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与《矛盾论》使用的含义是相同的。他所讲的第三个要素“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呢？一讲大家也很明白，指的是对立面的同一性和对立面的斗争性，论述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以及对立面的转化。作者对这三个要素逐一进行分析、评价。

关于普遍性，他认为“现实即矛盾”或“矛盾即现实”是矛盾普遍性的简述，是“毛泽东辩证法的本质”。他指出：“矛盾即现实”，第一揭示了客观现实的“本体论结构”；第二揭示了主观现实和思想的“认识的结构”；第三揭示了现实的“实践结构”，即揭示了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既独立又相互作用。

关于特殊性。作者正确指出：“毛泽东通过论述中国现实中的具体矛盾，指出了矛盾特殊性的哲学概念。它对认识 and 解决任何具体矛盾是最为重要的。”作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哲学概念可以作为认识 and 解决现实中任何矛盾的指导原则。”他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听起来很抽象，难懂，但是经过思考后，好像都符合我们惯常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作者指出，由于每个具体矛盾是确定的、独特的、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因此要认识其特殊性很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毛泽东提出了“综合实践”方法。“它的本质是灵活性”。具体他说：辩证地、有效地、恰当地使用“客观——主观——客观”、“整体——部分——整体”、“实践——理论——实践”、“过去——现在——将来”这四个三重运动，

那就有可能正确地分析某一矛盾存在条件，发现什么是本质的和什么是非本质的，就能较好地了解那一矛盾的特殊性。他的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也很深刻。可以说，他实际上把认识矛盾特殊性与整个辩证法、认识论联系起来。作者还介绍了毛泽东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想。

关于第三个环节：矛盾的辩证法。作者认为：“它包括相对性、绝对性和可转化性这些支配着矛盾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和原则。”作者特别指出：“毛泽东确信可转化性的原则是辩证法最普遍的和最基本的原则。”正因为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移，所以“他对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的分析独具匠心。”他认为，毛泽东在两点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着矛盾。”作者分析了《矛盾论》里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指出：毛泽东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受转化性原则的支配，而可转化性又依赖于其条件性。”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一切表明毛泽东不是教条主义地或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他的这些看法、见解对我们有一定启发。现在我国学术界对《矛盾论》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我认为，要否定毛泽东论述的正确性，最根本的是要否认对立面的转化没有普遍性。如果承认转化的普遍性，那就必须承认毛泽东论述是正确的。至于某些表述是否可更恰当些，那是可以讨论的。

作者认为，毛泽东运用可转化性原则，“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个问题的解释既灵活又有独创性”。这主要有三点：（1）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和非对抗的矛盾；（2）对抗和非对抗矛盾可以转化；（3）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加以正确处理。

作者的这些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有不符合毛泽东本意的地方，如，毛泽东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还有对抗，也从未讲过“革命，作为解决对抗矛盾的一种暴力手段，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是必要的。”这些都是作者加给毛泽东的。

四、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如前所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国外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也贯串了这一问题。在西方，有人往往这样发问：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式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毛泽东思想里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式的成分各占百分之几？作者既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式的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是不相容的，也不同意用数字或数学上计算的方法来确定两者各自所占的百分比。他认为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毛泽东一生的各个阶段对他的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此，他考察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

他把毛泽东一生分为四个阶段：（1）1906—1918年；（2）1918—1935年；（3）1935—1949年；（4）1949—1976年。他的这种划分我们难于同意，他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是不符合历史的。第一阶段是1906—1918年。他认为这一段毛泽东的思想主

要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和对这种传统思想的反抗中形成的，也在与西方思想的初步接触中形成，不过程度要小一些。这时，他的世界观还未

完全形成。值得一说的是，作者不仅讲了毛泽东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毛对传统思想的反抗。

第二阶段是 1918——1935 年。他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激烈的变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时他所学的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基本知识，他的世界观只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没有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教导。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观为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所支配。

第三阶段是 1935——1949 年。他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上担负起领导的职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要求实际地解决具体问题。因而毛一方面更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运用在中国古典作品、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主要反映在《实践论》和《矛盾论》及延安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他认为，就其术语本身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毛的许多重要术语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如“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等等。“可是就其内容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既是中国式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许更强调前者。”

作者认为，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从内容上“可能更多地是受中国人的思想影响”。他的理由是：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相对来说比较少，对西方哲学史了解得则更少；另一方面，在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前，毛的中国哲学、文学和历史知识，就非常渊博，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辩证思想。他还认为：“正是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影响使毛泽东没有成为教条主义的或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似乎比苏联的理解更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第四阶段是 1949——1976 年。他认为，毛泽东的世界观或辩证法理论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和发展。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一步证实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可转化的理论，“结果，毛泽东能更好地解释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借此，他得以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特的贡献。”他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越来越中国化，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方向。

他的总结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式的，它在不同的发展或应用阶段上或者强调前者，或者强调后者，不过在毛泽东生活的成熟年代的实践中，已经日益中国化了。”

说毛泽东哲学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式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作者不同意用数量来计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各占多少百分比，这也是对的。但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仍然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的。这是难以赞同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有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但这两者不是平行并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本的。毛泽东是在中国实践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这两个方面是融为一体的。在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能认为有的阶段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起作用，有的阶段是中国传统哲学起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五、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地位

作者在书的结论部分考察了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地位。

作者说，在西方，一般认为毛泽东下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或者顶多是个二流的或三流的哲学家；或者更确切点说，他只是一个革命家，由于他在政治上名声显赫，因此其著作被广泛研究罢了。他说，这种看法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著作（包括四篇哲学著作）不符合西方的哲学标准。

那么什么是西方的哲学或哲学家的标准呢？作者承认，并没有力所有哲学家一致同意的标准。他认为西方哲学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第一是“爱智慧”。“哲学”一词在拉丁文中的含义是“爱智慧”。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爱智慧”的驱使下，力图以更为深刻的方式思考了解宇宙、人、上帝以及它们的任何组合。第二是“系统化”或倾向于阐述和分析。至于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它往往以基于逻辑推理而展开的有系统的论著形式出现。作者说“从西方哲学的这两个特征来看，有理由断言毛泽东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就毛泽东的那些著作（并不是纯粹学术作品）的内容而言，它们不能归入西方哲学的任何一类；就表达形式而言，他的著作缺乏大量论证、逻辑说明和一步步推理为基础的系统性。”

作者认为：若用中国哲学的标准来评价毛泽东的著作，情况就不同了。他认为中国哲学几乎集中研究人，尤其用“人道”的观点来研究人，而对自然界和上帝等问题则很少讨论或根本不讨论。他又说，就其表达方面而言，中国的哲学往往采用完全从个人生活经验中得来的那些格言、谚语和谈话的形式。这样，中国哲学著作相对来说没有西方著作那么长，那么有系统和带有推理性的论述。但中国哲学不是脱离生活的纯思辨性的学科。哲学与生活是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在中国，人们要求哲学家实践自己的哲学，而谁不实践自己的哲学，谁就不能成为“公认的哲学家”。作者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一般标准来衡量，那毛泽东完全应该看作是真正的哲学家。作者最后引了毛泽东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中的话。他说：毛泽东本人“并不想以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留芳百世，而想以一个‘伟大的导师’留名青史，说得完整一点，就是‘哲学家兼教员’，或‘教员兼哲学家’。”作者用下列话作为全书的结束，“他的回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含义如此深刻、如此生动和如此发人深思，对正在讨论的问题也是相当贴切的。”

作者认为，在评价毛泽东是不是哲学家问题上，要看拿什么标准来评判，这对我们有启发。他认为中外哲学有不同的特点，不能仅仅只按西方哲学标准来评判某一人的哲学，这是对的。但他认为，若以西方标准来看，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以中国哲学标准看才是真正哲学家的结论，则是难以同意的。

现在确实有一些人，仅仅只拿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别国的哲学，认为只有符合他心目中的哲学家标准，才能承认某人是哲学家。在有些人来看，不仅毛泽东不是哲学家，而且列宁也不是哲学家，只是革命家、政治家。甚至马克思也不算哲学家，因为他没有写过像黑格尔《逻辑学》那样的哲学专著，现在还有人认为，写过《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的恩格斯也不是哲学家，因为他的著作不思辨。这些看法显然都是错误的。不客气的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一些青年人正成为这种偏见的俘虏。

我认为不仅要注意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的不同的特点，而且要注意无产阶级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的不同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哲学，是

实践哲学。它没有旧哲学的神秘性。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晦涩难懂，并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缺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和狄慈根（1858年5月9日）的信中讲到，要是有时间的话，他想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合理的东西加以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现在有的人反以为一般人看得懂的不算哲学，只有一般人看不懂的才算是哲学。这是开倒车。说“两论”这样的著作缺少论证和逻辑推理，缺乏系统性，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两论”对论题的论证是充分的，逻辑是严密的。当然，无产阶级哲学家中也有不同的情况，作为专业的理论哲学家与作为领袖的哲学家有所不同。同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哲学也各有不同。我这样说，并不是把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说成是哲学家。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哲学思想，这是可以讲的，但有哲学思想的人不一定是哲学家。毛泽东不仅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有杰出的哲学论著，有自己特有的特点。因此，我认为，无论按中国标准来讲，还是按西方标准来讲，毛泽东可称为真正的哲学家。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若干问题

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总结。同时，它又融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是现代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这一伟大变革的科学指导，对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所以伟大，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功到底，就是靠这个；我们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应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中国现代革命领袖，他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被国外的评论家称之为 20 世纪巨人中的巨人。在 20 世纪的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巨人毛泽东，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现代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

人类历史的发展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不平衡的。中国曾是世界文明古国，走在人类历史的前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到了近代却落伍了。相反，西欧一些国家却赶了上来。17 世纪英国领先。18 世纪法国领先。19 世纪后起的德国赶了上来，走到前列。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落后的俄国走到前列。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极不相同，它反对的不是一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封建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它主要的群众是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如何搞，在本本上是找不到的，只能由这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列宁称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

为什么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十月革命后时代提出的新任务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处于各种复杂而又激烈的矛盾之中，成了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尖锐性，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作了极为生动而深刻的分析。中国社会矛盾之尖锐、复杂和曲折，可以说是世所罕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中国社会尖锐、复杂、曲折社会矛盾运动的反映，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一个博大精深哲学思想的诞生，除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外，还离不开前人丰富的哲学遗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典籍浩瀚，具有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宝贵的哲学遗产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借鉴。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之于中国哲学，来之于中国的民族精神。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分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既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那么很自然，它的形成、发展过程大体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过程相一致。

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 形成阶段（1920—1937年）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剑、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共产党。在党的成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状况和中国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由城市转入乡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革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1930年，他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从认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该文已蕴含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系统地钻研哲学，更深入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世界观的高度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两论”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2. 多方面的展开而达于成熟阶段（1937—1949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最为充分展开的时期，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两论”中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党的建设、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如《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史观的破产》等一大批充满着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论著。这一阶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阶段。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既得到了生动的运用和证明，又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3. 建国初期的新发展阶段（1949—1957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样是一个极其艰难而又极其崇高的任务。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较短的时间里在所有制方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1956年起，毛泽东以苏联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毛泽东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其理论成果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探索为1957年5月开始的反右运动所中断。

4. 晚年曲折发展阶段（1957—1976年）

1956—1957年是继延安时期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在此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则在艰难曲折中前进。1957年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

化是一折。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是一折。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更大的波折。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失误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决不是说，他在哲学理论上就没有正确的东西，没有新的进展。事实上，毛泽东在晚年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如关于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群众的思想；关于“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论断；关于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思想；关于由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的飞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辩证过程的思想；关于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的思想；关于要重视研究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对立面结合的思想；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思想；关于辩证法规律一元化思想；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想；关于哲学解放和哲学普及的思想；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思想等等。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对林彪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也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在晚年，毛泽东确实严重背离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对这方面的错误将在第三部分作专门讨论。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贡献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时代的哲学，哲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哲学。民族总是一定时代的民族。因此，哲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它内在的必然逻辑。每一时代的哲学又是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环，是它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因此，本文所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并不是指表现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基本内容。这种特点不仅为它所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和时代特点所规定，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就此而言，把握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也就把握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内容以及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贡献。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相比，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及贡献：

（一）把哲学同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重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始终严格依据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主要是同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到了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内，公开的、露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已没有市场。问题不在于在理论上承认不承认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在于在实践上能不能应用和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毛泽东主要从事实践的批判，他反对的主要是实践活动中的主观主义。他继承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用实事求是来同主观主义相对立，反复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写作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纯哲学论文。他更注重哲学的应用。他的哲学思想更多地渗透在他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论著里和全部实践活动中。为了把哲学同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他十分注意把哲学应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的矛盾，阐述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实践引入哲学，从而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列宁只是大略地勾画了认识的辩证途径，而未能加以展开说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继承了中国哲学注重知行问题的传统，在《实践论》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宏观上说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途径，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他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三）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系统的说明和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唯物辩证法。在马、恩时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即承认不承认世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无止境的过程。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矛盾极端尖锐，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悉心研究辩证法。他认为，发展的原则已被广泛承认，两种宇宙观斗争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发展，即承认不承认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他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吸取了苏联哲学界的最新成果，在《矛盾论》里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说明和发挥，完成了列宁提出的任务。为什么列宁提出的任务由中国的毛泽东来完成呢？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如前所述，第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了东方世界矛盾焦点。毛泽东本人又处于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中心。《矛盾论》正是中国社会尖锐、复杂、曲折的矛盾运动在理论上的反映。第二，中国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毛泽东熟谙中国的辩证法。可以说，《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现实的客观辩证法和中国传统辩证法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

（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革命战争，形成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理论

战争是人类社会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社会中最激烈、最复杂的一种斗争形式。在战争中，社会生活的客观辩证法、认识战争和指挥战争的主观辩证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哲学与战争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古代的老子、孙子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形式。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既是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要的实践基础，又是它最生动的运用和证明。如果说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重点领域是政治经济学，那么毛泽东的重点领域则是军事学。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理论不仅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而且在人类军事思想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军事著作中凝结的智慧具有永恒的价值。

（五）招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活动，形成了系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在毛泽东

之前早已阐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的特点和贡献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了系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共产党人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上帝”，力量的源泉，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根本路线。他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融为一体。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

（六）致力于哲学的解放，把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权阶级视为毒草，加以打击。因此它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普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主张“普及哲学”。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继续十分重视哲学的学习、研究。他积极提倡和组织党内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普及哲学提到议事日程上。他在党内外的各种会议上讲哲学，并发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面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致力于哲学的解放，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我们不应把普及哲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哲学的解放，而是应认真总结哲学解放的经验教训，继续做好哲学的普及与应用，提高全党和全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贡献自然不止以上六个方面，而且对它的特点还可以从其它的视角加以概括。不过，笔者以为，上述六个方面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在 20 世纪中国的具体化。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发展的逻辑必然，又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客观逻辑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精华在现代的继承和宏扬。

三、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哲学思考

正确论析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善于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在此，我们不妨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对他晚年的失误作一点哲学分析。

（一）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哲学理论根源

列宁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毛泽东认为，他的主要实践和理论是有哲学依据的。这就更有必要分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哲学理论根源。笔者认为，毛泽东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哲学理论来讲，主要是在以下四个基本原理上发生了偏差。

第一，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过分夸大了精神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忽视了物质条件，忽视了物质利益。

第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试图想主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在变革生产关系上，又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

用，忽视了劳动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在规定生产力性质上起的作用。

第三，在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忽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陷入了想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片面性。

第四，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斗争性，过分强调分，忽视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过于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二）毛泽东晚年失误的认识论根源

1. 经验主义

毛泽东晚年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他哲学理论上偏颇的唯心论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决不是说，他在理论上提倡唯心论。事实上，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唯物论辩证法的言论。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酝酿大跃进，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同时，他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多次才能完成。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的、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他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他只是总结提倡而已。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说，人民公社他只有建议之权，无发明之权。总之，他自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套是来自实践、来自群众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他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的。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认识论的优点是重视实践的作用，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但也有不足。他对认识如何从实践中来，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如何回到实践中去未能展开说明。他强调认识的原材料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而对原材料如何进行加工、制作、改造讲得比较简单。在认识活动中，认识的原材料固然十分重要，但仅有好的原材料，大脑的加工、制作出了问题，仍然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影响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复杂：有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有认识能力和知识构成的问题；有个人的性格、兴趣、情绪、心理问题；以至个人的生理、身体状况，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哲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群众、来自实践、来自下级干部的材料的制作上出了问题，把某些现象、假象误认为事物的本质（如把群众中自发搞起来的“吃饭不要钱”之类的农民平均主义误认为共产主义萌芽），把个别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此造成的）。

毛泽东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的优点。经验也有两重性。若把一定条件下的经验到处套用，优点也可能转化为缺点。他忽视经济建设的特点，企图用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的速度来解决经济问题，企图用搞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经济建设，结果犯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错误。他企图用革

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搞起了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平均主义。他习惯于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和党内矛盾，结果把大量非阶级斗争现象视为阶级斗争，把党内正常的不同认识视为路线斗争。

毛泽东的经验主义还表现在搞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上。他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他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忽视了对现代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

他对知识的某种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不放心也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表现。

2. 教条主义

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一生都在反教条，进行独创性探索，走自己的路。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也要看到，他毕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时代过来的人，毕竟受到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因此，他的思想很难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他虽然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可在 1956 年以后，他由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到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把自己的理论、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他不迷信马列，不迷信本本，但也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把马列个别论断绝对化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权利”）的误解和对列宁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的误用。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延安整风，毛泽东对两者都进行了批判，但重点则是批教条主义。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但实际上，对经验主义的批评从未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没有批经验主义，党内经验主义日益滋长。时至今日，纠正和克服经验主义仍然是党的思想工作中的一个紧迫的重要任务。

（三）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他个人当然要负责任。这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的科学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结晶一样，他晚年的失误也带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他晚年的悲剧，也是党和民族的悲剧。毛泽东的失误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疏忽。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简单归结于他个人的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社会原因至少可从两方面分析：

第一，从人类历史长河看，社会主义不成熟，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没有经验难免要犯错误。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理论的成熟程度首先决定于理论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发展的成熟程度。不成熟的理论是不成熟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到本世纪 50 年代，苏联虽然搞了 40 年社会主义，但仍很不成熟。中国，搞社会主义更无经验。1964 年 8 月 20 日，毛泽东同人谈话时说，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些经验。毛泽东所说的有些经验，主要是指搞阶级斗争的经验。今天看来，这种经验仍不够正确。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使党和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是坏事。但它使我们取得了教训。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毛泽东失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探索在后。我们现在的认识比起毛泽东时代大有进步，是一种飞跃。但也不应忘记，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此客观条件制约。

第二，中国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难免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渗透某些小生产者的思想、心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小生产者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状态的急性病和平均主义的产物。个人崇拜、家长制、缺乏民主传统、轻视理性、轻视知识等都与小生产者的社会密切相关。若把苏联和中国、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和毛泽东在不少方面重犯了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这种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自然不能从个人身上去找原因，而只能从两国社会本身的共同基础中去找。

提出社会原因的分析，丝毫不是为毛泽东开脱个人责任，而是为了正确汲取教训。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和认识原因继续存在，那么重犯毛泽东错误的可能性就不会消失。倘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自觉，那就难免再一次重蹈前人的复辙。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 1995 年 9 月
印发的“中共中央党校讲稿”排印注释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9 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81 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15 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90 页。

